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赛里斯与帝国主义

2021

{ } /著

如有文字错漏、引用错误、逻辑错误或有改进意见请联系本人。（QQ：2211388451）

仅以此文，献给正寻求社会公正与真正平等的各位

目录：

前言：回到列宁……5
一、经济……8
1、垄断……8
金融的垄断……8
工业的垄断……18
工商为一……29
2、扩张……36
资本输出……46
二、政治……47
威权重典……47
神圣同盟……67
帝皇之拳……80
三、教育、规训与意识形态……90
1、教育……90
教育机器正向前……91
应试的帝国……98
帝国的明天……108
2、意识形态……120
国家、民族的互联网+……121
帝国的文化……136
规训在这里……142
后记：帝国正向前……155
参考文献及引用目录……157

前言：回到列宁

当我们回头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我们能发现其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具体阶段。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竞争阶段发展到私人垄断阶段，列宁称其为“帝国主义阶段”。现在我们都知道，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矛盾发生作用，为了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和对外扩张，列强结成不同联盟并展开激烈斗争，催生了两次世界大战。20 世纪上半叶，整个欧亚大陆战争连绵，民族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高潮迭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先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世界上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尽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替代，并在极少数国家得以实现，但整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长期垂而未死，尤其在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以来，经历了新自由主义重构和冷战后的帝国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新帝国主义阶段。

在正式讨论之前新帝国主义之前，我们有必要明确一些概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阐述了帝国主义的定义和特征:“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样的“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在这一阶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集团已经形成。

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在实质上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1）**在同年 12 月发表的文章中，列宁又指出帝国主义的三大特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其一，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其二，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其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2）**这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的判定并不在所谓“独立性”，并不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掌握了一切关键技术；并不在于这个国家的文化是否保持了其民族性；并不在于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是否向他国转移资产。事实上，帝国主义的特征，最重要的只有垄断与扩张，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很有可能在经济利益上这样的扩张并不能立刻带来经济效益，如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入侵伊拉克。也正因此，我们不能以短期经济效益考量其扩张。

如果我们将视角转回赛里斯，事情同样是这样，“一带一路”以政府为主导，以财政支出来看是典型的“赔钱买卖”。但其实际效益远非“财政支出”所能表现。以传音手机为代表的私人的资本垄断了非洲的各类细分市场，以中石油为代表的国家资本垄断了非洲的许多矿产，如钴、锡、镍、铜等。这其中所获的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势力扩张才是

其真正的收益，更不要说在控制他国经济命脉后事实上控制他国政府了。与旧帝国主义不同，新帝国主义在汹涌的民族独立与反侵占浪潮中无法在形式上得到殖民地或直接控制他国政府，但新帝国主义们通过资本输出等经济殖民的方式间接控制他国政府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若以形式上的殖民地的多寡或有无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便是极其教条的行为，没错，“帝全世界已被瓜分完毕。”**(3)** 但新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隐于水面之下，存于经济之中。

正因这样的瓜分并不显于表面，所以我们不能以国际事件的表象去分析国际帝国主义，以华为芯片事件为代表的与美多次贸易冲突使很多人坚信，赛里斯只是一个殖民地，因其重要科技核心实际上并未掌握所以不可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前文中我们重提了帝国主义的特点，我们不难看出，帝国主义并非“科技强权”而是“经济强权”，并且在如今制造业分于全球，产业链遍及世界各地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掌握所有核心技术以及制造业门类。其中的例子有很多，如美国的军事装备研发常与欧洲各国合作，其光刻机的不同部件与其加工工艺核心被不同国家掌握，美国自己也仅有一部分技术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重提帝国主义的特征，正是因为对这些特征的模糊，才使得人们对新帝国主义与赛里斯是不是帝国主义等问题争论不休。正因此本文以帝国主义基本特征为基础，结合赛里斯自身状况，以垄断与扩张为线，以政治、经济与国际影响为划分兼论赛里斯当代帝国主义的上层建筑，以求能更全面的描述赛里斯版本的帝国主义。

一、经济

1、垄断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4）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便是垄断，在其国界之内，这样的垄断体现为金融、工业的高度集中，也体现在金融资本与制造业高度融合，形成产业资本或金融资本控制工业的情况。在赛里斯，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实际垄断体现为各国有企业与银行在实际上以私人资本主义的形式运行着，而其却掌握着行政的垄断权，本节中对金融垄断的讨论主要以“实际利差”与“名义利差”的差距为依据{1}，而对于制造业的垄断，则以其“市场势力”分析为依据{2}。

金融的垄断

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垄断便是必然的。自由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产生垄断,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金融的垄断而我国的金融垄断在新赛里斯共和国金融业发展之初就形成,属于国家垄断性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种垄断主要是靠行政权力,而不是靠经济实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分析一下赛里斯金融垄断的现状。依据垄断程度从低到高的次序,市场结构可划分为四个类型,即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一个特

定的市场属于哪种市场结构,一般取决于市场份额、市场集中率、进入壁垒三个要素。

从历史上看，赛里斯的金融业市场结构是随着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不断变化。1979 年以前,在计划经济环境下,赛里斯人民银行是国内唯一的银行,基本上承揽了全部金融业务,因此，若是以市场的角度来看，1979 年以前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的发展而完全垄断的。从 1979 年到 1984 年,赛里斯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这四家专业银行的先后分设,打破了赛里斯人民银行的一统局面，以此为窥孔，我们也能看出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转轨。但由于当时 4 家银行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存在较为严格的专业分工与业务条块分割,服务对象范围相对固定,互不交叉。每家银行凭借国家的政策规定对自身业务范围拥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基本不存在竞争的领域和对手,例如当时赛里斯农业银行对农村业务的占有量达 95%以上。因此,这一阶段金融业市场结构绝对是是高度垄断的，从 1986 年到现在,随着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赛里斯人民银行地位央行地位的确立,国家资本专业银行的商业化，众多私人资本商业银行的成立,加上外资银行的进人,赛里斯金融业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赛里斯的经济模式与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新的市场组织体系慢慢缓缓形成，但金融垄断的情形依然存在,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千禧年前的垄断基本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改制、“红色家族”攫取利益与计划经济信贷模式的惯性所导致的，如今时过境迁，在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革下，市场早已对官僚资本完全自由，因此其垄断便与赛里斯帝

国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了。而当我们讨论这一新时期垄断的表现，我们大概能看出其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金融监管上,表现为政府对金融直接调控力度大，但却并不监管所有机构。随着赛里斯人民银行央行地位的确立和赛里斯金融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赛里斯的金融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赛里斯的金融监管带有着许多计划经济模式中传统行政干预色彩,但其所适应的经济制度却并非计划经济体系，而是完全的官僚与其附属的资本主义体系，齐泽克称其为“完全的威权统治，完全的自由市场。”这也就是说，这些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直接行政干预实际上是作为红色家族的官僚垄断银行服务，为其确立优势地位的手段。这表现为对商业银行直接调控多,指令性计划多,“领导想法多”。一些基层行抱怨说,这种监管方式是“搞活的办法不多,管死的办法不少",总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但对于这些红色家族自身的产业则是“官有多大胆，利有多大产”，“原油宝”这一产品的产生和其极快的暴雷便是对其最好的印证，其条款中违反了多条金融规定，并且其在吸纳资金用于世界原油期货投机时即使面临巨大的亏损与爆仓风险也并不收手，以至于数百万客户的养老金与积蓄一夜清空，甚至一些人发现自己因其投机行为竟背负了巨额债务，如此滔天怒火最后也仅是加强舆论管控和赔付一定本金这样的冷处理而已。可以说赛里斯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完全的“约下不约上”，以致权贵攻城略地。赛里斯政府以金融是特殊行业为由,把金融当成是由政府直接管控的产业,习惯把金融当成调节国民经济的最主要手段，而其指令与行政命令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们则

将金融视作摇钱树，视作权利变现的第一去处。在这样政商结合的体系下，垄断性便十分显然了。

其次，在投资结构上,金融业的垄断表现为银行信贷在国民经济整个投入中所占比重大。计划经济时期，信贷机构唯一的作用便是投资，当时政府可集中和分配的财力不多，国家集中的拨款投资是促进一个行业发展的核心因素。在 1979 年后，政府对企业实行“拨改贷”,银行多了信贷等职能，并迅速变为以信贷为主业务的金融机关。这一时期，信贷投资成了国民经济投资的主渠道。同时，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私人资本，均不能在市场上直接融资,这就造成了“贷款就是命根子”的局面，绝大部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几乎完全依赖银行信贷。这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入就在国民经济投入中占据了垄断地位,左右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速度、结构的调整。这样的阶段优势让四大行迅速积累了资本与金融经验，并让其在随后逐步放开的金融监管中无往不利，以至于其时至今日仍作为赛里斯最大的金融垄断资本而存在。

最后，从市场份额看,这样的垄断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在其行业中的份额极大。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对银行业务经营范围管制的放松和专业银行自由主义资本化改制的深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开始出现，后一度呈现较为激烈的态势,斗争焦灼。其它商业银行也参与了竞争,但从市场份额来看,目前,赛里斯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具有完全的寡头垄断特征。从近三个年的有关金融数据分析,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方面,根据 2020 年银保监会的数据，仅建设银行、工商

银行、工商银行便占据了国内市场 33%左右的份额,并且在疫情后经济寒冬，全部商业银行业净利润 19400 亿的情况下，国有四大行利润 9494 亿，若加上交通银行与邮储银行，合称国有六大行的话，则利润更是达到了 11400 亿元，利润占全银行业比重超过 50%,存款和贷款比重一直在 50%以上。这几个指标说明四大商业银行作为国家独资的产权性质集体,在赛里斯银行业中居高度垄断地位,但从利润、存贷款指标看,其它商业银行倒也有一席之地，但主要是地方性的银行，如北京银行把四大行在北京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压至 60%一下，一越成为吸储金额占全国储蓄总额 10%的独角兽。但在全国范围内，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北京银行靠着帝都政府的扶持尚能立足，其他地区则并没有能与六大国行相比拟的金融集团。

在竞争上，由于赛里斯独特的国情，政府部门直接下场干预，因此作为帝国主义工具与特征的金融垄断在赛里斯并不是市场自发发展而来，而是由看得见的手直接塑形而来，这也就使得在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方面上，赛里斯的银行更加好用也更加耐用，而也同样因为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塑造，赛里斯的官僚权贵金融垄断集团在市场竞争上形成了与其他国家的垄断金融集团并不相似的竞争格局。在赛里斯，与一般商业银行相比，官僚金融垄断集团的经营基础更加牢固。在这里所谓的经营基础，其表现无外乎人力、钱货。首先其差距便体现在“人力”的来源与质量上：从人才竞争的角度来看,国有垄断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国内新兴的股份制银行在人才的培训、引进和留存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国有的垄断性商业银行凭借其福利优势在人才引进上

存在较大优势，并且这一优势是建立在国有银行薪资不如外资商业银行的情况下做到的。但对现有人员的培训实施的则较为落后，因其垄断性质以及其拥有着与行政机构相似的庞大科层制运作系统，培训的计划、方案很多时候流于表面且脱离实际，人员专业技能难以提高。但这一庞大的科层制机构的另一面则是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以及极强的工作稳定性，可以说国有垄断商业银行对人才的吸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这一庞大的科层制运作模式。相比之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在吸引人才方面便只能在薪资方面以及相对扁平化的管理系统上吸引人才，可以说在这一方面，赛里斯官僚垄断性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仍然是行政权力所赋予的，无论是政策的倾斜，还是审批的便捷都是其对行政权垄断优势的延伸。

而从不同商业银行的服务地域上来看,由于受过去专业银行分工的影响,赛里斯的银行业实际上形成了各个银行分割不同细分金融市场的分割格局。因市场定位不同,外资银行和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地方官僚集团控制的地方银行则仅在其行政垄断范围内，即“本地”才能够立足。在垄断性国有银行里，工行、建行、中行的服务对象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县级机构在这十几年中也逐步向中等城市集中。与此相对的，农业银行长期以来主要服务于县域、乡镇经济。从服务的行业上看,外资银行、国内股份制银行及国有的工行、建行、中行主要的金融服务在国家、地方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大、中型企业,而农业银行主要服务于农村及农业企业，且一般规模较小。由于各个银行的服务领域不对称,其所服务的各行业平均利润不

对等，导致某几个银行纵使是细分市场垄断性质，但在利润规模上却与服务于工业的同类型银行收益相差较大。赛里斯这样的情况是极其特殊的，因为在资本市场中，一个金融巨头所涉及的领域一般极其广泛，且并没有如此明显的地域、行业差别，赛里斯的这种情况与这几大行的体制建构有关，这样的分工之所以得以发生，是因为实际上这些国有的垄断银行是被国务院所掌控，其组织严密度与资源联系远甚于类似“德国铁业联盟”的资本家联盟，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这仅是“几个巨头”而应该把其与其所实际拥有的行政权力绑定，将其看作一个板结的官僚垄断资本集团。

很显然的，金融垄断是赛里斯金融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作为垄断主体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必然会凭借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表面上看,国有商行的经济效益并不是很好,似乎没有凭借垄断地位获得什么利润,但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通过种种更为隐蔽的手段来获取垄断利润,众所周知,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收入主要来自利差。在银行资产和负债规模保持不变时,利差扩大会增加银行利润,因而,利差变动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收益至关重要，而塞里斯的四大垄断国有商行正是凭借其垄断地位,在实际经营活动中,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存贷利差,以获取超额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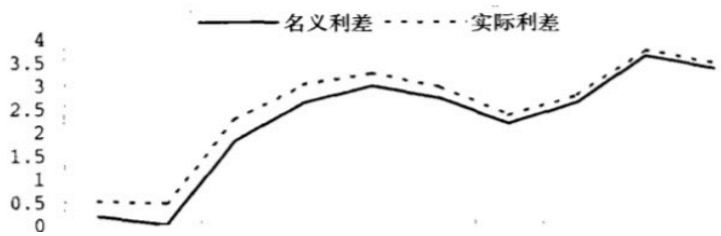
从过程上来看，国资垄断银行与私人资本银行结息制度的不对称性是实际利差扩大化产生的最基本、最主要渠道。根据国有商业银行的现行结息制度,银行对居民定期储蓄存款采用利随本清、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结息方式,对企业和居民的活期存款实行每季度结息一次

的制度,而对于贷款则采用按季(月)结息、到期收回本金的结息方式,结果是国有商业银行支付的实际存款利率等于或小于挂牌利率,实际收取的贷款利率大于挂牌利率。也就是说,这种结息方式的不对称性必然导致实际利差扩大化, 其用实际利差公式的变化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下图反映了 2003 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利差和实际利差的变化情况（**(5)**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人民银行不断调整利率,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利差由 0.18%扩大到 3.6%,增幅高达 20 倍,而实际利差则增长速度放缓,表现为实际利差与名义利差差额的持续下降,目前仅有 0.11 个百分点.图中的走势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实际利差扩大化究其本质乃是国有商业银行依靠垄断优势对存款采用单利计息而对贷款采用复利计息的结果。

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利差和实际利差表 单位

存款利率	贷款利率	实际贷款利率	名义利差	实际利差	实际利差与名义利差的
R_d	R_l	R_{Rd}	R_n	R_r	$R_r - R_n$
9.18	9.36	9.69	0.18	0.51	0.33
10.98	10.98	11.44	0.00	0.46	0.46
9.18	10.98	11.44	1.80	2.26	0.46
7.47	10.08	10.47	2.61	3.00	0.39
5.67	8.64	8.92	2.97	3.25	0.28
5.22	7.92	8.16	2.70	2.94	0.24
4.77	6.93	7.11	2.16	2.34	0.18
3.78	6.39	6.54	2.61	2.76	0.15
2.25	5.85	5.98	3.60	3.73	0.13
1.98	5.31	5.42	3.33	3.44	0.11

[1]利率为一年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为一年期一般流动资金贷款。
[2]贷款利率按一年结息 4 次计算。



与此同时, 塞里斯存贷利率奖惩方式的不对称性在结息制度的不

对称性基础上又进一步扩大了实际利差。存贷利率的奖惩方式的不对称性是国资垄断商业银行对居民提前或过期支取存款、企业提前或逾期归还贷款都采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利率计算利息的行为。例如居民提前支取定期储蓄存款,银行不管时间的长短均按挂牌活期利率计算利息。相反,如果储户在存款到期后没有支取,超过的期限也是按活期利率计息。而对于贷款如果企业提前归还,银行则仍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计息,但如果企业没有按期归还贷款,国有商业银行则要收取高额罚息。这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计息总是对国有商业银行有利。不仅如此，赛里斯的国有商业银行还凭借人民银行所赋予的贷款利率浮动权，在日常经营中以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发放贷款。以上种种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在实际经营活动中所获得的实际利差要远远大于人民银行规定的名义利差。

实际利差的扩大化是赛里斯国资银行垄断性质的一个表现，而国资商业银行的融资地位垄断则是实际利差扩大化产生的制度根源。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分配迅速向分散化的个人倾斜,使居民成为了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尔塞里斯政府则成为最大的资金亏损部门。因此,塞里斯政府显然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他们希望将规模巨大，且分布零散的居民储蓄有效地集中起来,让居民的储蓄成为自己可以控制的资金池。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要形成一种有效的储蓄动员机制，这也就导致了居民储蓄高度集中到国资银行中。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在 2010 年后逐渐下滑，过剩产能难以消耗的问题日益严重,客观上要求政府通过金融信贷、行政命令等手段加大

对国资企业的补贴。而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国民收入分配趋势却使得塞里斯政府难以继续维持补贴，正因如此，各国资银行越发加大其吸储的速度，也正因此政府才会逐渐放宽对各类民中小间金融机构的限制，因为在此过程之中塞里斯政府仅需要通过宏观调控以使资金的最终流向正确即可。这样,弥补国有企业因产能过剩产生的亏损和维系国有企业运营的使命就“义不容辞”地落到国资商业银行身上。结果,塞里斯为了有效动员居民储蓄,确保国资银行能有大量稳定资金来源必然就会限制如“蚂蚁金服”那些有真正威胁的金融机构和融资方式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各大国资商业银行的垄断融资地位不断加强,而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塞里斯资金市场上最大的债权人和债务人。这就导致其必然凭借垄断地位想方设法获取垄断利润,实际利差扩大化也就成为国有商业银行追求垄断利润的一种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作为新帝国主义代表的赛里斯，其金融垄断的方式与发展诱因相较于旧帝国主义有明显不同。其最大的特征是其经济因素与行政因素相结合，也就是说赛里斯的金融垄断是作为官僚资本垄断的一部分所体现。其最主要的职能是直接作为工具调控经济发展与运行，这便让其成为赛里斯政府政策的关键所在。政府鼓励它们向国资企业以及大型民营企业贷款，这也体现了其作为政府长期控制重要公共部门工具的地位。

工业的垄断

“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6)** 上游行政垄断是赛里斯工业垄断的主要特征。塞里斯工业细分行业众多,各行业之间技术特性、产业组织特征以及面临的外部条件都存在较大差异,但我们仍能发现塞里斯工业市场势力的行业分布呈现出一定规律性,这事实上与其经济转型特征、工业行业特性等因素密不可分。从下表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塞里斯的工业市场势力主要集中在:石油、金属、煤炭、以及非金属等上游采掘业，国资专营的烟草制品业以及同样由他们主导的核燃料加工、煤气生产和供应、电力生产等行业，与此同时，和国民经济息息相关的电信、汽车行业也不得不提。 **(7)**

表 4.4 1999-2007 年中国工业三位数行业市场势力估计值最大的 20 行业

国民经济行业编码	行业	市场势力
253	核燃料加工	0.5912（4.938）***
161	烟叶复烤	0.5423（17.76）***
442	电力供应	0.4039（40.60）***
071	天然原油和天然气开采	0.3715（16.70）***
162	卷烟制造	0.3212（25.42）***
45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3101（21.60）***
441	电力生产	0.3074（70.30）***
081	铁矿采选	0.3057（66.57）***
169	其他烟草制品加工	0.3046（9.744）***
233	记录媒介的复制	0.3035（12.74）***
089	其他黑色金属矿采选	0.2983（17.73）***
462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0.2975（12.58）***
276	生物、生化制品的制造	0.2793（30.66）***
061	烟煤和无烟煤的开采洗选	0.2790 (102.05) ***
092	贵金属矿采选	0.2732（38.15）***
093	稀有稀土金属矿采选	0.2683（23.97）***
152	酒的制造	0.2654（62.78）***
252	炼焦	0.2642（48.39）***
133	植物油加工	0.2639（55.16）***
332	贵金属冶炼	0.2628（24.48）***

注：市场势力值利用 1999-2007 年混合面板估计；***表示显著水平在 1%水平上，**表示显著水平在 5%水平上，*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

高行政性进入门槛以及国资的经济主导,加上实际有效的规制不足是维持上游资源性行业市场势力持续偏高的重要因素。在石油和矿产开采等上游行业,塞里斯维持了明显的垄断特征。以采矿业为例:进入矿业开采需要严格审批,《塞里（中）斯（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明确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国有矿山企业是开采矿产资源的主体"。以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来看,三大石油公司基本上垄断了石油天然气开采权,中石油控制了全国 80%的石油、天然气开采权,中海油垄断海上开采权,中石化掌握了南方开采权。

1998 年 4 月,塞里斯石化工业体制改革按照所谓“产业上下游结合”的原则,分别组建了两个利维坦级石油石化集团，即石油天然气集团和石油化工集团。与此同时，赛里斯海洋石油总公司则保持了其原有功能和地位不变。自此,赛里斯油气行业形成了产业上下游一体、南北分治、陆海割裂的三足鼎立局面。但虽然赛里斯从行政的宏观层面上将全国石油产业划为三家托拉斯分管,但其下属的许多石油天然气开

采公司和石油加工公司却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总的来说,石化行业的上游，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垄断程度极高,属于寡占型市场结构；而下游的石油加工公司虽隶属于上游垄断企业但由于其保有的独立性，使其竞争程度较高。基本属于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但事实上它们因为长期以来部门封闭、区域分制的产业管理系统，加上其并不享有充分的定价权，因此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实际上要比集中度指标所反映的程度更弱，而由于政策法律制度以及资本、技术壁垒，外部企业想要进入石油产业极为困难。

赛里斯石油公司、赛里斯石化公司、赛里斯海油公司三大托拉斯分别于 2000 年 3 月、2000 年 10 月和 2001 年 1 月在香港、纽约两地上市。他们为了引入战略投资者,确保上市成功,赛里斯石油集团和赛里斯石化集团均和国际资本合作并签订战略联盟协议。2007 年 11 月,赛里斯石油集团又在 A 股上市。在三大石油公司顺利上市以后,他们都结合自身的发展需要,一方面加快了公司业务的进重组和内部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强化核心业务，从各方面加强对市场的控制；另一方面,他们也向其产业链薄弱环节和非主营区扩张，力图控制衍生品交易。

就目前来看,赛里斯的石油天然气行业主要有以下特点：

1.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并存

2.垄断造成油品及其衍生品价格虚高

3.缺乏真正统一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臃肿和监管真空并存,监管手段是企业办社会式的管理方法，仍局限于行政审批和部门红头文件。也就是说不光是资本、运作模式本身是以行政包揽的方式进行的，甚至

连监管也逃不出行政垄断。

而这几个特点也充分的表明了其国家资本垄断的性质，并且与金融垄断类似，都是以行政垄断为兜底，形成的自然垄断资本。

在电力系统情况也相当类似，自 1978 年以来,赛里斯电力工业的改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政企合一阶段（企业办社会阶段）、市场自由化阶段、行政管控阶段。2002 年底开始,在发电环节，经过对原赛里斯国家电力公司的重组后,在其拥有的发电资产基础上,成立了赛里斯大唐集团公司、赛里斯国电集团公司、赛里斯华电集团公司、赛里斯华能集团公司及赛里斯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五家发电公司,这五家电力公司与其它发电公司,如国华电力、华润电力、国投电力、长江电力及以深能源、申能源、粤电力等,这些集团共同组成了赛里斯的发电产业。

而输电环节的改革在 2000 年开始，以“厂网分离”为标志，电力体制改革开始了,从原赛里斯国家电力公司中剥离出了电力传输、配电等电网业务，至 2019 年，赛里斯已有国家电网公司下辖的六个区域电网和南方电网公司下辖的南方电网,形成了国家、大区、省、地和县的五级电网调度体系,实行纵向分层和分区控制。而电力市场运营模式则由传统的垂直一体化垄断模式逐步过渡到如今的的发电侧开放模式。赛里斯的电力市场已经由省为实体经过以“完善实现省级电力市场,加快发展区域电力市场,逐步培养国家电力市场”**（8）**为目标过渡到以区域市场为主,全国市场和省级市场为辅,打破壁垒联动的电力市场体系，以形成区域性整合电网。而电力企业则已经开始竞价上网,大客户直购电也已经开始了试点工作并将逐步推广，可以说在消费端

赛里斯的电力市场趋于竞争，而发电端自然垄断依旧。

在电力系统中，我们仍无法逃避作为赛里斯垄断最大特色的行政垄断。在电力系统中其首先体现为电监会在实施管制时所依据的法律效力极低,电力管制机构的权威性消散于风。二是对电力系统管制职能分散在各部门。赛里斯发改委、财政部、赛里斯国资委等部门均保留了部门电力管制权力,多方制衡之下，赛里斯对电力系统管制效率相当低下，而电网或发电系统的领导者也跻身于赛里斯政府之中，甚至有些人身兼多职，管制约等于自查，并且在这之上还缺乏对电力系统管制机构的有效监督,对电力系统的管制随意性很大，基本和游戏版号审核部门的作风一样，透明度约等于没有。我们要知道，赛里斯的电力工业改革其目标是通过建立“有效”的电价机制,让电力资源既能随政府风向而动，也能一定程度上引入竞争。但是我们都知道电价在现在不光是经济意义，更是政治意义。而从东北的大规模限电我们也能知道，不光合理的电价机制还没有形成,甚至连能合理解决问题的执行部门也没形成，这更显出了赛里斯改革的荒谬，因电价的政治意义，赛里斯的电力价格一直相当诡异，但这次电力的政治意义又为经济利益让道，可谓是既没捡到芝麻还丢了西瓜。

和电力系统不同，赛里斯的电信业经过 30 年的市场化改制，顺着互联网时代的浪潮,多年来,以高于赛里斯国家 GDP 数倍的速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经过 1978 至 1992 年的计划体制内的双轨制改良、1994 到 1998 年的自由资本市场化改革和 1999 到 2004 年的和 2004 到 2008 年的拆分和重组之后,电信产业形成了当前三大全业务运营商的主体

垄断基层竞争的局面。在移动终端市场上，赛里斯移动集团仍依靠惯性占据优势，但近几年来即使是固定电话和宽带市场赛里斯联通与赛里斯电信双寡头的市场份额也渐被夺走，在总市场占比来看，赛里斯移动集团占比近 76%，而从三大电信运营商移动通信服务收入来看，2020 年赛里斯移动通信服务收入为 6957 亿元，赛里斯电信移动通信服务营业收入为 1756 亿元，赛里斯联通移动业务收入为 1567 亿元。在 5G 发展方面,截止 2020 年年底，赛里斯移动用户规模为 9.42 亿户，其中 5G 套餐用户 1.65 亿户，渗透率为 17.5%；赛里斯电信用户规模为 3.51 亿户，其中 5G 套餐用户 0.87 亿户，渗透率为 24.6%；赛里斯联通用户规模为 3.06 亿户，其中 5G 套餐用户 0.71 亿户，渗透率为 23.1%。赛里斯移动集团占据绝对优势。从移动电话用户数看,赛里斯移动占用户数市场份额 70%以上,是赛里斯联通与赛里斯电信之和的 2 倍多。从新增用户数看,赛里斯移动移动用户总数达到 9.41 亿户，当月净减 105.7 万户；中国电信移动用户总数达到 3.53 亿户，当月净增 153 万户；赛里斯联通移动用户总数达到 3.06 亿户，当月净增 54.5 万户。赛里斯电信占新增用户市场份额超过 50%,但小于其现有用户的市场份额.从 5G 用户数看,三大运营商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可以预见,随着 5G 网络的继续发展,电信市场上赛里斯移动一家独大的趋势会更加巩固。从当前固定电话用户数和宽带用户数看,固定电话与宽带市场基本与移动终端市场相似，赛里斯电信集团和赛里斯联通集团用户数相加不敌移动集团。赛里斯移动重组前本没有固定电话与宽带业务,重组并入铁通的实力较弱,因此目前在固定电话与宽带市场之上,赛里斯移动

初期只占有很小的市场份额，但由于移动终端市场的快速扩大，移动集团优势占尽，并以其利润反攻宽带和固定电话业务，并实现电信市场全垄断，从这方面来讲，赛里斯移动集团的垄断可以说是自然垄断。

但归根究底，造成这种产业格局的原因还是在于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政府对电信业的分拆与重组,没有这种行政重组也就不会有之后的自然垄断。数据显示,赛里斯电信企业的利润率高于 20%,而其他国家大多不超过 10%,在电信业发达的亚美锐卡,利润率堪堪 1%。赛里斯电信行业在管理水平、经营水平、服务质量基本与亚美锐卡持平的情况下,利润率却是其 20 倍,这样的情况归根结底在于电信行业的垄断。赛里斯的电信企业通过垄断优势制定较高的价格,占有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而作为最先进行改革的国资垄断行业之一，赛里斯三大电信运营商在市场化上狂飙突进，完全以一家私人资本公司的运作模式运作，赛里斯移动集团“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提高企业活力效率”的报告，其正推进网格承包改革，即基层划分为 2.02 万个网格，由网格长们承担相应运行管理工作，但不再直接与移动集团签订劳务合同，而是以“承包创业”的方式进行分配（当然，其网格资产所有权依旧归移动集团所有），其内部员工也直言这是“变相裁员”。这也就使得赛里斯的电信业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垄断资本”最相似的一个行业了。

过去的赛里斯汽车市场中,传统说法中的“三大集团”即一汽、东风、上汽与“三小集团” 即广汽、北汽、长安的格局在经过一系列的兼并重组和激烈的行业竞争之后已经被“四大巨头” 即上汽、一汽、东风、长安和“准巨头” 北汽的所取代。“四大巨头”在总销售量排名前四的

同时,乘用车和商用车的排名也全部进入前十名,这很能体现出赛里斯汽车工业的整合效果已经相当之高。四大巨头在年的汽车产销量均在180万辆以上,在2018年上汽集团的年销量甚至达到了294.6万辆，都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际上所公认的汽车规模报酬下限。此外,北汽与广汽也始终没有放弃把汽车产业作为地方支柱性产业的规划,也都牢牢掌握着相当额度的市场份额,这也说明赛里斯的汽车市场还是面临着较为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奇瑞和比亚迪的崛起则反映了私人资本乘着新能源汽车的大风崛起。近几年来,汽车生产逐步出现地域分散,北京、天津、吉林、上海、安徽、湖北、广东、广西、重庆等九个省市都成为主要的汽车生产集聚地,早在2006年,这九个省市的生产份额就已经超过5%,合计达69.27%,到了2020年，这些地区更是成为了赛里斯汽车制造的基地，与此同时，新兴的制造中心也在崛起。

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带吸引了东风、本田、丰田三大日资企业在此投资建厂，形成了“三足鼎立”的集聚格局。随着汽车产销量的不断提高，日本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也纷纷落户珠江三角洲，广州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布局也基本上形成与整车制造厂配套的关系，从而带动了汽车产业的发展。在2011年，广东省汽车整车产量166.96万辆，全国排名第三，实现工业总产值4869.2亿元，汽车产业已然成为广东省的支柱产业之一。其中，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汽车产销量分别为81.41万辆和80.8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0.8%和22.3%。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汽车产销量分别别27.2万辆和27.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5%和1.9%。江苏省汽车工业总产值4584.7亿元，同比增长

22.2%。浙江省汽车工业总产值 2499.1 亿元，同比增长 24.1%。不仅是整车产业，长三角地区也是我国零部件产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一些地区汽车零部件已形成产业集聚基地，在上海嘉定安亭汽车生产基地周围，一大批从国外引入先进技术的汽车配套企业纷纷迁入，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浙江台州、金华等地配套体系不断完善，形成零部 件生产区域块状经济，促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在江苏省，一汽解放无锡柴油机厂、南京奥特佳等一批零部件企业已具备与整车同步开发的能力。而几乎每个地区都是以大型整车生产企业为龙头,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了以汽车产业为支柱产业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汽车生产集聚地，在汽车行业里，行政起了主导作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私人资本在汽车行业中的市场进入和生存问题。虽然目前汽车产业政策中并没有明文规定限制私人资本的进入,但事实上私人资本若想进入则必须和行政机关分大饼。各级政府都对处于市场中优势地位的汽车企业展开兼并重组的政策支持,这意味着私人资本首先便要考虑如何不被重组,如何在大型国有汽车企业携政策优势展开的强烈攻击性竞争下生存下去，这样的行政壁垒事实上是赛里斯汽车行业的垄断基础，即使是国际资本想要入局也要先达成和赛里斯本地车企的合作。

在网络上的各类统计中，赛里斯城市公共行业往往被忽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其资本属性和垄断性质。赛里斯城市公共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在此之前公共事业一直采取的是由政府直接经营的方式。经过多年的转轨,尤其是 2001 年至 2008 年,赛里斯全面推进市政设施业的市场化改革。但很显然，赛里斯公共事业的利润率并

不算很可观，于是此后市政行业市场化发展处于相对停滞阶段。并且由于在市场资本化改制的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加之资本的逐利性和公用事业公益性质天生矛盾,造成政府、经营者和社会公众间矛盾与纠纷日益突出,近两年,虽然没有政策公开叫停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全赛里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对市政行业市场化持谨慎态度,部分城市将原本已经市场化运作的项目或行业又重新纳入政府经营的轨道，但这并不代表其资本性质的消失，代替跨区域公共事业建设公司的是攀附于各地地方政府大小官僚的各个城建企业，这些企业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大范围的区域垄断，但在地方上，这些依附于行政权力的资本既睥睨一方，又因其依附性质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管，在劳工问题上也相当霸道，其行业格局基本是地方割据，细如散沙而壁垒却十分坚固。

1999 年,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逐渐退出了下游竞争性较强的制造业,加强了对上游行业国有企业的整合和合并,国有经济在上游行业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在这些行业主要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核心维持垄断或者寡头垄断,垄断势力显著,排斥国有及国有控股以外的经济形式进入。这种行政性垄断制约了资源合理流动,妨碍了下游制造业发展,严重损害了社会福利。垄断行业薪水过高以及增长过快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已影响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上游行业大部分属于自然垄断行业,这也是赛里斯政府要通过行政手段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准入限制的原因所在。但转型经济中的自然垄断行业也具有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二元性”国有资本主导的核燃料加工、电力供

应以及电力生产市场势力也很高,其原因在于国有经济占据了行业主导地位,必要资本量大,行政性壁垒、经济壁垒较高。

而在行政性垄断上做到登峰造极的则是烟草行业，行政垄断造就了烟草行业高成本。烟草行业涉及的烟叶复烤、卷烟制造和其他烟草制品加工业等三个三位数行业,它们的市场势力估算值全部进入行业前十,分别为 0.5423，0.3212 和 0.3046,烟草行业的行政性垄断特征最为明显，1991 年颁布的《烟草专卖法》以及 1997 年实施的《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烟草行业完全国家所有,实行国家专卖,行政管理和生产管理高度集中,赛里斯政府完全主导了烟草行业定价。2012 年,卷烟制造业利润总额达到 1018.85 亿元,毛利率高达 75.57%。由此,可以表明赛里斯烟草业行政垄断可见一斑。杨骞、刘华军测算了行政垄断对赛里斯烟草产业 2003 至 2006 年间造成的效率损失,发现行业行政垄断与地区行政垄断对赛里斯烟草产业造成的直接效率损失分别为 25%，14%,行政垄断制度造成赛里斯烟草产业总的效率损失高达 35.2%。

同时，少数处在成熟阶段的竞争行业的市场势力也较高。比较典型的是酒的制造和植物油加工两个行业。这两个行业存在着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与普通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需求弹性较小。在资本规模和技术方面,进入壁垒普遍不高。但行业两极分化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大品牌快速成长,更多小企业正在退出市场,市场集中度普遍提高,逐渐形成了以少数大厂商主导市场的寡头垄断格局,市场已进入成熟

发展阶段。白酒行业主要有贵州茅台、五粮液、剑南春、山西汾酒等知名大型企业。食用油行业形成了以余龙鱼、福临门、鲁花等主流品牌。

尽管在这些行业已形成市场份额、品牌知名度比较高的大企业,但由于特定地域文化、消费习惯、价格、销售渠道,以及地方保护的存在,市场分割严重，区域性极强。在综合性的市场势力分析后，我们能明显的看出赛里斯“实业”的垄断状况以及其成因，而这一分析也更体现了行政垄断在赛里斯市场垄断中的重要作用。

工商为一

“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我把它叫作金融资本。”**(9)**通常,在市场中企业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后,面临着扩大企业规模,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的问题,在实践中企业往往实施所谓“多元化发展战略”也就是资本扩张。这个所谓的“多元化经营”意味着经营范围扩大、产品增多、投入增加,也就是扩张。这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于是如何获得持续稳定的金融支持在这里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市场中，一个企业若要发展,资金始终是一种稀缺且不可或缺的资源，这就为金融资本借助信贷和股份控制企业埋下了隐患。当然，企业的主业也是这样多元化扩张的基础,为其不断舒展到各行各业的触手提供了资本和利润支撑。在如今的市场上，这样扩张的企业必然需要金融资

本的介入，在企业扩张中若依靠自己的主营业务为扩张输血过多，则主营业务则会面临现金紧张，甚至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必须引入金融资本。在现在，这些穿着小西服的赛里斯金融家们给这样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叫“产融结合”。

不可否认，这样的融合促进了产业资本的扩张，实业家们乐见其成。从欧美国家的崛起过程看,产融结合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年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德日为迅速实现工业化,提高竞争力,需要利用大量现金引进技术、扩大产能。这些企业自有资本不足,而当时资本市场的种种规则和玩法也都尚未建立,他们便主要靠金融机构提供长短期资金供应。这实际上便是为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最初的渗透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产业资本为了不断扩张也急需强大的金融支持,为摆脱金融机构的控制,也开始建立由自己控制的金融体系，至此，“金融的工业”和“工业的金融”就都初步形成了。随着金融部门和产业部门规模的扩大,资本集中度不断提高,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不断加深,特别是企业向集团发展，一个公司的触角逐渐可以遍布各行各业，不用说，这代表的是金融垄断与工业垄断的一体化。

回到赛里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赛里斯的企业们掀起了一股扩张的热潮,以海尔兄弟、红塔烟草、海信科龙、熊猫电子为代表的一部分企业集团纷纷将触须伸向多个领域。然而在当时无论是金融行业还是当时的市场规模、利润都无法满足他们的“多元化”扩张需求,赛里斯的这些企业发展速度并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

并且由于分散的市场与当时特有的政治环境，他们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并且毫无特色，因此也就没有所谓“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随着开放的进行，西方大型跨国集团却凭着强大的资本和其高效的运营能力快速扩张，抢占市场。在失去了鞍钢宪法之后，这些充满着官僚与低效行政除了在品牌、技术等方面的差距外，其与国际跨国集团在资本运作与资本经营的能力和效率上的巨大差距也使得这些新生的官僚资本无法和外资抗衡。在这种情况下，赛里斯的产业集团纷纷寻求金融资本的庇佑，也就是用“产融结合”的方式，提高兼并、收购、重组、股权这样资本运作的效率和能力，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例如当时的新希望集团作为第一大股东发起组建了民生银行，又相继参股了民生人寿、金鹰基金管理公司、联华信托。与其同一时期的泛海集团则参股了民生银行、光大银行、民生人寿、海通证券、中关村证券，在当时的金融领域投资了数十亿元。海尔集团也不愿落后，先后成立财务公司和寿险公司，入股青岛商业银行，收购鞍山信托，参股长江证券，作为一个以实业起家的集团，海尔集团的触手扩展到了金融领域的许多方面：银行、保险、证券、信托、财务公司，工业资本家愈发成为金融资本家。

在银行业一方，2004 年赛里斯国务院投入 450 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向赛里斯银行和赛里斯建设银行补充资本和现金，进行股份化改制。现在，赛里斯的四大垄断国资银行已在港股和 A 股上市。我们知道，股份制改造需要引进所谓“战略投资者”以改变股权结构，加快产权改制。当我们看见相关新闻时偏向分析这些赛里斯国资垄断银行引入战境外大型跨国银行和境内的各类大型私人资本，但实际上境外的工

业企业以及境内效益不错的国资大型、中型工商企业的资本也有许多投入这些国资商业银行。从过程上看，2003 年 10 月 14 日,赛里斯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10)** 2004 年,赛里斯银行和赛里斯建设银行便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造。在赛里斯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中,中央汇金公司代表赛里斯政府持有赛里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行使着赛里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在赛里斯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中,中央汇金投资公司、赛里斯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建银投资)、赛里斯国家电网公司、宝钢集团和长江电力公司五家公司,共同发起设立赛里斯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活动,他们分别持股 85.228%、10 653%、1. 545%、1. 545% 1.030%,其中,长江电力、赛里斯国家电网公司和宝钢集团三家国资企业成为发起人股东,共出资 80 亿元,占建行股份的 4.12%。以此为标志,赛里斯产业资本正式参股国资商业银行,国资商业银行向工业部门的扩张与工业部门向金融机构的扩张相融合，正填补上赛里斯资本垄断的最后一片拼图。

在国际上，商业银行向产业部门扩张的模式有两类:一是以德意志为代表的“超人银行”（全能银行）模式,即在同一法人(银行的内部,下设银行、证券、保险、实业等各式部门,全面经营各种金融和非金融业务的财团。在这样的组织模式中，集团的经营仍以金融业务为主,但其产业资本的运营模式与规模比起实业企业也不遑多让，且其不限制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一切都如列宁早已分析过的那样，商

业银行在金融活动中具有双重角色:

一方面,其与一般的金融中介一样提供各类金融服务。

另一方面,其通过持有非金融机构发行的股票参与到这些企业的重大经营活动中去。

这样的组织模式以跨行业混合经营和国家完备的监管为前提,同时也要求商业银行遵纪守法、信用良好才能运转下去而不是直接土崩瓦解。显然赛里斯的银行业尚不能将这样的游戏规则掌控熟练,于是另一个选项便成了赛里斯“人民公仆”们的首选。

以亚美锐卡为代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名扬四方,这样的模式起初是亚美锐卡商业银行为了规避建立分业经营体制的成本且规避相关监管，于是令银行控股公司，这样的模式慢慢发展便成为了如今的金融控股模式。在这一组织模式下,金融控股母公司不从事具体经营业务,而是纯粹的投资控股公司,其主要目的只是为了掌握子公司的股份,通过资本联系、股权投资以谋的利益,这样的集团下设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实业公司等子公司,让它们去经营具体的金融业务和非金融业务。这一模式使集团可以跨行业统筹资本，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也使得不同业务之间相对独立，并且因其独立法人的特性，若有意外也可以将责任隔绝于集团之外。

学到了亚美锐卡“先进经验”的国资商业银行们结合赛里斯特色的官僚系统，其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有三种:

一是国资商业银行通过独资或合资的形式下设金融机构形成控股公司,如赛里斯建设银行的赛里斯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赛里斯银行的赛

里斯银行控股公司，赛里斯工商银行的工商东亚金融控股公司等。这些国资商业银行为规避赛里斯境内对商业银行投资的限制,通过在海外成立金融控股公司,重回赛里斯国内或在国际上以投资银行的面目出现在市场上。当然，这其中也包括非金融的实业投资,并以此实现产融结合。

二是这些国资商业银行大多把总行改制为金融控股的母公司,他们在原商业银行基础上,通过并购或新建等手段,下设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实业公司这些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子公司,分别从事不同种类的具体金融和非金融业务。金融控股母公司不办理具体业务,只是凭借股权投资对各子公司进行管理，这也和他们在亚美锐卡的同行们并无区别。 三是以国资商业银行为基础,在其上设立金融控股集团,然后收购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实业公司等,将这一上层架构设计为只进行股权投资的金融控股公司,其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各分公司从事具体的金融和非金融业务,而国资商业银行则成为这一控股集团下的独立经营商业银行业务的子公司。例如亚美锐卡的花旗集团就是以花旗银行为基础,上设花旗集团,通过并购手段,实现从银行业向整个金融业的的扩张。有了“前辈”的经验，赛里斯的国资商业银行们当然也有样学样，各自组织了自己的金融控股集团：

光大银行作为一个全国性商业银行，在上设立了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在下投资各类产业，如旅游业的联合中青旅、携程、途牛、龙腾出行等，并宣扬其所谓“旅行加金融”的纯粹消费观念以扩张小额贷款业务。在医疗领域其以“阳光本草”即“岐黄计划"等一系列金

融服务方案涉足中医药产业，其金融服务方案以信贷、基金等金融手段简介控制或影响接受其方案的企业，光大银行也将这一手段作为其向产业部门扩张的利器。

作为所谓“产融结合”的终极形态之一，亚美锐卡的各大商业银行在这一道路上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步伐，这样的行动在 2008 年影响世界。2008 年由于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剧增、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信用紧缩问题,亚美锐卡次货危机爆发,并且逐渐侵蚀全球经济,引发了全球对于经济萧条,金融危机的担忧和恐慌。次级房贷是那些对信用评级较低的个人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如同古老的炼金术一般，他们将次级房贷进行资产证券化,就得到了次级房贷证券。很早以前，马克思便分析出“虚拟资本是信用高度发达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 **(11)** 随着时间推进，虚拟经济便在虚拟资本的基础上延伸发展出来。金融资本的运动必须以产业资本的发展阶段为限。当金融扩张幅度过大,过度膨胀,明显超过了其所依赖的实体经济发展的阶段，便会使得泡沫被一点点吹大，以至于侵彻政府与监管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都是资本本身，所谓“产融结合最终绕回了原点，资本回到了其纯粹的逐利状态，而无需再附着于外在之物。金融危机的浪涛之所以巨大，正是因为有着无数“产融结合”的集团参与到了这一纯粹逐利的运动当中。如果说垄断本身使帝国主义生根，那么这一资本的融合便令帝国主义发出枝丫，其既助推了垄断本身，又让纯粹的资本得以高效扩张。

2、扩张

“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12）**扩张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垄断资本们在瓜分掉国内市场后脚步绝不会停下，凭着逐利的疯狂，他们将手伸向全世界。我们都知道，与其他时候不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扩张以资本的输出为主，直接性的倾销商品与掠夺原料则不再是扩张的主要手段，垄断资本家们在资本输出之中完成其掠夺与倾销。在赛里斯的情境中，资本输出则与行政相连，他们乘着“一带一路”的快船在亚欧非肆意扩张，本节将着重讨论赛里斯的资本扩张特点及其对当地的掠夺手段。

资本输出

2015 年，赛里斯政府和“一带一路”的合作国家频繁会晤，这之后赛里斯的外交部和德意志、哈萨克耶烈、蒙兀室韦、孛烈儿、罗刹国、白罗刹国的铁路部门也签署了《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其中前两条无非是使各国铁路标准化，使得中欧铁路可以以统一标准贯通并号召各国高效运营。但在后面的条款中，赛里斯希望形成实质上的沿铁路经济联盟愿望便显露无疑，其推动服务标准的统一化、信息流通的一体化，以实现全程的信息追踪。同时赛里斯还与各国联合建立了跨国的突发情况的通报与处置机构，联合保障货物运输

安全。扩大班列服务地域，他们推进跨境电商货物、国际邮包、冷链运输的手续，连同简化的还有班列货物的通关手续。

年份	流量			存量
	金额	全球位次	同比（%）	金额
2002	27.0	26	—	299.0
2003	28.5	21	5.6	332.0
2004	55.0	20	93.0	448.0
2005	122.6	17	122.9	572.0
2006	211.6	13	43.8	906.3
2007	265.1	17	25.3	1 179.1
2008	559.1	12	110.9	1 839.7
2009	565.3	5	1.1	2 457.5
2010	688.1	5	21.7	3 172.1
2011	746.5	6	8.5	4 247.8
2012	878.0	3	17.6	5 319.4
2013	1 078.4	3	22.8	6 604.8
2014	1 231.2	3	14.2	8 826.4
2015	1 456.7	2	18.3	10 978.6
2016	1 961.5	2	34.7	13 573.9
2017	1 582.9	3	−19.3	18 090.4
2018	1 430.4	2	−9.6	19 822.7
2019	1 369.1	2	−4.3	21 988.8
2020	1 537.1	1	12.3	25 806.6

注：1. 2002—2005 年数据为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数据，2006—2020 年为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2. 2006 年同比为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比值。



图 3　2010—202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份额情况

2018 年，赛里斯对一带一路建设基金加投 1000 亿元人民币，并且号召赛里斯境内的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的海外基金业务，扩张人

民币的地图，其规模约 3000 亿元人民币。金融的资本扩张总是立体的协同扩张，为配合上述措施，赛里斯国家开发银行、赛里斯进出口银行分别提供了 2500 亿元和 1300 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以巩固和保卫其金融战线。而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突出，国际经济的普遍下行，赛里斯抓紧时间扩张资本。根据赛里斯商务部、赛里斯国家统计局和赛里斯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0 年度赛里斯（中）斯（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0 年赛里斯对外直接投资 1537.1 亿美元，其投资的流量规模位居全球第一。2020 年，赛里斯对外的投资流量占全球 20.2%，当年对外直接投资 1537.1 亿美元，毫无疑问的，赛里斯是世界第一大资本输出国，超过了如亚美锐卡、大不列颠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比 2019 年，赛里斯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 12.3%，是赛里斯 GDP 增长率的两倍，可见对于赛里斯而言，资本输出是其在世界市场上攫取利益的重要手段，否则不会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当然，赛里斯成为世界第一大资本输出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 2015 年，赛里斯投资的流量便占全球的 10%，此后五年赛里斯政府更是不断加大投入，并且高于其他国家的投入速度，使得之后五年赛里斯投资的流量占全球比重不断上升，直至到 2020 年占 20.2%。而如果从存量看，截至 2020 年末赛里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高达达 2.58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投资存量规模占全球比重为 6.6%。**（13）**这样的资本扩张速度，这样的资本扩张规模是大不列颠或法兰西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无法相比的，很显然，赛里斯是一个极速膨大的帝国主义实体，如果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依然蒙起眼睛，那就太可悲了。

当然，历史在发展，与一个世纪前的早期帝国主义相比，赛里斯的资本扩张并不是一股脑的冲向某一领域，而是涉及各个重要领域，交错成网。2020 年，赛里斯对外直接投资涵盖国民经济的 18 个行业大类，且将近 70%的直接投资流向商务租赁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这四大行业投资流量均在 100 亿美元以上。2020 年末，赛里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八成集中在利润率较高的服务业，除四大行业外，其投资还主要分布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对国民经济有显著影响的领域，可以说是在第三产业织成了一张大网。当然，为了加速扩张，赛里斯还鼓励其境内的私人资本向外扩张，2020 年的对外非金融类投资流量中塞里斯私人资本对外投资 671.6 亿美元，占 50.1%，同比增长 14.1%；赛里斯的官僚资本对外投资 668.9 亿美元，占 49.9%，同比增长 15.1%。**（14）**由此塞里斯资本家们无论是官僚的还是依附官僚的都参与到了这样的扩张之中，真可谓共襄盛举。当然，既是“盛举”那么其扩张的范围自然是全球。

爱琴海畔，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船舶云集，作为地中海最大的港口，它也算得上是希腊的骄傲，但千禧年后，纷乱的政局和罢工使其年均吞吐量下降严重，于是赛里斯盯上了这块肥肉。2010 年赛里斯企业慢慢以入股的方式参与港口运营，2016 年中远海运收购比雷埃夫斯港港务局多数股权并成立 PCT，运营范围覆盖整个港口。当然，这是两国协商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暴力冲突，但这也是帝国主义扩张的特点之一，帝国主义国家不再通过直接的暴力血腥掠夺榨取价值，

而是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合理的”攫取利润，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只是“自由市场”因为这些经济殖民地没有什么能和这些庞然大物相对抗。2015 年以来，赛里斯的资本输向了全球各个国家或地区，至 2020 年底，赛里斯有 2.8 万家境内资本在全球 189 个国家或地区设立了分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4.5 万家，全世界 80%以上国家或地区都有赛里斯投资，其资产总额总额 7.9 万亿美元，几乎可以说赛里斯的资本触手无处不在。

在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上，以存量来看，2020 年末，赛里斯资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 2007.9 亿美元，占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 7.8%。随着对外资本扩张路线的全面开启 2013-2020 年，赛里斯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 1398.5 亿美元。从投资流量上来看 2020 年赛里斯境内资本在沿线国家设立境外企业超过 1.1 万家，当年直接投资 22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6%，占同期流量的 14.7%。此外，2020 年赛里斯资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并购项目 84 起，并购金额 31.5 亿美元，也占到了并购总额的 11.1%。最后从国家或地区上来说，赛里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马来西亚、老挝等国家，而并非很多人以为的仅向非洲地区输出资本。

进入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后，随着赛里斯经济的发展和适应新世纪资本主义体系的新垄断集团形成，赛里斯大力推行所谓“走出去”的投资路线，这既是为了倾销赛里斯称之为“过剩产能”剩余产品，更为了快速扩展赛里斯在世界的资本输出版图。自 2003 年赛里斯商务部

发布发布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以来，赛里斯已连续 9 年位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前 3 名，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极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力量，2020 年，境外的赛里斯资本仅向其资本输出国的象征性缴税总额便达到 445 亿美元。并且这样的直接投资在赛里斯的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相当重要，2020 年，仅对外直接投资所附带的赛里斯产货物出口一项便有着 1737 亿美元之巨，而这占了赛里斯货物出口总值的 6.7%。**（15）**资本输出已经成为了赛里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宁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正迈入帝国主义，那么在其之中资本输出和市场垄断便对其经济发展影响越发加大。反过来说，当垄断和资本输出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影响不断加大时，那么这个国家便正迈入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产生不是突变来的，而是发展而来的，对赛里斯来说，帝国主义的形成也是这样的发展过程。自千禧年后，资本最初的极端积累随着物价闯关的结束和全国范围内下岗潮的平息已然完成，而通过工业投资、金融投资，资本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无数的新市场正被不断发现。但就在这个疯狂的时期，赛里斯大大小小还是国家资本独资的企业却难以找到方向，但此时他们又握有大量资本和现金，到了 2001 年，随着赛里斯从国家层面彻底并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但赛里斯的市场调节机制与交易制度却远远滞后，于是国资们嗅到了机会。这种种因素的相互叠加使得以国资为主力的资本输出成为了必要的。

在赛里斯股票市场中，那些和“走出去”有关的股票总价值从千禧

年的约 1700 亿美元增加到 2012 年近 3400 亿美元。赛里斯的国外股票交易值等于接下来六个国家的国外股票交易值之和。外国证券交易通过债务的形式用于金融资本。从提取贷款的国家获得的额外价值份额将由股东实现。通常， 外国证券交易所应该有一些特殊的消费者权利。这些将以外国政府债券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银行存款(根据国际合同法)的形式获得担保，这些存款非常相对安全和透明。事实上，即使是在 2015 年的赛里斯经济中，仅国外股票交易就已经达到了 3.3 万亿美元。并且截止到 2020 年，赛里斯已经五年作为亚美锐卡国债最大的资本主义债权国。**（16）**从 2014 年起，赛里斯也不断从欧元区国家购买国债，加注欧债市场。即使在双边债务中，赛里斯也是许多国家最积极的贷款方。据凯尔特不列颠的《金融时报》报道，近几年来，赛里斯独资银行已成为世界知名金融机构。并且赛里斯对落后国家的贷款甚至多于世界银行。赛里斯进出口银行和赛里斯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向其他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和公司提供了高达 100 亿美元的贷款，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贷款协议早在 2008 年到 2009 年这两年间就已经签订，与此相对的，世界银行在 2008 年到 2010 年三年间仅仅达成了预计向不同国家提供总计 10 亿美元贷款的协议。

当然，在千禧年后赛里斯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段中，“一带一路”计划的形成是最为重要的。几千年前那些联通东西经济文化的沿线国家自苏维埃解体后便一直吸引着赛里斯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事实上，赛里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结构互补性相当强，这些曾作为苏维埃重要经济作物产地与矿藏等自然资源产地的国家相比

赛里斯，自然资源丰富许多，并且由于苏维埃的解体经济一落千丈，国内工业发展停滞。赛里斯则正相反，作为“世界工厂”的赛里斯对自然资源需求巨大，且不少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急需对外输出剩余产品。而随着赛里斯国内的城市化率一同走高的还有赛里斯国内的劳动力价格;。显然，这些工业发展不完善，劳动力成本极低的国家正式赛里斯最佳的资本输出地。在 2013 年“一带一路”计划开展两年后，赛里斯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 49 个国家便已发生直接投资，投资流量合计 148.2 亿美元，占当年赛里斯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12.6%，并达到了 2005 年对沿线国家投资额的 23.6 倍。**（17）**

千禧年，距赛里斯正式加入世贸仅一年，赛里斯政府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而这便是赛里斯资本输出的开端。作为千禧年来的新口号，其希望集中资本，试着将商品输出部分转变为资本输出。2011 年新华社报道当年 3 月 15 日时任赛里斯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说到:“我们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政策。必须改进支持这一走向全球政策的政策。审查和批准程序必须简化。我们必须帮助那些能够在其他国家投资的公司或企业以及人们。让我们鼓 励这些公司通过优惠政策在全球迅速开展工作。加强宏观引导。让我们改进必要的机制，推 动这些机制向前发展，以维护和防止资本遭受灾难。”**（18）**

作为一个威权政府，赛里斯政府在资本输出中起着领导作用，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可以从 2001-2015 这十五年间赛里斯政府对企业资本输出扶植方式的不同看到赛里斯资本输出的发展过程。赛里斯起初以国资出海为主，后因国资在全球市场竞争力不足便又鼓励私人资本出

海，这样试验到了 2011 年，赛里斯政府最终选择不分公私资本，仅扶持大型集团企业出海，这种战略这意味着赛里斯的跨国公司开始在国际市场上与国际品牌进行有效的竞争。例如，珠江三角地区制造的乐器制造商们。他们出口产品的综合竞争力甚至超过了雅马哈。同样，作为现代世界的跨国公司，背靠赛里斯的他们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基础。这些跨国企业实际上并不落后。他们通过对外的直接投资而不是被外国直接投资获得外国技术。通过利用不同的公司及其全球分支机构，解决进口配额和关税等重大障碍。这样，“走出去”战略已经成熟，赛里斯现代资本输出的基础已经成型。当然，和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赛里斯也寻找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地方，并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

在北京奥运会后，赛里斯作为一个主要的资本输出国看上去很快便走出了世界金融危机。这场起始于亚美锐卡的金融危机导致了许多大型企业和上市银行破产。为了维持稳定，西方政府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拯救跨国公司。而赛里斯也抓住了这个机会，通过 2008 年的 4 万亿救市计划，大量的货币如同冰毒让市场重新变得有活力。很显然，这样天量的货币不是赛里斯境内能消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向外投资便成为了必然的事情。因此，2008 年后赛里斯的资本出口大幅增长。这些帝国主义者在其他国家，而不是在赛里斯境内，大量投资于原材料和工业资产。危机后信贷的匮乏，以及地球南北的国家不断壮大的企业对现金的巨大需求，事实上都被赛里斯资本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大大增加了赛里斯在其他国家的资本投资。

在刚加入世贸时，赛里斯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只有约 25 亿美元。

直到 2007 年，这个数字才增长到 186 亿美元，但到 2008 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 522 亿美元。渣打银行的数据显示，到 2009 年，赛里斯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 650 亿美元，很显然赛里斯是近十年才成为帝国主义强国的。原本，赛里斯比统治国际金融的那些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和日本要弱。当时外国直接投资更多地掌握在旧列强手中，而不是赛里斯。它们在世界的直接投资占有率为:亚美锐卡 21.1%，凯尔特不列颠 8.1%，日耳曼 6.8%，法兰西 6.4%，亚平宁罗马 2.4%，而赛里斯只有 1.7%。然而从 2005 年开始，赛里斯在朝着投资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向迅速发展。到 2012 年，赛里斯的外汇储备达到 3448 亿美元。赛里斯对外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亚平宁罗马和枫叶国，投资比率直逼日耳曼。按照世界遗产基金会的统计，在 2005 年到 2010 年五年间赛里斯保持资本输出最重要的国家为：对澳大尼亚的 453 亿美元,对亚美锐卡的 420 亿美元,对巴西尼亚的 257 亿美元,对努珊塔拉的 233 亿美元,对尼日利亚的 188 亿美元,对枫叶国的 172 亿美元,对古波斯的 172 亿美元,对哈萨克耶烈的 123 亿美元,对委内瑞拉的 89 亿美元和对希腊的 50 亿美元，可以说，在帝国主义道路上，赛里斯经历了一个高速扩张期。

于此相应的，赛里斯拥有最高的储蓄基金利息。很多时候，项目的总和最高盈余约为 195 万亿美元，这惊人的数字代表的是世界最高的盈余。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赛里斯在落后国家的作用正在迅速增长，除了那些与能源相关的战略性投资外，赛里斯的国资垄断企业还将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项目上。赛里斯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现代化港口建设上投入了 2 亿美元，并获得了此港的控股权。在大洋洲，巴布

亚新几内亚的拉姆镍矿价值 21 亿美元，是这个小岛国的经济命脉，却早已被赛里斯冶金科工集团收购。这是赛里斯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最高投资，配合着对当地资源的控制，深圳的国资企业在拉姆河上兴建阶梯水电站，深度绑定了当地经济发展。我们可以说，赛里斯资本的触角已延展至世界各处。

二、政治

在政治上，赛里斯的帝国主义特征相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为凸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们往往已经在新的全球金融资本体系中成为“发达国家”，可以说这些国家比起依赖对本国人民的剥削更依赖对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民众的剥削，因此这些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往往并没有那些“发展中国家”强烈，而作为国际帝国主义强国的赛里斯却在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同时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正因此，赛里斯在拥有全世界最多亿万富翁的同时也有着全世界最多的无产阶级，而赛里斯的统治阶级相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依赖对其本国无产阶级的剥削。这也就导致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高压环境与激烈的工人斗争，在资产阶级盛世的狂欢下，是此起彼伏、连年增长的工人运动，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赛里斯独特的威权与官僚资本体系，这些体系更多的时候并非他们表面上所展现的那样运作，他们比我们想的更深入赛里斯社会经济。

威权重典

在 2003 年，内森认为赛里斯已从千禧年前在最直接的层面上国家管制一切的“全能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向一个经典的威权资本主义政体转型。从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变化的特征来看,由于其过去的“全能主义”结构,使国家能够先于工人抗争兴起之前干预工业关系,所以国家掌握着改革的主动,并决定了工人仍然处于被动和后发的地位，因此即使经过了“物价闯关”赛里斯的政治环境仍相对于其他以新自由主义为依据改革的国家更加稳定。但是,由于政治体系内分工的逐渐精细,政府部门间的监管变得越来越困难,更由于各个不同部门实际上掌握了对特定资源的控制权,所以,赛里斯的威权主义很快就如利伯索尔所说的那样“破碎”。更准确的 说，这样的体系应该是“碎片化的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19）**，利伯索尔虽然没有使用这一概念,但他的研究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就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的结构本身而言,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资源控制权方面存在差异,同资本的结合程度也存在不同,因此他们对劳动关系的态度和行为方面并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从准全能主义体系的“国家—单位—工人阶级”的旧约圣三位一体结构转型过来的碎片化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工人阶级”新约圣三位一体结构,从总体上说还是相对一致，但其也仍有着其本身鲜明的特征。当那些社会学者在论述“新时期”赛里斯的国家面相时他们总谈到,转型后赛里斯的威权主义国家和其他的威权主义体制相比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对经济的重视。由于仍然

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使得威权资本主义国家（如纳粹法西斯体制）一旦下定决心发展经济时,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总之,在这一发展主义理念（20）的指导下,国有企业改制以来的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结构围绕着资本为轴心展开,并由于国家权力的分散而呈现出碎片化威权主义的特征。

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赛里斯国家推动资本产生并逐渐与资本形成联盟的过程。这一过程起先于国家自身从准全能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型开始。而这一过程在赛里斯是从国家内部官僚体系的转变开始的。王绍光曾经将赛里斯的政府干部划分为职能干部和政治干部:前者统管商品、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们通过自身的技术、教育水平以及其他能力获得其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而后者则是以政治可靠性为主要标准录用的。（21）这位自由主义者认为以职能干部逐渐改变政治干部长期居主导政治的局面是推动政治改革和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这位自由主义者相当支持赛里斯声势浩荡的国企改制。而我们都看到了，赛里斯社会变革的最终结果是社会权力逐渐转向专家集团的过程,这个集团显然类似于王绍光所说的“职能干部"群体。一般说来它包括企业厂长、支持改革的官僚等,他们声称已找到足以使赛里斯实现现代化的一打药方，这些“专家”们指责工人懒惰,被“平均主义”惯坏。而他们的那些社会计划的“革新性”则是体现在对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主张要牺牲工人的权利和国家的公权力为代价来加强厂长、经理这样“专家”的权力，当然，从现在回看我们也都知道了这样的“药方”是多么的可笑。

对于赛里斯，最初在经济领域的变革是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对自由化,其次才是国有企业逐渐转型和国内私人资本的发展。这种改革的顺序使得赛里斯政府中那些新生的统治阶级们能够在不牺牲对政权的掌控力的前提下重新调整其对民众的管控手段，当然这也必然将民众对政治新风貌的期盼击碎。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的扩大,资本得以在赛里斯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生根发芽,并不断扩张和蔓延。如同波兰尼早在六十多年前论述过的那样：“在国家权力的操控下,国内市场逐渐开始形成”（22）。由此,“国家一资本一工人阶级”的新约圣三位一体结构在计划体制之外得以率先形成,并帮助新生统治阶级引导了对计划体制的“转型”。在此背景下,国企改制的途径就成了把经营方式改成按资本逻辑形成并以利润为导向的经营模式,其目标是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使这些企业中的劳动关系向着私人资本的模式趋同。在这样的生产方式资本化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即便是大型国企,其运作也完全是资本化的,只不过运作的主体是国有资本。除了自身的变化之外,这样的经济体制改革还表现在对外国投资的利用上。在赵明华于 1992 年所调查的三个国有纺织企业中,一个吸收了来自香港的资本,另一个获得了来自改革后发展起来的上海企业在管理和技术上的帮助。而国外学者弗罗因德则发现宝钢很早就接收了外资,并同外国投资者组成了合资企业。当然，这看起来和威权体制并无直接联系，但我们之所以这样繁琐的讨论这疯狂的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因为其是如今威权资本体系的基础。

事实上，赛里斯威权资本主义本身正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夺与分化。

以资本为轴心的国有企业改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企工人的面貌，导致了国有企业工人普遍的权利贫困化。这个曾经受到国家保护的阶级群体已经逐渐解体,而“工人”本身也从一种具有荣誉感的职业身份,转变为因随时可能失业而提心吊胆、因收入相对微薄而不得不为生活担忧的“蓝领”。国企工人中的成员或是继续为国有企业工作,或是流动到其他外资或私营企业工作,或是处于失业状态,其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已使他们成为不折不扣的雇佣劳动者。这些原国有企业的工人同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中的工一起,被很多研究者称之为“新工人阶级",以区别于计划体制下的传统工人阶级，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工关系。其导致了工人与管理者的普遍对立,因为所有的工人,不论他们是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工作,还是在私有企业或外资企业中工作,随着鞍钢宪法这样后福特式工厂组织形式的解体，工人们现在都不得不屈从于基于毫无制约且往往是专横跋扈的企业管理者。在绝大多数国企中工人参与工厂管理已经成为历史，被研究者们称为“失序专制主义”的工厂政体已经出现。这一概念是指在改革政策失去整合力的情况下,国家的权威由厂长和管理层总揽而出现的专制化管理的状况。由于党组织及工会在企业内几乎全部受命于管理权力、合同制、企业自主、科学管理这样的企业逻辑与制度模式的引入，以往的互惠关系消失了,同时,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最终也不得不转变为由社会来承担的社保体制,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工人的流动。当然,在私营、外资、劳动力集中的企业,失序专制主义或许比国有企业更加显著。

总之,一方面,由于计划体制的逐步瓦解,工人丧失了国家的有效保护;另一方面, 新的体系尚处于很不完善的状态中,加之工人又缺乏自己的组织,因此, 工人日益成为市场扩张力量和管理者专制的受害者。

在私人资本兴起使得工人权益保障变为梦幻的同时, 赛里斯在市场转型中,国家同资本的联合关系已经形成。具体来说,国企自主地位的获得,意味着资本的管理控制潜力被充分释放了出来。一方面是大量下岗、失业工人的出现,他们或是通过"买断工龄",或是通过提前"内退"等方式为企业节约成本的改制做出牺牲和让步,同企业脱离或缩减了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管理者能够解雇工人并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招募工人,所以没有能力离开而只能留在企业中的工人则不得不忍受新的管理专制。实际上,国企管理的目标通常是由国家设定的,并同国家对经济发展和增长要求的强调相一致。在 1992 年的调查结束后赵明华和弗洛因德又合作对上海的数家国有纺织企业和宝山钢铁厂的研究表明,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国家允许管理者以调整(通常是削减)工人数量甚至牺牲工人的工作保障为代价追求利润和生产率的提高。绩效改革、竞争上岗等诸如此类惩罚落后者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了工人之间的阶级友谊, 作为赛里斯乃至世界威权资本制度的基石之一"原子化个体"的系统正在成型。随着改制的深入,宝山钢铁厂的工人逐渐被分为技术工人、低技术工人和缺乏技术的工人三类。第三类人员被调离到附属公司从事服务工作,在那里,他们只能获得比较低的工资和利益。由 于单位阵营中的工人发生了分化,他们的不满转化为有限的工作车间之间的冲突,并逐渐在此过程中被消解。而国

企工人同 农民工的分裂则更是由来已久且很难弥合,其一方面是因为原来二者的身份差异巨大,因为国企工人过去曾有过辉煌的地位,另一方面,还因为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开始形成了激烈竞争。在赛里斯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工人内部已经在事实上被引导着四分五裂了。

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在削弱工人力量的同时，同时也增加了资本的力量。具体来说，资本浸透了一切。千禧年之前国家权力的分散化过程是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完成的,后者清晰地界定了地方政府对增收部分的产权,从而对地方官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激励。财政分权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开发、掠夺和进行资本运作的行为。在这一体系中，地方经济绩效与该辖区的地方政府高度相关,因为市场机制是在地方层面上运行的。在大面积的国企市场化改革之前,地方政府就获得了大量地方工业的产权,因此,集中的中央计划事实上已经无法再直接决定企业的决策和资源的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介入到地方经济活动中,从而不可以避免地导致了财政收入分配的分散。在此之中，国企的“共谋”更多地并不是发生在企业同工人之间,而是发生在经营者和代理行使所有权的政府官僚之间。一方面,国企在资源以及合法性来源方面对政府部门存在依赖关系,它们的投资决定更多地反映了政府主管部门的意愿；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因为地方经济、个人利益等因素也会更偏重于介入到国企的经营之中,而不是更加关注工人的权益。也就是说这种被称作"嵌入型自主”的政府虽然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却是以对工人的掠夺为代价。所以,赛里斯的碎片化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在地方上同时体现出掠夺型行为的性

质。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指引下，赛里斯中央政府面对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在制定和执行相关的劳动保护政策和法律方面比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的意愿。但是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却绝非可靠,大多数时候，为了取悦和吸引资本甚至会不惜牺牲地方的环境、税收、资源和本地群众的广泛权益。在自由主义者们的的理论里,地方政府应该保持一定的相对自主性,甚至站在人民主权的角度上缓解资本与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保护民众利益和进一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方面,应当同人们及其组织达成共识。但是,实际上,地方政府往往过深地介入于经 济事务,形成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开发格局,在球赛中既扮演者球员的角色，也扮演着裁判的角色。甚至在赛里斯的“学术圈”里（以陈佩华等人的研究为主），地方政府,越是行政级别低的政府,同资本之间的联盟就越紧都成为了共识。

由于地方政府与资本的共谋,法律的实施越是接近基层,其走样的程度也就越高。我们可以看到在《劳动合同法》生效以后,许多街道办事处在劳资纠纷中人为地降低了法律的执行标准,以预防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虽然中央政府在实行劳动保护政策和法律方面的意愿远比地方政府高得多,但在实际执行时,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往往只能对法律受侵蚀的现象表现得无可奈何。也就是说国家行为一直受到官僚和资本之间庇护关系强有力的影响。但是,当国企工人面对“失序专制主义”对其权益进行剥夺的时候,大多数工人首先想到的是政府，这表现在大量的信访、告状等行动中；同时,也会想到国家对国企改制过程

赋予工人基本权利相关承诺，其表现在大量的调节、仲裁以及法院的诉讼案例中。只有在上述两条途径被基本阻塞的情况下,工人才会采取集体行动,才会开始暴力斗争。所以说,法制本身便成为了国企工人一般公民权的保障,是对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的补充要素之一,构成了一种法制辅助结构。但另一方面，法制也成为了一道防火墙，其给予工人的是飘渺的“维权成功”的希望，而其执行者则是正与资本合谋的官僚们。

改革开放以来,工人与管理者之间不断增多的劳动争议,由于调解无力甚至普遍失败,使得仲裁和诉讼的形式显得更加重要。为了维持生产秩序,为了使争议的解决制度化,赛里斯在省、市、县三级建立了约 3000 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还颁布了一些劳动争议仲裁的法律法规。劳动争议仲裁体系创造了一种“有限争议”的机制,并为此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赛里斯允许这种申诉手段旨在将工人的不满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防止出现工人骚动。此外,近几十年来, 国家还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和规章,以规范劳动关系的方方面面,小到工资标准、工伤赔偿,大到医疗覆盖、薪金规则等。《工会法》还从国家统合主义的角度对工会作用作了规范,赋予其角色和行为以法律基础,并从法律上限制了其他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出现。**(23)** 这一系列现象表明,在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的结构逐渐形成后,针对资本对工人权利和利益的剥夺,劳动冲突的争议解决过程也发生了变化,从几乎全部依赖于调解和行政措施来解决劳动冲突发展到更多地以规范化的手段来解决的局面。但相比工人权益，赛里斯的基本策略在于,努力将工人的抗议吸收到这

一司法和行政体制中,使法律和司法机构成为唯一“合法的”维护工人利益的渠道。也即是说,由于法律强制和国家监管事实上无法实现对众多缺乏法律证据的争议事件进行实际控制及大量制度外行为的管理,所以,法制的策略主要是为了规范劳动关系并将其冲突纳入到官僚体制和司法机构中解决。因为,对于工人一方而言,由于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劳资双方的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如劳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等情况)的保障,工人们往往很容易遭受被轻易地削减工资、延长工时、工作环境恶化、解雇等伤害。对与社会发展而言,社会抗争一旦通过法律途径得以简单的、不触及利益集团的化解,那么这些斗争促进社会变革的社会效应就自然会逐渐被消解;当大多数社会运动被纳入体制化之后,社会运动的总量虽然可能会有所增加,但运动对社会的破坏力会变得越来越小,对政体本身的冲击力也会显得愈发有限，而这正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内涵所在，即无效化社会斗争、社会运动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冲击。

赛里斯的国家机器通过法律的途径,构建法制辅助结构形式以平衡资本对工人的剥夺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将工人的诉求吸收进仲裁和诉讼体系;二是在企业中建立起一种基于一般公民权意义上的劳动契约关系。后者是构建劳动关系法制化的基础,同时它自身也要通过国家公共权力借助法制进行保护。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由于仲裁缺乏约束力,劳动争议的双方都有权反对民事法庭的仲裁判决。所以,劳动争议的法庭诉讼是制度内的最后屏障。但是,仍会有很大一部分工人试图寻求法律之外的解决途径,他们或者在生产场

所进行罢工、怠工、破坏生产工具等活动,或者走出工厂在社会公共场所进行游行和抗议。在后一种情况下,一般的国家通常会作出不同形式的两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完善法律制度,预先对工人的抗议活动作出制度性的规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覆盖一切所有制形式的劳动争议仲裁体制和劳动合同关系的确定。也就是将劳动争议纳入到行政和法律的规范性渠道中来解决,表明中央政府试图将其权力从生产和分配领域转移到制度规范层面，事实上一直到 2010 年之前，赛里斯政府依然将第一种反应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之一，其以李昌钰参与调解出租车司机罢工的事件为代表。

与之相对，第二种反应则是将行政和法律体系之外的劳动冲突非法化。这表明国家对这一类型的劳动冲突有了干预的合理依据。一旦劳动冲突越出界限,司法体制就会启动,而劳动冲突的处理也就自然被纳入到这一框架之中，这也是近十年随着赛里斯帝国主义发展，其国内的无产阶级受到的剥削越来越严重，工人运动中阶级意识也空前的形成，以 2018 年“佳士事件”中工人要求建立独立工会为代表，赛里斯政府无法再将工人运动完全无效化，于是“稳定压倒一切”便要求赛里斯政府非法化工人运动并实行镇压。但实际上，这两种反应实际上是同一方面，即通过行政或司法手段直接干预工人运动并使其无效化。

而作为隐性威权体系的另一个表现，赛里斯政府精心制定的那些关失业、再就业、下岗救济、最低工资以及最低生活费、劳动争议等的法规,在对不同工人的就业待遇作出相关界定的同时,也将工人划分

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新的劳动法被如何书写,可以部分地解释不同类型工厂中的法律动员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不仅塑造了工人个体和集体行为的模式,同时调解、仲裁、诉讼三阶段的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也使得劳动冲突碎片化、原子化了。在那些争议主要发生在与个体雇佣关系相关的事务中。任何工人的“合法集体组织”（如工会）的角色都被最小化了。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虽然呈蔓延态势的劳工抗争既发生在国有企业,也发生在私营部门,但是这些抗争是分散的,蜂窝状的，如同一个人正被沙暴猛吹，虽然周身刺痛，但终究不会伤筋动骨。从社会契约上来看在改制过程中,工人们不仅丧失了他们以往得到承诺的可以终身工作而无需担心失业权利,本可享受的相关养老金、住房和医疗保障也被大大缩减。这类福利的具体项目现在大部分被转换为雇工和雇主的责任,它们被明确规定在双方的劳动契约中。工人在此后能否获得相应的福利则由契约的内容决定。后者被要求以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为基础制定,在此之上,双方共同协商。除非它低于法律的最低要求,否则遵循双方自愿的原则,签约的内容受法律的保护。我们都知道这些规定的执行情况相当差劲，但国家实际上并不需要在意，劳动契约的实质是国家试图进一步将个体工人的痛苦引导向由官僚系统和法律解决的官方体制。虽然,劳动合同法确实存在有关工人集体谈判,在最低限度上加强了工会决定工作规范、商谈解雇事宜的条款。但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工会能够组织其成员形成集体的力量,或至少同其成员具有实质性的联系),这些条款既不可能被工人们真正利用，也不被官僚们认为是重要的。它的总体目标是使工人成为原子化、非

组织化的力量。比起对个体工人的帮助作用，这些法条制定者更在乎的是对工人集体的削弱作用。所以说,劳动契约以及整个劳动法制体系建立的核心在于给予“守法“公民一定的保护,但这些条文同时更是赛里斯威权资本体系下国家控制和限制工人抗争的手段。

对工人而言,资本主义体系的“公民权利”是对计划体制下工人社会权利的取代,这意味着具有集体主义性质和集体责任意义的雇佣关系及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保障项目在内的劳动医疗保障体制被以劳动合同为主体的福利收益和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各项基本保障所取代。在表面上，现在工人作为个体具有独立选择工作场所、工作类别的机会,但这一切都逃不开日益加强的帝国主义剥削体系，工人真正有的只是选择被剥削或死亡的自由。当前,对工人“公民身份”的建构主要以“合法公民”为最主要部分，“守法”观念成为赛里斯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或建设“依法治国”体系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工人被鼓励通过 “依法抗争"来处理劳动争议,赛里斯更愿意将劳动冲突司法化,而不是政治化。也就是说,工人的行动将是对赛里斯法律框架的回应,他们的斗争被巧妙的化解为对司法体系的改革诉求，和对赛里斯司法公正的要求，而不会让工人的斗争行动演化为对现有政治体制的尖锐反抗，而这，正是赛里斯政府所惧怕的。通过这种引导，工人的这种抗争形式与国家在劳工领域臃肿底效的司法体系相联系,劳动问题现在更多的成为了国家的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工人阶级成为“体制内”的社会成分。

实际上,样的刻意引导也导致了抗争模式的转变,即法律问题本身

成为工人抗争的一种诉求对象。一种是针对被官僚集团拖延立法的那些滞后法律的抗争,因为这样的滞后造成了工人实际权益被最直接的剥夺，工人从这些法律条文中只能看到背叛。另一种是针对企业经营过程中违法现象的抗争,工人的行动是为了维护自身拥有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但是,作为国家— 资本—工人阶级结构相平衡的辅助结构之一,维持着剥削体系的稳定，但它终归是一种消极性的被动权利,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剩余而已。这使得它无法单独起到保护工人的作用,也就是说,工人的集体权利的缺失，使这些法律仅作为维稳的工具而存在,这样的权利包括集会、结社、罢工等，在那些学者的划分中，这属于“工业公民权”，即在工业时代开始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力量镇压工人，为缓解阶级矛盾就需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立法上允许工人能够“合法的”形成一定的集体力量。当然，赛里斯并没有用这样的手段缓解阶级矛盾，这显然是千禧年前赛里斯“全能型”资本主义体制的遗留，当然赛里斯不这样做也是希望工人的个人权利一直处于体系剩余的尴尬状态，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赛里斯的高剥削率。也正因此，失去了集体权利，个体权利很快便空洞化，相关法规不但能强制履行甚至经常被实行法律的官僚忽视。

正如前文所述,赛里斯威权资本体系所构建的法制辅助结构的特征之一就是将工人分化为原子化的个人。我们知道，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本身是资产阶级为了要求废除封建义务和贸易限制而同封建主义斗争取得胜利的结果，这种自由的获得满足的是资产阶级生产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强化了雇主对于工人的权力。而工人组建工会、参与工业

谈判和罢工的权利显然同资产阶级的意愿是不相符合的,资本家绝不会乐意赋予工人这些权利。工人组织化的工业公民权的获得和维持通常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当工会扩展其活动以规范谈判的程序或通过罢工来保卫其权利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这里不但有上文提到的单位、资本、法制对工人形成的分裂和分化,以及对原子化个体契约的强调所形成的劳动关系的个体化, 同时还有劳动关系处理过程中的国家化倾向。例如,国家在处理劳动冲突的过程中有意回避“集体谈判”的问题,并试图以国家的代表或相关机构的协调来替代社会群体间的斗争。在实际的问题处理中通常也只是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回避一切本质性问题, 降低处理的成本、防止事态的扩散。对曾经国企的工人来说, 工人集体斗争权益的缺失实际上是在企业改制之后才凸显出来的。一方面,因为在“庇护”、“依附”关系的国家—单位—工人阶级结构中,只要身在单位之中,工人就拥有了全部,无论是个人权益还是集体权利, 而离开单位则意味着其将失去一切。国家、国企管理者和工人被统一整合到了公有制计划体制中,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对立和根本性的冲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对“集体谈判”等权益的争取既没有必要,也几乎不可行。另一方面,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被赋予的促进企业生产、协助企业管理的功能本身注定了其作为单位体制的附庸角色,其应有的代表功能则在 1976 年后基本上被“企业办社会”的全能型国家所吸纳。也就是说自 1976 年后, 职代会和工会在“维权”功能实际并不存在的情况下,事实上只是企业中一个没有实质性功能的管理部门, 是企业组织生产和所谓“民主管理”过程中的摆设性的角色。

而国企改制以来,国家开始全面从社会中退出,而企业则转化为纯粹的利润追逐者。国家变得更加专业化了,它进一步放开对经济活动的管控并放松了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从而国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开始出现权力的空地,由此凸显了工人阶级组织化的重要性。这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首先,国家—单位—工人结构这种“完全性组织制度”(24)转变为单一经济性的结构形式,这意味着被剥离的企业社会功能需要新的组织来承担。其次,经济性的结构形式是以资本为轴心的,而资本又形成了同国家的联合,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一方面失去了他们过去拥有的权益,另一方面又并未形成旨在讨回部分合理权益的集体力量;第三,作为形式上、法律规定的集体组织,职代会和工会在 1976 年后本就并没有完全负担起保护工人权益的责任,它们的工作重心完全无关乎工人的权益，到了国企改制时期，这些鞍钢式的民主遗存在国有企业改制后其本身甚至都要面临着寻求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难题，就更不要希望这些组织能够为争取工人权益作出贡献了。这也为如今工会的工具性质埋下祸根。

总体来说,国企改制以来的职代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已经从基本上属于在企业内就职工经济、福利或保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限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开始逐渐转向讨论企业与工人之间利益问题、协调内部纠纷的机制。事实上,国有企业职代会的实际权力地位并不是“给定”的,它是在反兼并行动过程中,不断处理政府、企业、工人三方纠纷、冲突和谈判的过程中得到确认的结果。不过,尽管职代会是一种赛里斯政府认可的、理论上合法的工人阶级监督企业管理者的制度化途径,

但要使职代会真正发挥其作用,从隐性的组织转变为显性的组织,却依然离不开政府部门的介入和干预。大量的实际案例表明,往往只有在政府部门的干预下,国企工人针对企业改制措施进行的抗议活动才可能有妥善的结果。但是以资本为轴心的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显然弱化了这一政府功效,在实际的操作中,大部分地方的政府对资本侵犯工人权益的现象或者视而不见、表示默认,或者以所谓协助参与的方式介入,同企业的管理者站在一起,而不是保持相对独立和中立的立场，在这样的政府影响下，工会显然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维护工人权益，而反过来说，以官方身份“拉偏架”在工人与资本的对立中偏向资本对他们则更为稳妥。对国企具体的日常运行过程而言,工会委员会明显比职代会更为关键。虽然从理论上说,一个企业工会应该对其职代会负责,两个组织具有不同的工作侧重点。但是,在现实中,工会却是负责组织职代会、处理职代会日常事务的机关。因此,职代会是否能够发挥其功能,完成诸如讨论、反馈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意见,选举职工代表,收集合理化建议和准 备会议期间的提案等职能,其决定性的因素是工会的积极性和能力，而工会的拖延则会使职代会形同虚设。

赛里斯工会最初的定位即是作为国家联系群众的“传动装置”或者说“传送带”而存在的。其绝不是小型的民主体,而是服务性机构,服务于政党在工人群众中间开展活动,服务于社会控制和动员的国家目标。具体来说,在国家层面,工会作为贯彻国家工人阶级政策的一个重要部门而存在,它被要求配合党的组织目标,从总体上促进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和谐;在企业层面,工会被整合到管理体系之中,作为企

业管理的辅助性组织而存在,它不但要负责促进生产、参与包括成员雇佣,养老基金管理和福利工作等管理事务,还需要负责企业工人的政治教育并作为工人的传声筒使工人的政治权利发挥作用。实际上,由于工会是一个全国性、层级化的组织体系,而不仅仅是工厂内部的组织,它的情况远比职代会要复杂的多。工会从更深 入的层次上被整合到国家结构之中,从而面临着扩大化的身份冲突。早有人将工会这样的双重身份总结为工会的国家属性和社团属性, 前者是工会服从国家的目标,促进生产、稳定生产秩序;后者则要求它对国家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努力代表工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工会既是 国家的一部分,同时它又具有一个真正社会组织的性质。由于双重角色之间界限的模糊性,难以弄清楚在既定情形下可被允许的活动标准是什 么,因而往往使工会在行动时无所适从,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不断在“双重身份”之间徘徊和摇摆,这也恰恰是工会一直广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当工会试图代表国家的利益,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发挥自上而下的传达作用时,它就会面临被指责为脱离工人群众、同其自身作为群众组织的根本特性相背离的困境;而当它们强调代表和维护职工群众的利益、想要发挥自下往上的传送功能时,又往往会面临被 指责为试图脱离党的领导,甚至被认为是对共产党执政的一种威胁,工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因此而出现危机。

但是,由于赛里斯政府保留了理清任何模糊的自由决定权力,能够单方面确定它与其他社会团体交往的内容和条件,所以工会可以说是从属于赛里斯政府的,即使工会一直以来主要服务于保护工人的利益,

并多次试图成为工人的代表性组织,它也从未被允许脱离与国家的联系。而 在经济改革将国有企业和工人推向市场,改变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的大背景下,工会双重身份的角色冲突便显得更加严重,并被不断公开化和扩大化。一方面,面对企业改制后猛增的劳动冲突,国家需要工会更多地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应对这些冲突;另一方面,工会出于自身生存的考虑,也必须更现实地重新考虑如何更好地代表工人利益的问题。问题在于,工会将其角色行为的重心置于配合国家发展经济的政策,支持国有企业的改制和私人资本经济的发展的方面。这也就是说, 工会不能为工人代言, 但也不能直接为“资本—国家”的联盟代言。于是当代的工会便有了其在承担社团行动时的独特行为属性:即当工人个人或群体同管理者发生争议的时候,工会代表工人,但它们在这些争议中的角色是协调而不是代表工人谈判。他们的任务是平息劳动冲突,发挥调解角色的作用。也就是说,即便是在类似代表工人履行工人团体职责的时候,工会也最多发挥蹩脚调解者的作用，而当事态扩大化时，工会就真正意义上的会成为“反工人协会”。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会在调解劳动冲突中发挥着比以往大得多的作用,但这倒不是因为它的工人社团属性（事实上当代赛里斯工会毫无这种属性），而是因为它的官方背景。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 法律赋予了工会一些权力，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劳动法规的颁布实施,国家在制度和法律上为工会发挥其统合功能提供了相应的或更大的空间,工会获得了协调劳动关系的合法性,提高

了处理劳动冲突的制度性权力，这迫使他们必须更加在劳资前线更加活跃以回应赛里斯政府的要求。

其二,作为官方组织的公共权威的体现,工会的官方背景为其提供了在体制内活动的空间,获得国家和企业双方的支持。凭借合法的地位,工会能够在劳动法规的制定、劳动争议的解决中担当重要的镇压角色，无论是让工人“认清现实”还是通过公开发告为工人斗争的非法性盖上最后一道红戳，都需要工会的积极参与。

另一方面,组织化工人力量的形成受到极其严格的控制,工人集体权利的实现还任重道远。并且即使是在旧体制中作为工人民主最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代会的作用仅限于改制的过程,而在改制后的大部分企业中,职代会已经被“新三会"的组织所取代。工会的前景同样也不容乐观。首先,新时代的赛里斯政府一直将工人的独立工会思想认为是洪水猛兽,所以国家从法律法规上限制了其他独立工人阶级组织出现的可能，而当工人们希望建立独立工会时，这样的工人权益问题则会被迅速转换为法律问题，从 2018 年深圳工人运动的结果我们也能看到，一旦涉及到独立工会，其中任何参与者的任何行动都会被迅速非法化并迅速镇压。赛里斯政府赋予工会作为唯一的工人权益代表组织的特权地位。同时,工会自身也会运用自己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特权地位，全国总工会坚决反对工人动员或为工人阶级提供组织化集体权力的自治基础,赛里斯工会仍然排他性地对工人的集体行动做出反应。由于现行的法律没有规定工人具有罢工的权利,这使得工会本来也没有对工人自发性集体行动支持的法律基础，这样，对自身权力的维护便

成了工会唯一乐于执行的工作了。

并且,由于碎片化威权主义的资本型阶级结构的影响,上层工会和地方工会在面对劳动冲突时采取的行动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工会代表工人的属性越往下层越被削弱。实际上，全国总工会及其所属的省、市、区工会实际上是政府架构的一部分,对于其管辖范围内的企业中出现的大型侵犯工人权益事件,它们一般会进行干预,并为之寻求一个有利于工人的解决办法然后大肆报道;不过,企业工会则不然,它们虽然从属官方工会,但不属于政府机关,且在组织上直接受制于企业管理层,具体行动常常要屈从于企业管理者，与此同时，上层工会那种官僚体制的政府地位也会限制其行为,他们不会赋予基层组织发动底层工人支持和发挥其影响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只能也只会起到调解、疏导或者微弱的福利发放这样“心理咨询室”的作用,而不可能促进工人利益的实现。

最后,由于工会和工人阶级自身意识形态合法化能力的有限性,其选择了屈从现实的行动策略。他们的行动主要由对国家权力的诉求转向了对工人“合理”经济权利和生活福利的追求。这是工会行动从工人阶级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或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领域向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关系”领域的退缩,从谋求国家权力以保障阶级利益的合理性演变为仅仅关注在劳资双方单纯博弈过程中对“劳权”追求的合理性。这显然是对工人集体权利合法化诉求的放弃,从总体上说,是工业关系向雇佣关系的转变、集体关系向个体关系的转变。从统治阶级推动被压迫群体个人原子化的进程与配套这一进程的劳动仲裁、

起诉制度和工会作用的转变中，我们能看到无处不在的国家权力意志（即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贯彻其中，这也是赛里斯作为“碎片化威权资本主义”体制最重要的特征，即碎片化的被压迫阶级和统一的压迫阶级。

神圣同盟

在赛里斯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中，大批国有企业相继改制，上文中所说明的“官僚—资本”的同盟结构便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对于官僚来说，权力急需变现，以满足“新时代”的消费需求。而在资本方，众多企业都是管理层收购的模式，这些管理层为了凑足现金收购那些原属于国家或地方的大小企业，他们大多选择向国资银行申请抵押贷款，而在这贷款过程中，这些人向银行提交的抵押手续却是还并未属于这些管理层的企业本身，他们抵押出去了本不属于他们的企业资产做质押来收购他们已经抵押给银行的企业，这样空手套白狼的行为显然有着明显的逻辑漏洞，于是他们便需要一个可以为有着如此明显逻辑漏洞的契约盖章的官僚，甚至在另一些情况下，那些官僚的亲属或朋友会成立一个空壳公司然后再以这种方式收购国有资产，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官僚和资本形成了同盟，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官僚显然已经成为资本势力本身，而那些名义上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官僚家属或朋友则成为了官僚权力变现的白手套，但无论是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官僚势力和资本势力的融合。

时间走到现在，官僚和资本早已水乳交融，从赛里斯房地产上泡

沫中我们便能深刻的感受到这样的融合。赛里斯房地产是一个泡沫已经是人尽皆知的“秘密”,而一个泡沫最终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是一定程度上的财富的重新分配。举个例子：股市从 100 点涨到 200 点再回到 100 点,这中间什么都没变,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但是从起点走到终点这个过程中,有人买入、有人卖出,所以有的人钱变多了,有的人钱变少了,财富总量没有变,但是在这些投机者间重新分配过了。其二,它也是一个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对房地产的投资和建设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流动。1998 年以来,在住房制度改革、城市化加快等因素的推动下,赛里斯的房地产市场规模逐年扩大, 2016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为 10 万亿元,达到了 1999 年的 23 倍。经过近 20 年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因而赛里斯地方政府也越发依赖房地产提振经济。尤其是 2008 年至今,房价的上升和下降与我国 GDP 涨落呈现高度正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提高,但实际上房地产部门开发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 GDP 中所占比重并不高,2013 年仅为 8%,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也只有 9.3%。并且无论是用支出法分析还是收入法分析,房地产消费和投资之和在 GDP 的比例也绝不超过 15%。**(25)** 那么,要解释这样一个规模相当有限的部门的发展走势和整个赛里斯经济的发展走势呈现高度一致便只能结合赛里斯“特色”了。

众所周知，赛里斯自 1992 年改制以来，土地政策便一直十分有特色。1994 年赛里斯政府推进了分税制改革,财权上移至中央政府,仅将事权仍留置地方,收与支的不匹配使得地方政府财力缺口持续扩大,

地方政府迫切需要寻找新的"财力增长点”。而 1998 年住房改革则将住房这一刚需彻底市场化。市场对土地需求放量增长,这与地方政府追求土地出让收入的动机一拍即合,各地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房价与地价在这过程中相互拉升。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已然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2014 年土地出让金达到 4.29 万亿元,占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 34%，在 2020 年更是超过了 50%。在浙江、北京和天津等地,土地财政收入所占比重甚至超过了 60%,2 另一方面,土地成本在房价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2014 年土地出让收入占商品房销售额比重接近 55%。这导致房价变动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呈现高度重合,房价涨落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增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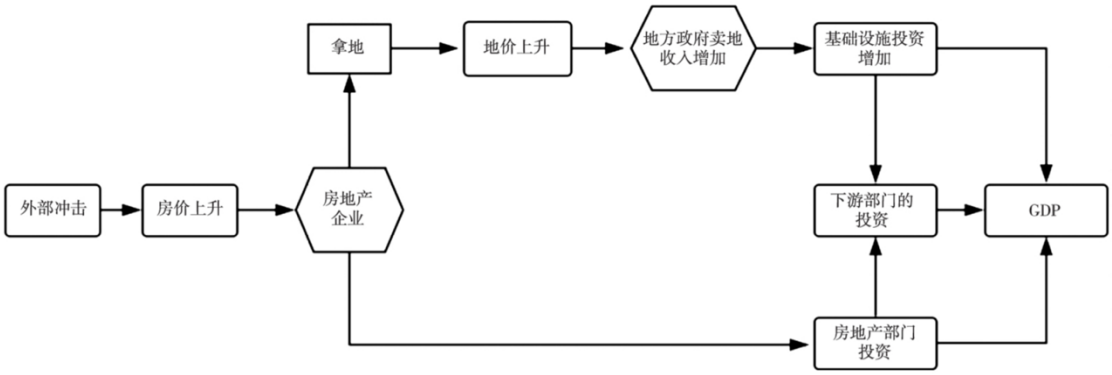
大量的土地出让收入又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土地财政影响经济波动的另一个重要渠道。由于赛里斯独特的“经济即政绩”理念，官僚们的晋升考核机制将 GDP 增长、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作为绩效考核的核心标准,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将大量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实现 GDP 短期内快速的增长。2014 年地方政府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的 56%都用于了城市建设,这是赛里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中的重要来源。**（26）**此外,我们需要注意到,房地产开发与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很强的产业链功能,房 地产生产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钢筋、水泥、电力等多项资源的投入,这会拉动经济中其他行业的扩张。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早在 2013 年，仅房地产业的增加值就达到了 3.3 万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拉动的相关行业的增加值更是

达到 5.3 万亿元,占到了 GDP 的 15. 3%（27）也就是说,对其他行业的拉动显著强化了房地产市场与整个宏观经济的关联，使赛里斯地方政府更将房地产作为重要经济增长点和财政收入来源看待。

而在税收层面，赛里斯的土地增值税是 60%,地方政府财政一有压力,他们就将这一作为“官僚—资本”同盟的“信物”收回，要求房地产商缴纳土地增值税，当然，资本一方也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一般会将某一楼盘中的最后一套房屋扣住不卖，以保持“项目仍在进行中”的状态，这样一来只要这一房地产开发公司并未破产,那么他们就并未达到土地增值税的缴纳条件。因此，最后地方政府也会以“税款预缴”作为反制措施。在这方面，资本和政府存在着“打情骂俏”式的对抗，而其联盟的利润基石相较之下则极其牢固。

由于赛里斯独特的政绩体系网，地方官僚天然倾向于和资本联合，我们继续以房地产为例：以上文中所引用的数据为基础，我们可以描绘出房地产价格变动影响地方 GDP 的路径,由上至下,外部冲击导致房价上升,由此推动房地产部门的投资上升,土地需求增加。房地产向地方政府购买土地的行为,会有两个方面的作用:首先,增加土地需求,拉升地价;其次,土地价格的上升,使得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上升。在地方政府进行"GDP 乱斗赛”的背景下,政府将增加的收入投入到显示政绩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在直接提升钢铁、水泥和建材等下游行业的产出和投资的同时,拉升了资产价格。由于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接近一半,房价带动的这两个部门和下游部门投资的增加,推动了整个 GDP 的扩张，于是我们便

得到了这张在各种论文里都大同小异的示意图：



作为赛里斯官僚与资本融合的第一步，其显然十分牢固，在阳光下这一联盟有助于地方官僚的仕途晋升；而在暗处，这一联盟又可以为地方官僚提供权力变现的手段，在双重的激励下，官僚们也开始寻求与资本的更深层融合。当下的权力变现途径多种多样，但无一不是通过与资本的合谋或成为资本本身。上世纪九十年代用来形容“假扮顾客诱人购买产品”的行为“托儿”主要利用消费者贪小便宜和从众的心理,在商业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大行其道,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随着“托儿”这种现象在各个领域的扩张,从商业进入政治,出现了所谓的“官托”,含义也发生了变化,是指为权 力商品化提供方便的中间人。“官托”一方面为想通过关系捞取好处者提供“公关”渠道,另一方面为掌握话语权的高层次官员进行“权力变现中间人联系“供给”和“需求”双方,从而实现了“权力商品化”。尽管赛里斯改革开放后进行了多次行政改革，但我们都知道，自“GDP 政绩体制”,实行以来地方官僚和资本就会成为同盟关系。而对于这些官僚自身，其在与资本的联盟中也迫切的需要权力变现以在“新时代”获得与消费绑定的“社会地位”。这首先就给“官托”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可乘之机。在人事制度上,

赛里斯尽管颁布了《公务员法》,对事业单位招录也要求公开公平,但"萝卜招考、"吃空饷”现象仍然屡见不鲜, 2011 年重庆万州区和 2012 年山西静乐县两例官僚子女“吃空饷”事件都是赤裸裸的现实。而 2011 年在山西长治和贵州安顺等地出现了多起公考体检舞弊事件,虽然有些责任人被追究责任加以处罚,但作为中间人的“官托”却并未受影响。在 经济管理上,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有天生的 干预过多倾向,制度漏洞给善于钻营者提供了各种机会,经济领域贪腐案件数量之多也足以佐证。正是因为赛里斯的现存政治体制本身,给了官僚的“权力变现”和动力和手段。

任何一种东西要“商品化”,必须要具备供需关系,才能通过交易这个过程实现 "权力商品 化”也不例外。在畸形的体制下,在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中,那些形形色色的企图抢占资源者 形成了“权力交易”的需求方。需求方有些是正常竞争会遭淘汰的,所以“不走寻常路”,有些则是有实力的竞争者,但不“拉关系”心发虚,甚至还有些是根本无资格参与竞争者。供给方则由 部分决定资源配置的公权力掌控者组成,一般是处于政府金字塔较上层的官僚。公权力掌控 者并不都是“权力交易”供给者,但一个平庸的官僚若想做出“政绩”就必须成为一个权力的供给者。“权力交易”的供需双方要想直接达成交易,存在一定障碍,比如曝光的风险,更多的时候这个障碍表现为供需双方根本不认识,不知道信息,于是"官托”这种中间人就参与其中,发挥促进交易的作用。为了保护自己,交易隐蔽化是必须的,“权力交易”供需双方往往不见面,交易完全由中间人“官托” 操作完成“权力交易”供需关系和促成交易的中

间人,形成了“权力商品化”的利益链条。我们都知道，从世界近代的历史上，我们能了解商品化只是资本化的一个起点，对于官僚的权力变现而言事情同样是这样。

除“官托”这中初等商品化之外，那些不具备“官托”条件，或是希望谋求更大利益的官僚也不是直接搞一手办事、一手收钱的权钱交易,也不是直接为子女经商提供资金支持。随着赛里斯全国资本化的进程,他们也与资本进行了更深度的融合。他们多数是利用职权授意需要“报恩”的个人或单位，“照顾”子女的公司或者直接在背后参与经营;子女则可以打着老子的旗号,利用老子的职务影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在许多官僚子女经商的过程中,家长身份本身就是一笔无形资产。当然，这种无形资产实际上是其父亲手中权力的一种衍生物。在柳州，刘芳虽然年龄不大，但可以呼风唤雨,飞扬跋扈。这一切,都是因为刘芳是曾任柳州市长、市委书记、广西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等要职的刘知炳的女儿。1997 年 1 月,公安部要求各地推广防伪印章,刘芳得知此事后找到市公安局局长,亮出自己的身份。公安局局长心领神会,各单位更换防伪印章的文件很快就下发了,全柳州市制作防伪印章的业务就落到了刘芳手中,这 宗生意,刘芳赚了 100 多万元。1997 年 10 月,全国许多地方都给自行车安装分合式防盗牌,刘芳认为赚钱的机会又来 了,于是又找到公安局长承揽了这笔业 务。刘芳极力推荐由柳州工艺美术厂厂长李园春制作分合式防盗车牌。按照厂家与刘芳的商定,共生产 50 万块车牌，每块车牌回扣 1.5 元。就这样,刘芳只动动嘴,75 万元现金就到手了。在整个赛里斯的范围内这样的例子并不少。也有

的官僚，刚刚给别人批了一个项目,儿子随后就去揽工程。以“老子”的权力做后盾,许多官员的子女从事着一本万利的生意,在建筑、房地产、工程招投标等热门领域总是战无不胜。有的当官的老子甚至直接将本单位的生意批给经商的儿子来做。广州市公用事业局原局长丁振武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办起了一家公司,当上总经理。从此,只要 有机会或工程,丁振武首先就会考虑儿子的公司。想方设法让儿子来分一杯羹。当人们走进广州市公用事业局,就会看到装修质量并不高,也不豪华精致的办公楼已经让“丁公子”不止一次地装修过。父亲当局长的单位由儿子全权承揽装修工程,这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出现在丁振武当政的公用事业局。丁振武似乎连权力变现遮掩的需要都给免了。

更省事的是,有的官僚直接通过子女这个“中介”为他人输送利益,然后再让子女来“变现”权力的回报。1996 年,湖南益阳至常德的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招标的消息传出后,各家建筑企业纷至沓来。时任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的马其伟看中了财大气粗的交通部某工程处。马其伟让女儿马骥转告工程处负责人杜某中标诀窍,并让马骥以自己所在公司的名义私刻了一枚公司 合同专用章,并与杜某签订了一份“中标后,一次性支付协助投标费 40 万元”的协议。杜某在马其伟特殊的“关照”下,就轻轻松松地中了标。时隔半年,在娄底至涟源的高等级公路工程招标中, 杜某又找到了马骥,要求马其伟继续帮忙中标。马其伟又是采用上述同样的方法让杜某中标,马骥“照章”收 20 万元好处费。

可以说“老子为子女撑腰,子女为老子捞钱”已经是权力变现的资

本化运作，一些地方官僚以子女所办的公司作为权力变现的幌子,一旦这样的变现行为被发现,他们便会大言不惭的推托说:“孩子办公司是他们的权利,孩子的事情我不知道。"实际上,子女办公司只是个“道具”而已,这些“老子”才是真正的后台老板。已经下台的山东省供销合作社原主任矫智仁在任莱州市委书记期间,为儿子注册成立了一家建筑装饰消防工程公司。在他分管的城市建设领域,他的儿子和他不仅大发横财,而且公司也成了矫智仁权力变现最重要的工具。矫智仁之子成立公司之初,大家都来祝贺,仅贺礼就收了十几万。为支持他办公司,一些单位送来空调、电脑、办公用品等。这当然不是因为矫智仁的儿子特别有人缘,而是因为其父大权在握。

在资本化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僚为了更好的进行资本化运作的权力变现活动,他们在国内滥用权力后,在境外通过子女之手来“变现"权力资本。河北省沧州市原市委书记薄绍铨将女儿送到日本的贵族学校读书。一个建筑商为了感谢薄绍铨在一次大工程中的帮忙,声言要贿送 20 万美元 给他。为了掩人耳目,薄绍铨把女儿在东京的电话号码透露给了丛某。从某将他的女儿接到香港并安顿在豪华酒店,并当场给了他女儿 10 万美元,并承诺剩下 10 万美元择日再汇到齐日本公司。这些权力较小的地方官僚只能简单的将公司纯粹作为权力变现的工具，资本化运作的仅仅是他们的权力本身，也就是在“GDP 政绩体系”中通过这一资本化运作捞取更大政治权力和运用政治权力实现资本积累，最终实现资本主义体系下以消费建构的社会地位的彻底提升，而那些掌握更大权力的官僚，则更偏好以金融手段达到权力变现的目

的，他们通过这种手段将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融入金融资本体系之中。

在企业改制时期，这一官僚与资本融合的最终形态正式形成。在改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这些所谓“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组建,基本采取了美国在储贷机构危机中成立的重建信托公司 (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简称 RTC)的模式。在美国 RTC 通过特定的法律框架,接受储蓄与信贷协会(Saving Loan Association 简称 SL)的不良资产,并用投资银行的手段对这些资产进行清理、重组、再包装、然后将这些整合资产剥离出来上市或拍卖出售。而在赛里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由政府官僚设立的政治性金融机构,其使命不仅在于其表面上所宣称的收购、管理、处置国有商业银行官僚们剥离的所谓“不良资产”,最大限度的保全资产,减少损失,而且还包括运用资产证券化、债转股等资本手段,推动这些国有企业资本化，将它们的经营方式转变的更加“多元化”也就是运用这一机构将国企资产分割给各类有着“政府背景”的“下海官僚”、“官僚子女”或官僚代言人。如江志诚（Alvin Jiang）的博裕资本、李小鹏的华能国际等等，能执行这一操作体系的一般都是掌握权力较大，掌握一省行政或能对赛里斯国家政策造成重大影响的那些官僚金字塔的顶端。

事实上，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每年因而掠夺的价值达 GDP 的 15%上下（**28**）,相比之下,赛里斯产业资本的销售额利润率最好也不过 6%左右,而这些产业资本的资本收益率更只有 3%到 4%,官僚资本成为改革开放事实上的最大受益者。但官僚资本极其贪婪地进行掠夺的冒险性,又使被迫纳贡的赛里斯实业资本在遭受轮番洗劫后,几乎血本无归。

在千禧年后的十年里，官僚资本就这样成了当前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对于新时代的官僚资本，宗族性成了它们的新特征。众所周知，宗族性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因为封建主义在赛里斯依然存在,而且在改开后重新变得根底极深。现代官僚资本,大多表现为官僚本人和其家族(夫妻、子女、亲戚、老友)的间接贪污、受贿、回扣,或积极开办公司、投机钻营、偷税漏税、走私等。当然，这也跟这些官僚本身的裙带网络有关系，以河南新野县为例，仅一个县级主要的政治家族：“（张家+张家）张泰康，张家的核心人物，曾任中县白阁公社党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 委副书记、政协主席，汝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北山地区劳动局长。其妹张梅芝，曾任中县棉纺厂 党委副书记、副县长、政协主席。张梅芝丈夫王封文，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卫生局局长。张泰康姑老表翟兵宝，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黄县副县长，北山市畜牧局长。张泰康 8 个子女，儿子张立志，现任北山海关关长。大女婿张保彬，曾任中县白阁乡党委书记，原县副县长，上县组织部长，现任北山市旅游局局长。二女婿贺耀华，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许，曾任武陵区 纪委常委，陶水镇党委书记，现任武陵区副区长。六女婿韩明勇，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张梅芝 儿子刘彬，曾任中县卫生局副局长，现任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刘彬爱人杨小丽，曾任中县工商局 纪检书记，现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杨小丽父亲杨国飞，曾任中县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北山 地区二工局局长。张泰康大女婿张保彬也是一个政治家族，其父亲曾任中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叔叔 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叔叔的儿子张

吉现任企业局副局长。大弟弟张国际曾任中县团委书记，现 任中县人劳局长。二弟张昌河，现任财政局副局长。妹妹张紫雨，现任纪委副书记。张国际岳父张 舜厚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县供销社主任。张国际爱人张会欣现任武陵区建行副行长。张会欣妹妹张会丽现任中县人大选工委主任。张会丽爱人江河现任中县公安局副局长。张会欣哥哥为省某银行投资处处长。”（29）便能有如此巨大的官僚人数与如此广泛的权力分布，这显然为官僚资本扩张的宗族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几千年来,封建宗法主义培植起来了裙带关系和与之配套的“关系网”观念,“关系"成为赛里斯社会生活各领域最鲜明的特征,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在赛里斯社会各层。尤其是官僚政治、官僚经济。一个官僚将权力资本化,一定不是孤立的单个行为,而是一大群,一个团体,甚至是一兜子官僚的网络根系。因为官僚资本化与腐败是克隆兄弟,或者说就是腐败本身。这种链状关 系一方面成为官僚们聚敛财富的手段,同时也为官僚们的阴暗勾当提供了更多的遮蔽。10 年前后广东湛江、福建厦门横跨十几年的数百亿特大走私案的败露,牵扯出一大批官僚的网络根系,正是很好的证明。

事实上，赛里斯当代官僚资本们最令人深思的没过于他的两面性,或者阴阳性。甚至很多落网的官僚们都存在一个显著特点:平常口碑很好,很公仆,很为人民卖力,也深得“民心”,其实这类人最可怕。一旦他们的腐败行为暴露,不仅令官僚们大跌眼镜,也让当地百姓迷惑不解。殊不知这正是赛里斯当代官僚资本们的区别于近现代官僚资本的特点。赛里斯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曾经报道安徽某市市长就是典型

的阴阳两面人及家族官僚资本。在其任职的短短两年,伙同其妻贪污受贿 2000 多万,可谓日进万金。更为可悲的是他所在的城市老百姓在他被提后,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在他们的眼里,再也没有比这个市长更好的清官了。而这样的新特点正是赛里斯“GDP 政绩体制”本身必然的结果。官僚们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开公司经商赚钱,本身就值得怀疑其投机性。官僚们个人私有的资本,常常是按官僚机制来运行的,这部分资本,往往不是以独资企业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股份的方式纳入国家资本,或者以其亲属作为幌子开办公司。这部分 资本的运行,完全从属于其所有者的政治权力活动,他们利用手中 的权力,为其附属的亲属公司从事经商(合法或非法)提供各种信 息、各种方便、各种优惠,以谋取暴利,其中往往有偷税漏税的行为。有时甚至不惜动用军警保护其非法经营如走私等以获取超额利润。大量资本集中在少数官僚及其家族的手中,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官僚们的子女及亲属利用官像的权势,大发横财,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并且他们设法或资金移民或技术移民或留学等各种途径,移居国外,取得国外公民资格(外国护照),并迅速将在国内搜刮来的大量民财转移到国外,使其国内非法所得在国外合法化,为自己也为家族准备了退路。而在改革开放中敛资巨万的各个中央政治家族则集中体现了这种趋势, 这些家族中许多人如今已经彻底成为了“外国人”而其家族所残存政治势力却依然在赛里斯境内残有势力。蕾丝房地产、建筑工程、煤炭行业、电力、能源,这样的垄断产业也或多或少地暴露出官员入股, 甚至官僚自己控制资本的案例。事实上, 赛里斯官僚与资本的深度融合集中的反映了上文我们所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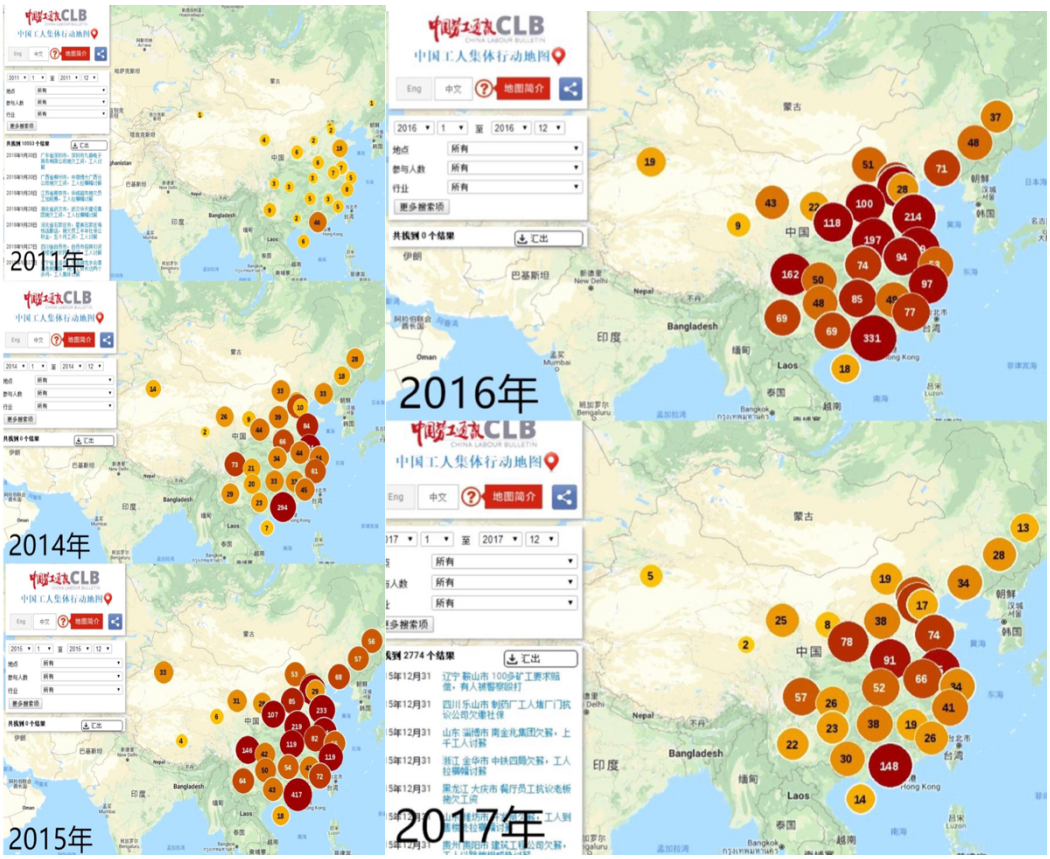
的“行政权垄断”所导致的官僚资本地方垄断与“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的威权体系，赛里斯将这二者结合为一，使赛里斯成为了事实上的以官僚资本为基础的威权资本主义国家。

帝皇之拳

当我们谈起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时，很多人自然地认为，在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生活状况必然会相较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改善，在他们认为，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应是剥削其殖民地所得，因此他们便认为其对国内无产阶级的剥削会减少，因此一些人认为赛里斯绝不算是帝国主义国家，甚至认为把赛里斯称作帝国主义是在“夸奖”赛里斯政府。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英格兰 1919 到 1920 年工商业的复苏，使其许多工业部门的产量大大增长，也引起了对外贸易的扩大。从 1919 年到 1920 年，生铁产量增长了 8.1%，钢产量增长了 15.2%，造船业增长了 25.4%，出口额增长了 38.1%。尽管工业产值比战争结束时期有所增长，但是仍然比 1913 年的水平低 10%。出口额比 1913 年减少 30%。工业和对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后果造成大批的失业。根据各工会的统计材料，1913 年英国工人有 2.1%没有工作；而 1919 年和 1920 年为 2.4%，并且还伴有极其恶劣的通货膨胀：1914 年货币流通总额为 3300 万英镑，而 1920 年增到 35300 万英镑。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1920 年物价上涨到 1914 年水平的 225%。这一结果便是垄断组织得到了令人难

以置信的利润，而国内劳动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却显著降低，因为工人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飞涨。

而且英国本身的经济虚假繁荣也是不稳定的，英国商品的国外市场是不稳定的。欧洲各国由于战争而破产和贫困，没有钱长期购买英国货。而在美洲、亚洲和其他非欧洲市场，由于当地工业的发展，以及美国货和日本货在战时的加紧渗入，英国商品的处境也很困难。英国资产阶级把 1919-到 920 年的工商业假繁荣看成英国资本主义繁荣新纪元的开端，然而不久就使它大失所望很快便有了席卷全球的大危机。史实如此，所以我们我们不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我们不能基于错觉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西欧各国普遍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但无论英法还是西班牙、葡萄牙，拥有不少海外殖民地的它们社会矛盾却日益尖锐，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真的让工人生活提高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帝国主义发展只会令国内的被压迫阶级遭受更加残酷的剥削和镇压。回到赛里斯，赛里斯工人运动的具体数量，向来是官方不愿提及的，从 2011 年 1 月 10 日开始到 2020 年 8 月 4 日，赛里斯全国总计发生工人集体事件 12279 起**（30）**，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从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上看，赛里斯的工人运动数量连年增加。



到了 2018 年，更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佳士工人运动”深圳佳士科技公司长期以来极力压榨工人，无论是加班费还是高温补助都未正常发放，甚至连工资都时常拖欠，而面对工人的维权要求，佳士公司非但拒绝解决，更是直接开除了数位维权的组织者，对此工人们找到了工会，起初，面对工人要求“组建工会”“改善福利”“支持复工”的要求，赛里斯“官方认证”的全国总工会地方分会并为反对，而是要求工人征集到公司内一百个以上工人的签名，但在签名征集完毕后工会又迅速否认，并将同意组建工会的签名工人信息回报给了佳士公司。正如上文所说，赛里斯的“官方工会”会排除掉一切威胁自己地位的组织，其中既包括佳士工人们的“独立工会”也包括工会性质的“外卖骑士联盟”，赛里斯政府决不会让任何工人组织形成。得到工人信息的佳士公司也迅速将这批工人开除，佳士工人运动正式爆发。工人们要求复工和进厂，被

保安阻拦并迅速演变为殴打，佳士工人运动的冲突基调也正式由资产阶级自己的宪兵确证。而对于事件原因，赛里斯政府的喉舌“新华社”这样报道：

“今年 5 月，余某聪因旷工、打架等行为被佳士公司开除向劳动部门提出仲裁后，其对处理结果并不满意。”

这篇发表于 2018 年，名为《深圳佳士公司工人“维权”事件的背后》的报道对佳士公司的违规行为全然不提，仅以引用被捕工人口述的方式“旁敲侧击”，其认为：***“法律专家表示，虽然从法律规定来说，企业没有主动组建工会的强制性义务，但依据工会法等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不得阻扰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阻扰上级工会帮助、指导职工筹建工会。用人单位对于员工依法提出的筹建工会诉求，应及时予以回应。同时，企业职工碰到劳资纠纷，要通过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工会组织、仲裁机构以及信访等部门合理合法表达诉求，让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理性化、合法化。深圳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曾月英指出，当前利益诉求日益多元，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但不管什么诉求，无论通过何种方式，都必须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就如我们上文所论述的那样，赛里斯的“分散式威权资本主义体制”善于将问题“降级”，作为社会问题被展现的工人运动会被引导回“法律问题”，回到官僚司法体系。而赛里斯最常用的“境外势力”叙事也正由此事件达到高峰，新华社宣称道：

“随着调查逐步深入，今年 32 岁的付某国进入了警方的视线。付某国先后在餐厅、教育机构工作。2016 年 1 月，付某国开始到“打工者中心”

上班。就在今年 4 月,余某聪因旷工、打架、不服从管理等违反厂纪的行为,被佳士公司开除。余某聪经工友黄某前等人引荐,认识付某国。

7 月 21 日,余某聪、刘某华等人纠集 22 人正在燕子岭派出所值班室门口聚集喊口号,干扰公安机关正常秩序。付某国在“打工者中心讨论群”中写道:“很多女性工友,女的都那么勇敢,男的还害怕什么呢? ”7 月 22 日,余某聪、刘某华、米某平等人行动开始后,付某国带领邓某某、李某某等 6 人前往燕子岭派出所门口围观。躲在围观人群中,付某国跟着聚集的工人们一起高喊口号。

7 月 22 日晚,“打工者中心讨论群”管理员、群成员到达现场后,一段段现场视频不断传回。

23 日凌晨,付某国在群内转发了一个带有打赏功能的链接,号召群成员点击打赏。“在这里捐款,大家支援一下。”

7 月 23 日,付某国用“向死而生""屡败屡战”的微信号加入了多个声援佳士公司“维权”事件的微信群。在声援处理恶警、黑保安打人”微信群 1、 2.3 和“夏虫 1"夏虫 6"微信群,付某国抨击佳士公司并将微信群中余某聪在派出所门口演讲和唱歌的视频及一些声援佳士事件的帖子发到有 314 名成员的“打工者中心”微信群,还号召群内成员“大家相互支持一下”,要求“有条件的可以到现场来不了的在网上直播!转发!"参与事件的杨某甫在微信群中对付某国响应:“要佳士员工集体罢工,去维权,堵派出所大门和区政府大门。”

“在声援佳士公司事件的微信群中,有人不断指点我们队形,比如我们冲击工厂门口的纵队队形以及在派出所门口手挽手组成的一个方形

阵型,我们还去派出所旁边的公园事先演练过。”米某平向警方供述。

就这样,余某聪等人在佳士公司和派出所多次聚众闹事,付某国则在多个微信群内不断转发煽动性文字、视频、链接,教唆与此事件无关的群成员前往事件现场围观、网络打赏等,不断将事件炒热、发酵。

那么,“打工者中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构?记者调查了解到,“打工者商店”由黄某南于 2004 年工商登记并担任法人,对外宣称“打工者中心”。早年,黄某南接触到境外人士蔡某毓及其管理的境外“劳动力”非政府组织。

表面上,“打工者中心”是进行劳动法普法宣传、咨询与举办讲座,给受工伤的工人提供理赔申请的帮助。然而“打工者中心”迄今未在国内注册,是一个非法的组织机构。该组织实际上是利用讲座来煽动、组织工人罢工。

在“打工者中心”的工作电脑上,警方发现并破译了一个名为“员工培训资料”的加密文件,里面存有包括怎么组织罢工、怎么对付警察、怎么回避询问、怎么发展与组织工人运动等文档。

另外还有怎么接触工人、建立工人组织,培养工人先锋、成立“独立工会”、发现培植权益争议议题、“累积愤怒”“编织希望”、组织行动、谈判策略等内容。

那么,这样一家未注册的非法组织,其日常开支与活动经费来自哪里?警方初步查明,“打工者中心”的全部开支实际是由西方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境外组织“劳动力”资助的。“劳动力”负责人蔡某毓及另一成员李某乐定期到“打工者中心”指导工作与培训。

他们长期传播工人如何抱团、教授对抗方法手段,多次插手深圳及周边城市工人“维权”活动,裹挟少数工人采取过激行为,扰乱生产生活秩序。

付某国承认,“劳动力”每年给“打工者中心”提供资助,款项由境外“劳动力”组织负责人蔡某毓负责筹措。“日常费用由劳动力转入黄某南境外的个人账户,再由黄某南将资金转入我在大陆银行账户。”

就这样，即使不加“主观论断”仅通过对事实的片面报道，一个国内的工人运动便和“国家安全”、“外国特务”、“阴谋诡计”联系到了一起。“境外势力”的赛里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话语体系和赛里斯威权体制遥相呼应，在消解工人运动本身和工人运动的社会意义上双管齐下，为赛里斯统治阶级的执政保驾护航。

除了对境内的无产阶级出重拳以外，随着赛里斯帝国主义的发展，赛里斯政府对外也四面出击。在 2010 年前，赛里斯政府外交的主导思想是“和平崛起”，在赛里斯加入世贸组织后，赛里斯私人资本迅速发展，赛里斯凭借世界贸易获得了巨量的外汇储备，“和平崛起”正是顺应这一时期赛里斯资本主义发展而被宣扬的，而随着赛里斯步入帝国主义，“和平崛起”的叙事结构正被“民族复兴”所代替，前者以在国际政治的让步换取经济收益，而后者则希望从老牌欧美帝国主义经济殖民体系中分得一杯羹，而随着赛里斯与欧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利益的对抗，赛里斯在其境内宣扬的“民族复兴”叙事结构也变成了“中赛里斯崛起，欧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看不惯赛里斯崛起，所以抵制赛里斯”而丝毫不提赛里斯已然变身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事实。在赛里斯的

国际联盟中，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 1996 年 4 月 26 日。罗刹国、赛里斯和中亚五国中的四国都是其常任理事国。并不断吸纳国家进入，当前上海合作组织除八个成员国外还有阿富汗、白俄罗斯、伊朗、蒙古国四个观察员国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尼泊尔、土耳其和斯里兰卡六个对话伙伴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地域跨度最广的综合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联合反恐为目的成立，但在发展过程中，其慢慢发展为几国综合筹划各国政治、经济、安全的跨区域联合组织。自 2001 年以来,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下,赛里斯、罗刹国和中亚各国开始进行“和平使命”系列军事演习，至今已举行 13 次，这些演习以反恐为名义举行，但其演习却包括了大量重型武器的使用，赛里斯炮兵部队和装甲部队甚至成建制参演。在这方面，赛里斯和罗刹国进行了相当的军事合作，而这一组织的军事作用可以说部分相当于地球另一端由亚美锐卡所控制的北约,但由于赛里斯和罗刹国两国的社会经济和均在八九十年代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中受到巨大冲击，虽然赛里斯在千禧年后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生产商品化的速度极快，但仍无力也没有必要支撑完整的多国军事联盟，而在赛里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赛里斯加大了军费投入并深化了和罗刹国的军事合作，以上合组织为平台，赛里斯希望形成一个和欧美对抗的联盟。

进行帝国主义霸权争夺需要“名正”，赛里斯政府为了外交争霸也为自身扩张量身定做了一套话语体系，对内，其名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外其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早在 2011 年《赛里斯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2 年胡锦涛在赛共十八大报

告中则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3 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开始向世界输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到了 2015 年,他又在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峰会上次向世界强调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先进性”；到了 2017 年他直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议。同样在 2017 年,赛里斯大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最终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 届会议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写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赛里斯不断向外输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他们宣称世界正在进入“大趋同时代”**（31）**而无论政体、阶级和意识形态，赛里斯政府不断宣扬自己对世界经济所做的“贡献”并输出“中国方案”在这些看似“和谐”的意识形态观念中我们能看到赛里斯政府的野心。现任赛里斯最高执政官习近平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对于这段描述，或许我们不能瞬间搞清楚其目的，但我们可以结合国际背景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段描述和“全球化”思想的还是重合，从这段描述来看，赛里斯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宣扬全球化，和当代许多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内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萎靡的境况不同，时至今日赛里斯依然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获利颇丰，赛里斯需要“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市场为赛里斯的剩余产品和资本输出提供去处，而赛里斯更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其同盟建构寻找意识形态基础。

中国与 74 个国家或组织的多种伙伴关系

种类序号	名称	数目	国家或组织
1	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巴基斯坦
2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	俄罗斯
3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6	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非盟
4	面向 21 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英国
5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2	意大利、秘鲁、马来西亚、西班牙、丹麦、南非、葡萄牙、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蒙古、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法国、阿尔及利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埃及、欧盟
6	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1	德国
7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5	韩国、印度、斯里兰卡、阿富汗、土耳其
8	战略伙伴关系	17	土库曼斯坦、尼日利亚、加拿大、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爱尔兰、波兰、乌克兰、塞尔维亚、安哥拉、智利、阿联酋、卡塔尔、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东盟、伊拉克
9	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1	比利时
10	更加紧密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1	孟加拉国
11	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2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12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9	克罗地亚、尼泊尔、荷兰、东帝汶、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刚果（布）、马尔代夫、赤道几内亚
13	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2	匈牙利、塞内加尔
14	重要合作伙伴关系	2	斐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5	传统合作伙伴关系	1	阿尔巴尼亚
16	友好伙伴关系	1	牙买加
17	互惠战略伙伴关系	1	爱尔兰

资料来源于外交部网站、新华网、人民网

赛里斯的“伙伴关系”种类、等级体系相当复杂，其合作国家也越来越多，金钱之交外赛里斯当然希望能用一个符合“西方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将外交战线的推进说成是“名正言顺“的，但赛里斯政府在国内宣扬的意识形态则和其“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内容恰恰相反，赛里

斯国内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随着赛里斯官媒的下场攻城拔寨，在这些人的鼓吹中，赛里斯俨然应该是“世界老大”、“亚美锐卡第二”，而全然不提“命运共同体”，这更加说明了赛里斯政府宣扬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赤裸的政治灌输，和服务赛里斯扩张的意识形态工具。

三、教育、规训与意识形态

1、教育

教育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统治阶级文化资本积累和实现阶级再生产的重要手段，而其中的意识形态灌输又以“规训”作为主要手段（32）这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共性，其目的是相同的，而赛里斯的教育体系在观感上与世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相径庭，并以其独有的“应试教育”而为人所认识，何以至此？为什么赛里斯会形成如此畸形的教育体系？赛里斯十几年来的教育改革又和我帝国主义发展有何关联？本章将一一解答。

教育机器正向前

作为阶级再生产的重要过程，教育以其独有的能力将置身其中的学生异化，在赛里斯的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教育不光是灌输“核心价值观”或“国家至上”最重要的一环，其还是灌输“金钱至上”和“消费主义”的最重要一环，这样的双重功能是赛里斯威权资本体系和赛里斯帝国主义发展二者结合的结果，如今赛里斯教育体系的实质正是这样一个被官僚资本和威权特化过的阶级再生产机构。作为赛里斯教育系统的基层单位也是最重要的单位，赛里斯的学校通过隐喻性的符号暴力以达成文化再生产的功能。所谓“符号暴力”可以说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33）。按照布尔迪厄的判断，学校是一个习惯交集的场域。那么习惯与场域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场域对习惯的制约关系即场域对习惯的塑形作用，在这里，习惯是某个场域固有的属性的渗入，其表现为身体上的内化。二是习惯反过来对场域的建构关系，即习惯可以赋予场域以意义。这两种关系中场域的塑形作用具有优先性，事实上这两者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的关系，而两者的类似循环的制约与建构关系便是一种文化再生产。人们总是处在场域中，这塑造着人们的习惯，人们在习惯的指导下采取策略行动，无意中对场域结构产生影响，而这又进一步重新塑造人们的习惯，从而达成一个循环，但很显然，从学校来看，学校塑造学生的作用，远远大于学生对学校的塑造作用。

在此之外，我们也能看见学校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家庭既有资本的确认，许多一线城市的重点高中的学生家长大多位列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以上，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很多出国，而面向国内的保送名额也不少，即便参加高考其考上的学校档次也比较高。与其他来自更低层家庭的子女相比，他们有更多的学习和发展的机会。而较多更低层家庭子女的大专学校的学生则在为了毕业分配、为留在城里而奔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与农民工抢饭碗。家庭文化区隔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在加大。对于来自低层家庭，尤其是农村的贫困孩子来说文化课课本的城市化性质，不断带来他们所没有经历的文化特征，而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挑战。十年前，一些农村学生在上高中之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电脑，而教科书课文中有关电脑的描述，计算机课程中的软硬件操作和设计对他们来说就远远不如早已熟练有关电脑操作的城市学生熟悉。可预见的，再面对相关测试时，这些学生的表现也将远远不如城市学生。现在虽然在条件好的农村高中乃至初中已经配备了电脑，但是在涉及到城市学生在学校或家庭早已接触到的内容时，他们的竞争能力依然相对较差。而许多中产阶级家庭子女在父母的引导下，不仅早早就接触了电脑、网络、编程而且绝大多数孩子出入于各种兴趣班，养成适应城市竞争生活的习惯，并且熟悉今后城市竞争中的种种规则和能力，为顺利进入社会打下基础在竞争的起点上先行一步。这就像布迪厄所指称的，学校教育行为是一种符号暴力。无论从教育的方式还是教育的内容看，教育都是在强加一种武断性，即教育行为具有双重武断性是由武断性权力进行的文化武断性的强

加。通过这种双重武断，再生产权力关系。学校通过符号暴力实现文化再生产。学校强加给学生以统治阶级或曰主流社会的文化武断性，有利于统治阶级子女的学业成功。由于教育的文化是统治阶级的文化，所以在统治阶级文化背景中长大的儿童在教育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并被赋予文化资本。这样的文化资本被制度认可后变成一种资格，如文凭、证书等等。这些文凭与职业、地位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文凭授予是一种制度仪式，其将人们安插到组成社会结构的不同序列位置上。将那些注定要占显赫社会地位的人和那些被他们支配的人分离出来。最后通过合法化的方式把再生产的文化通过把社会等级变成学术等级，就这样，社会等级的划分就看起来是建立在天赋、能力与学生自身学习的基础上，从而掩盖了统治阶级子女文化资本的巨大威力。就这样使从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这一过程合法化。在这种被布尔迪厄称之为符号暴力的文化资本传承方式被隐喻地合法化以后，来自社会低层的子女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既成事实，从而将自己的学业失败归因于自身的原因而不去也没有能力去追究制度的公平与否。这样一来伊万·伊里奇描述的情形便再度出现：“贫困学生都直觉到学校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但是学校教育的结果却只是使得他们在比自己受到更好的学校教育的人面前感到自卑。他们对于学校的功能深信不疑这使他们有可能遭受到双重剥夺，即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公共资金被用于少数人的教育，而另一方面，许多人只得接受愈来愈多的社会控制。” **(34)**

很显然，在这样一个阶级再生产机器中，教育过程与教育内容本身都是带有偏向性的，即其本身便是一种规训且其本身也传达着意识形态，这是无法忽视的事实，这样的意识形态规训出现在城市与乡村中，出现在大型城市与小型城市中。这些符号暴力本身也是等级制隐喻的产物，在一方面，学校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灌输机器而存在，另一方面，学校作为金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机器而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当某种意识形态被强制执行时，人们总是应该仔细分析这种强制执行的实际效果。我年轻时，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教育事实上惨遭失败:大多数学生只是无视它，他们的反应是:“不要把它当回事，只要享受你的生活。”然而，一位老共产党员向我解释说，这种表面上的失败其实是一种成功:当权者希望民众无视官方意识形态，只是机械地参加官方仪式。因此，当我听说，今天在中国，学生们又被告知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我的问题是:这个禁令到底是什么意思?意识形态的空间与规范我们日常互动的习俗，是模糊和不一致的。有些禁令我们应该违反，但要谨慎地、不在公开场合违反。而反过来说，我们被给予某些自由，条件是我们不使用它们——如果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就能获得自由选择。”**(35)** 当我们把这番话抛向赛里斯的社会生活，我们便能发现许多有意思的地方。

自千禧年后，赛里斯便慢慢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世界上最“政治化”国家之一的赛里斯，我们生活都与政治有关：标语充斥着大街小巷，街道旁写满了核心价值观；考公、参军需要政治审查，在网络上的每一次发言都需要细细审度。但与此同时，我们在生活中我

们却是及其“去政治化”的，甚至是“反政治化”的。当我们在和亲人或朋友聊天时，我们大多数时候并不会谈及现今的政治。我们都知道，在生活中谈论政治时事是令人扫兴的。那是吃到嘴里的饭也不香了，刚买回来的二锅头也发苦了，整个对话的氛围都会蒙上一层阴影。随后大概就会有“谈这些干什么”，“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种种了。这样矛盾的现象统一于一个现实之中，其机理必然更为隐蔽。于是我们便需要回到赛里斯上层的“文化资本”是什么中。赛里斯的上层被追捧与推崇难道是因为他们是所谓国家、民族的代表吗？难道是因为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难道是因为他们践行那几个核心价值观十分彻底吗？显然不是，我们只要没有失明我们就能看见他们受追捧是因为他们的物质资本，是因为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是因为他们的所谓“文化审美”。前两者很好鉴别，这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已，后一者则作为文化资本垄断的结果，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便是学习绘画、雕塑、音乐会被认为是更高级的技能，而学习机电、钳工等等则被认为是低贱的技能，这便是他们文化资本垄断的结果。我们可以说，民族、国家等赛里斯官方意识形态是为了维持社会等级制本身存在，而这样的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是为了维持他们在这一社会中高级地位存在。因此，当我们看见那些完全陷入消费主义以及宣扬阶级调和的“政治工作者”我们没必要再疑惑，没必要愤怒于他们的官僚作风，甚至没必要愤怒于他们不遵守赛里斯官方自身宣扬的价值观。事实上，一个真正完全信仰赛里斯官方意识形态并将其内化于行动之中的人正是官僚们所害怕并排斥的，我相信大家都能想到这样

的“正人君子”在赛里斯的官僚体系中是如何的不得志并最终被腐化或边缘化的。但这样就又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将这个并没有人真实信奉的意识形态完全抛弃呢？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并不是这帮官僚不敢抛弃，而是他们不得不维持这一表象。若将这一表象完全抛弃，则他们维持的当今赛里斯等级制度将当场崩溃，官僚将不再是垄断权力与资本的人，私人资本主义会成为新的权力拥有者，他们的地位会一落千丈，这些官僚们自然不愿意这样，因此他们仍然维持着赛里斯的官方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仍然隐蔽的宣扬资本崇拜和消费的意识形态。要知道，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希腊人的“假意归信”重点不在于“归信”那只是表象，重点在于“假意”，而当假意改信者遇上真信徒则必然矛盾重重。

当然，作为互相矛盾的两种意识形态纵使是以表象和实质分别也终归会产生矛盾，而其矛盾就展开于网络之中。现在先让我们回到这一矛盾最初的集中地，也就是学校。设想一下，当充满着假大空和无意义文字的“校会”结束后，低头一看，自己还有卷子并未完成。在这样的情形下，到底是比真空更虚无的校会所能有效灌输的多还是一张实体的、印满题目的卷子所能有效灌输的多呢？答案显而易见，卷子将你拉回学习的现实，而学校将你拉回资本主义的现实，从小学开始，老师们便告诉学生“学习好，以后就过得好”一直到高中、大学，老师们告诉学生“好好学习，进个好学校选个好专业，进个大公司就能过美好生活”，这样的学习目的和物质财富、物质条件的绑定可算不上什么“现实主义”的这更多的是“资本主义”的。浸淫在这样的规训环境

中，赛里斯官方那个意识形态与消费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便很好的混合在了一起，其产品就是一个公务员既可以把申论写的天花乱坠的同时官僚主义入脑。

现在他们进入了网络，他们看到了张维为，看到了陈平，假意改信者看到了默罕默德。于是“神友”便产生了，原本这一表象的官方意识形态规训是空洞且并不具象的，现在这种规训加倍了，当假意改信者看到了那带着小眼镜，眯着小眼睛；似笑非笑，嘴唇紧绷的人，看见他那如同强迫症患者帮助打理的头型，听见他那故作姿态的声音，就相当于看到了化为人形的政治课本。四个意识组成了他的血肉，三个代表组成了他的经络，新时代占领了他的大脑…这样的加倍必然导致表象化的崩塌，因为在这样的具象化说教姿态下，好像所有人都是真信徒，好像所有的假意改信者都成了既聋又瞎的人，他们列出了“陈平不等式”搞出了“街道震撼美利坚”，那么“神友”必然产生，而作为加倍表象的结果，神友也并不是一个自为的存在，他们仅仅是为了否定这一表象的加倍本身而存在。从这一点上来说，神友们所要求的并不多，但从表象意识形态维持社会等级制本身来说，他们又是想摧毁整个系统。而当假意改信的“神友”遇上了将表象视作内涵的“兔友”，那么大战便不可避免，并且双方都不会有任何优势，神友依附于加倍的表象而存在，而兔友则依附虚假的内涵而存在。现实中的政治化和去政治化、虚拟中的兔友和神友，他们的产生机理都源于这同一意识形态系统，也就是说，无论是网络上“神友”或“兔友”的纷争、现实中“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矛盾抑或是官方说教的僵化八股最终都是为了

让赛里斯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畸形体系达成阶级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这既是文化资本构建的需要，也是帝国主义构建的需要。

应试的帝国

在赛里斯，教育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便是对“应试”的病态追逐。“片面应试”是一个长期问题。事实上，在我们通常提到“应试”的时候并不总是带有贬义色彩,但是说“应试教育"则不同。实际“应试教育”这个提法并不准确,因为任何一个学生都会为升学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一个教师、一所学校、一个地区亦是如此。无论是任何教育体系中都会有“应试”本身，即使走出学校，社会上的种种考试，抑或是面试、年检等考核在范畴上也都属于“应试”之列，“应试”实际上本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但赛里斯的“应试教育”显然绝不只是这样，仅仅是“应试”本身决不会导致学生轻生，但赛里斯的“应试教育”可以做到。因此，或许我们其实应该管这种教育叫“应试主义”的教育，在中文语境当中,一些原本中性的东西,加上“主义”二字便会具有了贬义色彩,正如“平均主义”之于“平均”,“"形式主义”之于“形式",“个人主义”之于“个人”,“应试主义”也是如此。在“应试主义”的教育当中,“应试”的价值被无限放大,大量简单的、违反教育规律的手段被广泛采用,从这里我们显然无法找到任何以让学生有着“完整身心健康”为目标的教育手段，也就是说赛里斯的应试主义教育并不在乎学生的“主体性”构建，也就是不关心学生是否是一个完整、健康的“人”，而更多的是通过异化学

生的主体性以规训学生达到阶级再生产。如果说经济发达地区的重点学校尚且还存有对学生兴趣、个性的尊重,那么广大的非一线城市学校则基本上是简单机械的“规训”完全挤占了原本属于“教育性”的空间，致使教学的丰富性被完全抽离,形成了“千校一面”的情况;学生的多样性发展被阉割,特长和爱好则成了“妨碍学生进步”、“拉低成绩”的缺点。在这一体系中，学生层次性发展被限制为单一的分数提高，这也导致了所谓“小镇做题家”的存在和“高分低能”的现象,诸如此类。当各种规章制度成为这种强制的保障,将全体学生都无一例外地纳入“应试主义教育”的体系中时,学校便不再是一个"教育性”的环境,而是一个“简单规训”的场所。在“应试主义教育”当中,由于教师是被规训的对象,因此其教学必然也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当追逐分数的意图被放大到极致的时候,教学过程本身也必然彻底沦为对学生的简单规训过程。

我们都知道,赛里斯的“应试主义教育”具有急功近利的特点,这一系统要求教师必须尽可能快地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这样才能让学生在激烈的高考竞争当中占据优势，而这样的教育体系发展到如今，其本身也因长期异化学生导致其自身同样被异化，“应试主义”的教育早已从选拔学生的手段变为学生乃至老师们所追逐的目的。从这一目的性的体系出发,诸如满堂灌输、题海战术、周周清、堂堂清等教学方式便成为广大教师的选择。例如“满 堂灌”的教学方式,由于可以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把尽可能多的考试信息传输给学生,因而对提高学 生的考试成绩有明显效果。有教师总结说:“满堂灌”是“在大规模班级的

环境下,为争夺学生的 时间资源,专门针对考试内容进行训练而最大化高考效益的教学行为,是一种有效的高考教学模式”。并且,类似这样的经验甚至得到了实证研究数据的支持,有学者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构建了学生的学习行为模型,发现“针对考试来说,特别是在学生时间有限的条件下,应试教育的 成绩效应显然要大于素质教育。”**(36)** 当教师们普遍地采用上述手段来提高学生考试分数的时候,如果某些教师“不识趣的”采取了“素质教育”的教学方式,往往就会导致其学生在高考竞争中的失败。当年的“南京高考之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考生直言不讳地说:“高中三年学习中,学校教学只有 80%的时间和高考有关，学校用上课时间给我们组织社会调研、第二课堂等素质教育的内容,占全部学习时间的两成多,但这些对高考没有用,我 真后悔当初浪费了太多时间。”**(37)** 因而,迫于分数的压力,教师对教学方法的选择并不自由,而一些教师从自身教育理想出发而采用的教学方式也大概率被学校依据“应试经验”进行“规范化裁决”,而这样的“体制纠偏”机制也就直接的让很多教师放弃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理想,转而成为帮助维护和完善应试体制的“修理工”，另一些教师则进一步探索应试体系的效率边界，成为应试教育学的“实验科学家”。

当然，教师的教学被规训,并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对教学方法无法自由的选择,更体现在对学生进行“应试规训"这样的异化活动已经成为了许多教师的习惯。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上，陈彬莉曾对教师为什么选择“灌输式教育”做了一次简短的访谈**(38)**：

访谈者:为什么所有老师都要搞灌输呢?

Z 老师:要高考啊,不这样怎么高考。

访谈者:难道就没有别的提高学生成绩的方法么?

乙老师:就这种方法最管用,我们那么多老师的经验,你看我们有谁不这么干的,高考就这 样考的,我们只能这么救。

访谈者:既然你说所有的老师都一直在这么教,说明没有试过别的办法啊,没有试过,怎么 能说别的办法不管用呢?

Z 老师:那你说有什么方法?你教我还有什么方法管用? (他在这个时候或许是误会了,也许以为我要以“博士”的头衔对他们的教学进行指手画脚,所以他的反问提高了声音。陈彬莉注)

访谈者: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是想知道老师们都试过些什么办法,因为我听说有的学校改走素质教育的道路,结果成绩反而升上去了。

Z 老师:什么素质教育搞好了,应试教育就跟着搞好了,我才不信有这种事,我跟你说,那些都是媒体包装出来的,是拿来吹嘘的,如果真有这种方法,我们校长还不赶紧跑去学过来啊?你说的这种,我们那些什么国培专家、课改专家都来讲过,都是些空话,实践当中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

从这段访谈中可见,“应试规训”不但磨平了教师对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多样性的探索动力, 并且使身处“应试主义”教育中的教师对各种规训手段产生了路径依赖。由于教学方式的更新如同技术的演进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教学方法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之后,这一既定方向就会在之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对愈发严重的路径依赖。就像诺斯说的那样: “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

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这一经济学的推断在“应试主义”教育体系当中同样适用。当经验告诉教师满堂灌、题海战术和周周清、堂堂清等方法能提高学生的成绩时,他们就会养成对这些方法的路径依赖,并拒斥对新方法进行探索,从而对“应试规训”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我们能看到，这是一个既异化教师也异化学生的规训机器，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事实上都已成为这一规训体系的输出产品，与一般的机器不同的是，规训的机器可以将自身的零件本身作为其产品向社会输出。

当然，赛里斯政府也不断进行着所谓的“教育改革”教材、课标一轮一轮的换。理论上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的教学改革理论上或许对打破教师们的路径依赖有所帮助,而且那些媒体有时也报道声称“教改等于成绩下降的怪圈正在被打破”。但在实践中,教学改革却显得步履维艰,甚 至出现了“高一搞课改,高三抓应试”的尴尬局面。当然其根本原因是作为简单规训机构的赛里斯教育体系本身便是赛里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地位与向被压迫者管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机构，其目的仅仅是阶级再生产罢了。而从其表面上看，那些开展“素质教育”的大都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重点”学校,这些学校依靠着一流的硬件、从全国各地网罗的雄厚师资和相对的生源来保证考试成绩,同时还能给“素质教育”留出部分时间。但这些学校为了赛里斯政府的宣传需要，对外把学生考试成绩的提高,挂在"素质教育”的名义下,声称是进行了"素质教育”后取得的成绩,人为地在素质教育和考试分数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而在这些学校内部，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此都心知肚明。正如有学者形容的:这些学校“经济实力强、关系实力强、校长外交实

力强。”

这些学校教师实力强,往往一经包装,立马成为“xxx 示范校”或“xxx 先进校”。“xxx”是这些学校“素质教育”所侧重的方面，如“传统文化”、“科技”等等，这些称号一经地区教委批准，它们便有资格和更多的资本挑选到更多的好学生,因此,可以说其推行“新课改”或“素质教育”和它们的升学率关系并不大。而反过来，对于广大非“重点学校”在，它们在素质教育和考试分数之间存在较大矛盾,它们很清楚这种因果联系其实并不存在,因而往往只能舍“素质教育”而保“升学率",采取进一步强化灌输、题海战术、周周清、堂堂清等更加被认为是符合学校现实情况的方式来努力提高学生的分数。这样,“应试规训"便拥有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首先,让广大师生看到"应试规训”对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确有成效;之后，使其产生路径依赖,从而为“应试规训"的教学方式进行辩护;最后,再推行治标不治本的教学改革措施以将文化资本积累、阶级再生产和学生希望自身可以真正的“全面发展，以成为自为主体间的矛盾掩盖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矛盾，使得那些并不解决矛盾的改革根本无法深入到“应试主义教育”体系的内部。这样,“应试主义”完成了对教学的“教育性”的彻底解构。因此,赛里斯“应试主义”的教育体系，本质上是按照经济学的效率原则而非教育原则,采取简单化、机械化的规训，将考试本身由检测学习的手段变为学习的目的，以快速、高效地完成阶级再生产的一种规训形式。这种规训形式将其他任何教学形式都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使从学校领导到教师、学生以及家长都难以获得"应试规训"以外的成功经验,从而成为

“应试规训”的实际支持者和拥护者。这样一来,“应试规训"的盛行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恰如福柯所说,“规训技术构成了现代社会运行的微观机制。”**(39)** 同样的，“应试规训”也构成了“应试主义”教育体系的微观运行机制。

如上文所说，“应试规训”直接服务于高考分数。但是,高考分数为什么如此重要,以至于让整个基础教育都不惜牺牲“教育性”而采取“应试规训”的策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因为高考很重要,所以高考分数就很重要。我们很容易想到,大学生也会参加很多重要的考试,诸如英语四六级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公务员考试等等,这些考试在范围和影响力上已经不输高考,但并未让大学教师在课堂上采取“应试规训”的手法,也没有造成大学课堂“片面应试”的局面。因此赛里斯“应试主义”的教育体系其定位与进行所谓“高等教育”的大学有极大不同。以中学教育为例,自1949年以来,赛里斯的中学教育长期被定位成“预备升学”和“培养劳动者”的双重定位。1952 年赛里斯教育部颁发试行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中,将中学定位成“为升入高等学校或参加建设工作打好基础”, 1954 年赛里斯政务院（国务院前身）颁发的《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标》中提出,中学教育“要供应高等学校以足够的合格新生,并且还要供应国家生产建设以具有一定政治觉悟、文化教养和健康体质的新生力量"，在这段时间里，中学主要是以将学生培养为建设赛里斯的合格劳动者为主要目标，而赛里斯此时人口素质相当低下，以至于仍然普遍存在青壮年文盲，在这个阶段中学教育以提高全民素质并选拔优秀人才接受高等教育为目的，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给

予中学教育主体地位。到了 1978 年赛里斯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育计划(试行草案)》，1981 年 4 月颁布《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育计划(试行草案》,两份文件中都将中学教育定位为“为高级学校输送合格的新生,为社会培养优良的劳动后备力量”的机构，数十年发展，赛里斯中学教育的主体性仍未被承认，无论是“预备升学”还是“培养劳动者”,这两种身份强调的都是一种外在于中学教育的价值目标。实际上，中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并未得到肯定，而随着赛里斯新兴统治阶级的显现，中学教育也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意识形态灌输任务，赛里斯的中学教育彻底成了赛里斯统治阶级规训学生的工具。

而近两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急剧改变,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使赛里斯“教育—就业'的功能链条快速失灵，在危机中的劳动力市场,“教育文凭—职业”的匹配机制被打破,大学生每年都越来越多的涌入社会，人与岗位的失衡使得大学生在竞争中也越来越不占优势。因此赛里斯政府开始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扶植力度，并加大高中入学门槛，将中考分数线维持为仅有一半考生可以考上高中的位置，而这一切并不以教育本身为考量。不难看出，赛里斯政府将“工具理性”嵌入了教育体系中,他们把教育活动本身去价值化,而只是将其作为获得其他价值的工具或者跳板。这种工具理性的价值定位有两个特点:

一是它符合赛里斯传统的“学以致用”和“学而优致仕”的思想,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经常说,高考可以帮助学生“跳龙门”,“定终身”,“光耀门楣”,这些说法便是将高考本身“工具化”的的体现。在高考之前,高中三 年乃至整个基础教育阶段都可以说是在直接或间接地为高考

做准备,因而基础教育的全过程实际上都是这一“工具化”的自然延伸。二是它极大地拔高了高等教育的地位,从而具备了价值观层面的指导意义,并且这也和自上世纪遗留的将大学生视作“骄子”的观念相吻合,因而很容易得到认同。有学者将高考形容为赛里斯高中教育文化中的“图腾”,这其实就是对被工具理性思维无限拔高的高等教育价值的一个形象比喻。很多高中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的迷茫就很能说明问题:很多高中生不知道我能到大学学习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但却一直义无反顾地争取考上大学。这种“义无反顾”的心态,就是将高等教育乃至高考成绩本身视作“终极目的",而将基础教育仅仅当成实现目的的“工具”的体现。

教育本应该是发展学生认知能力的事业,而非仅仅作为工具或跳板。认知理性追求的不是 功利性的目的,而是知识本身,是使认知活动合理化的思维方式。若以帕森斯的定义,认知理性是“对认知活动合理性作出的价值观层面的承诺。其中“认知”一词具有文化相关性,理性,一词则主要是一种社会属性的东西。因而,认知理性是一种将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关联起来的价值观模式。”**(40)**,在他看来,认知理性涉及的对象就是智力活动中的问题,而智力活动正好是教育活动的本质特征之一,因而,认知理性的本质可以看作是对知识本身价值的智力追求。认知理性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核心规定,一是认识活动在进行中表现为主客体二分,也就是说其认识对象是所谓“客观知识”或者说“真理”;二是认知是逻辑化的,因而对对象的认知应该是一种逻辑认识,也就是获得一种关于对象的逻辑上明证的规定系统,这一系统

具有逻辑上的确定性和必然性,也就是说,学生的学习不仅要知其然,还需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在教学过程中最需要关注的是这样的知识本身可以做什么,这样的教育理念实际上更重视“实践”,实践本身便是一个对知识逻辑化的过程,但很显然,这样一个以“实践”为主要教育手段的体系必然与赛里斯统治阶级所要求灌输的意识形态不能相容。

从单纯的“应试”角度来说,赛里斯的课堂和福柯描述的“规训教育”一样,“保证了一种时间和姿态的更佳利用”,也就是具备了工业生产中流水线作业的形态,这使得其课堂体系在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方面显得更有效率,在赛里斯的教育系统中,效率就是一切,实行机械规训何乐而不为。于是,赛里斯的教育体系当中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就是工具理性和认知理性之间的矛盾。因此当工具理性被统治阶级所青睐,从而挤占了认知理性的空间的时候,种种“应试规训”的措施便代替了教育的手段,教学的教育性被弱化甚至丧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上述分析中可见,在基础教育阶段,“规训”之所以能够取代“教育”,实际上是因为阶级社会阶级再生产需要,而赛里斯的教育体系之所以如此有特色,则是由赛里斯社会意识形态与官方灌输杂糅的结果,事实上对“考试”本身的图腾式信仰也可以归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化。也有人认为,高考选拔中的“分数崇拜”也可以看成由我们的社会文化建构出来的,在现代赛里斯社会中,阶级再生产必不可少,如果没有“分数崇拜”维持赛里斯的教育体系,那么阶级再生产的手段将变为纯粹的资本比拼、暴力竞争、人情依附(找关系)这样纯粹的依托社会资

源进行再生产。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赛里斯的教育体系其目的不在于“教育”他们甚至不愿意将目的伪装成“教育”本身，而是赤裸的进行阶级再生产，诚然教育作为阶级再生产的工具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样的，但随着赛里斯帝国主义的发展，赛里斯的教育体系也有了新的变化。

帝国的明天

从法律上严格来说，赛里斯的义务教育发展始于 1986 年颁布实施的《赛（中）里斯（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但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重点化发展实际上自赛里斯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便开始实施。赛里斯的教育在改开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着重点化的策略。1953 年 5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办好重点中学。"此后在 1953 年 6 月颁发了《教育部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些中学与师范学校的意见》，1962 年末又颁布了《教育部关于有重点地办好.首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当然，在文化大变革的几年里，重点学校这样完全的资产阶级法权残留自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重点学校获得全面恢复,并被真正提升到战略高度。随着两年过渡政府的落幕，在赛里斯第二代领导人的要求下，1978 年 1 月教育部便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 两年后又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并且在各类文件中不断强调重点学校建设。义务教育重点化发展可以说是在赛里斯教育资源不足且不均的的时期集中精华以培养所谓“高质量人才”

所施行的计划，但一般来说入选这些学校总需要“走关系”这也就导致了少部分人垄断教育资源并且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均。并且随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不断深入各个领域，赛里斯的“重点化”教育便也具了鲜明的“效率优先” 特征。

赛里斯的教育体系在这一时期正如邓小平那句著名的"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41）的无耻论断一样，赛里斯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差距越来越大，赛里斯教育体系的重点化发展正是对这样的“邓小平理论”的贯彻。赛里斯中央在 1985 年颁布的文件甚至在其中直接“演绎”了邓小平的这句话,强调“必须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同时鼓励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帮助后进地区,达到共同的提高。”（42）不得不让人感叹复辟的全面性。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对各行各业的人 才需求十分迫切,而推广义务教育重点化则迅速培养了一批高质量人才。重点学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示范”作用，为赛里斯“应试主义”教育体制的形成贡献突出。

与此同时，随着重点化的发展，重点学校们也开始了自己的资本积累。重点学校在校长任命、教师招聘、教育经费、设施设备等方面享有特权,其所获得的教育资源远远多于普通学校。在教育经费方面,“1978-1995 年某地区重点中学的学生平均经费比非重点学校多出 10%~20%。在师资力量方面,1981 年时,重点中学教师本科毕业率达 40%左右,而非重点学校只有 10%。在仪器设备方面, 1978-1995 年县重点中学投入设备费 100 多万元,区重点中学投入设备费 62.2 万元,非重

点中学只能从预算外争取到一些设备费。"而贯彻“邓小平理论”的影响还不止于此，重点学校绝对集中于城市,因而城乡教育差距被拉大，“1982 年对 1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348 所重点中学的调查显示,城市 243 所,占 70%;县镇 98 所,占 28%;农村 7 所,占 2%。其中 7 个省、直辖市的农村没有一所重点中学。”**（43）**在城乡差距拉大的同时，地区差异也被拉大，东部地区重点学校远远多于中西部地区,而且随着这一政策的持续,如同工业革命让社会日益分为两大阶级一样，学校“优者愈优，劣者愈劣”的发展情况也日益明显。这对于学生来说,无论是在教育机会、教育过程还是在教育结果上都是绝对的不平等的。同时正如我们上文所提到的，重点化为赛里斯“应试主义”教育体制的形成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赛里斯各种社会资源分配越发不均，即使是改革开放中崛起的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们也只能将孩子的未来寄托在教育上。他们对教育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从重点小学到重点初中到重点高中再到重点大学,资源越优意味着竞争越激烈,层层压力不断下放给学生和家庭,在“学习—考试”的体系下，学生、家长乃至老师都慢慢产生了“应试主义”的观念，学生学业压力和负担越来越大。而在此过程中还不断滋生各种教育“行为艺术”和教育腐败,遍布全国的“条子生”“关系户”等现象无法根除,择校费、借读费、赞助费水涨船高。随着社会的市场化，赛里斯的重点化策略反而增强了教育行政化和等级化。一般说来,重点学校会获得比普通学校更高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地位,国重、省重、市重都具有不同的行政地位和行政级别,而重点中学的行政级别又高于重

点小学,如此等等。学校拥有的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成正比。由此形成了义务教育学校坚固的权力金字塔，以至于官僚主义都在学校生根。

直到新千年钟声敲响的前夜，赛里斯中央才开始实行“均衡化”，以减缓地区间教育资源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政府终于开始逐步关注非重点学校和薄弱学校的发展，并宣称要取消重点校和重点班,貌似教育均衡发展指日可待。到了 1997 年赛里斯政府明确提出“要加强薄弱校建设,促进义务教育学校的均衡化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44）赛里斯政府开始用单一的行政命令推行“均衡化”。与赛里斯加入世贸组织同一年，赛里斯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此后，“均衡发展”四个字逐渐成为赛里斯政府义务教育政策中被提及最多的词，但就像裕仁从“昭昭天命，和谐万邦”里取年号“昭和”一样，文件里的“均衡发展”并没能起到什么作用。，2002 年赛里斯政府提出“积极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衡发展。”（45）2005 年又说要“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摆上重要位置”（46）但正如经济学研究里存在政府既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又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的“政府悖论”一样。在教育领域,“政府悖论”的存在也将义务教育均衡化的要求变成了一个形式。在“均衡”方面，赛里斯地方政府对其认识堪称“盲人摸象”，教育均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教育公平,而公平本身所需要的条件多种多样，其既包含让

能实现均等的实现均等,也包括对因外在不可抗力作用下，综合分析后不能实现与其他教育机构均等的机构提供补偿。但现在赛里斯地方政府在经费分配、设备投放等方面片面追求“平均主义",在“均等"行为

表象下其实在制造新的不均衡。而对于“教育”本身，赛里斯地方政府则以功利性的“政绩”逻辑对教育施加影响。他们一方面宣传着“均等”一方面为了彰显政绩,将财力、物力集中投入部分学校,力图打造“名校”来展示自己的有为。这种假借“树样板”实为“建功劳"的做法,就是在拉大学校间的差距。也有的为了体现当地教育质量,默许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利用“名校率”、“达线人数”等作为宣传“教育实力”的标准,造成了学校以及社会对高分数的追求，而这样“双面人”行为的原因是我们上文所说的“政绩”晋升体制，其并非是赛里斯政府可改变的，这是赛里斯畸形的国家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当然，这也必然进一步导致了教育均衡的表象化。并且即使是对“均衡”有利国家政策,赛里斯地方政府也会在实施过程中大打折扣。比如对于教师轮岗交流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地方政府在推行过程中比起解决问题更倾向于屈服现实,只是表象化地执行政策,象征性地将部分教师进行轮岗交流,这也使得师资不均衡并没有改变。而为了上级看到自己正在努力推进教育均衡化,地方政府往往采取其他举措,如“集团办学”、“引进名校”等,但在这种轰轰烈烈的表象下,教师和教学资源并未实现流动,先进的教学理念也难以实施,使得“集团办学”、“引进名校"只能成为地方政府邀功的凭证。**（47）**

早在 2006 年，赛里斯中央便以法律形式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48）**但直到现在重点校和重点班的现象仍然显性

或隐性地存在,没了重点班可以有“实验班”、“宏志班”，没了重点校可以有“实验校”、“示范校”教育均衡发展即使是落实在法律层面上也不能阻止因赛里斯应试体制和社会性质所生长的教育失衡。与此相应，重点校和重点班的观念更是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教育公平包括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而所谓均衡化着力解决的是教育起点公平问题,赛里斯义务教育的覆盖率和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经极高，但是想要在保持现有政治体制和社会性质的前提下实现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义务教育均衡度来说,赛里斯若想实现义务教育的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而即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如期 实现,也仅仅意味着给予学生基本的相对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一些东部发达地区高水平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而一些中西部地区则仍然处于低位均衡发展水平,而只要依然让教育与经济绑定，教育体制便不可能满足赛里斯民众对平等教育的渴求,以至于农村教育“空心化”、大班额、择校危机等问题和矛盾最终无法破解。赛里斯幅员辽阔,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教育平衡发展的具体实施在不同地区差别巨大。一项研究表明，2017 年我国贫困地区初中阶段每 100 个孩子中,约有 6 个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因厌学或学习困难学的学生可能占到辍学学生的 60%以上。面对着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差异，以资本主义为立身之本的赛里斯现政府当然不可能将教育“去市场化”，于是赛里斯政府在“均衡化”的基础上提出了“特色化”。

伴随着赛里斯改革开放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几次教育体制

改革让教育自主权逐步下放,地方政府在宣传“重点校”的同时,也开始为各类“特色校”划拨资金。对此,赛里斯中央政府也相当热心,“特色化”既出现于政府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与教育公平的政策语境中,又不断出现于政府提高教育质量的政策语境中。1993 年,作为 20 世纪末赛里斯教育体系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赛里(中)斯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提出要“中小学要办出各自的特色,注意发现和培养有特长的学生。”同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义务教育要努力办出特色。”21 世纪后赛里斯政府更加要求"学校应有符合素质教育要求和体现学校特色的办学目标和发展规划。”**(49)** 2011 年底,赛里斯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此时,2008 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尚未散去,赛里斯经济虽然依靠天量的货币供给依然繁荣,但比起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重点学校”发展各类“特色校”显然能节省不少费用。于是地方政府也开始关注“特色校”的发展,2010 年要求“大力加强学校文化建设,推动学校特色发展。”**(50)** 而作为赛里斯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赛里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鼓励各个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自此开始,赛里斯的教育“特色化”进程正式开始,各种“传统文化示范校”、“科技示范校”等新名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了 2013 年,教育部已经把“推动中小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出特色”**(51)** 作为教育改革的要求之一,五年后教育部又再次强调要“立足学校实际和文化积淀,结合区域特点,建设体现学校办学理念和思想的学校文化,发展办学特色,引

领学校内涵发展。"（52）当然，赛里斯的教育“特色化”在实际实行上比这种种文件中所要求的更有“赛里斯特色”，各种“重点校”经过“特色化”摇身一变成为“特色校”继续坐拥其教育资源分配的优势地位，其次特色化并不改变教师资源和教学硬件设备分配，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而特色化进程中每个学校在“特色化”的形式本身上所花费的资源却并不少，几乎所有“特色化”后的学校都或多或少的重新装饰了校舍，甚至有些学校用大笔经费为“特色化”的展示修建专门的建筑。而“特色化”本身又都是“应试主义”教育机制下的“特色化”，特色活动流于形式，甚至根本没有特色活动，而在特色化的另一面，是因“特色化”要求不断被吞噬的教育拨款。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能够达到赛里斯教育部所要求的“特色化”目标的实际上仍只有经济发达地区的原“素质教育”学校。

当然，赛里斯教育改革中“产业化“和“去产业化”之争也体现着赛里斯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过程。1999 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前后，在北京这个赛里斯黄金王座的所在地，从南到北的各个相关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就教育产业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实，这种讨论在赛里斯改革开放以来已不是第一次。在 80 年代中期和 90 年代中期，教育界已经进行过两次讨论，这些西装革履的“教育专家”们讨论的出发点是教育体制如何适应经济体制变革进行相应的改革,在那时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学校企业化等观点已经提出。当然，我们要知道其讨论的社会背景，到了 90 年代，政治动荡刚刚结束，又迅速迎来物价闯关，官僚腐败屡禁不止，甚至在那时官僚主导

的企业私有化即使还没生产出一个产品，仅凭交易这一活动本身就已经可以被纳入经济发展的范畴，而实际生产力水平则增长并不快。伴随着这样的社会背景，这次教育界的大讨论的出发点之一就有了拉动经济增长一项。自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赛里斯出现了产品的相对过剩，赛里斯徘徊在经济危机的边缘，于是赛里斯新生的统治阶级关注的焦点就成了如何刺激消费和投资、加大出口以拉动经济增长。在各行各业较普遍地呈现 “买方市场” 的情况下，教育是为数不多的“卖方市场”之一，统治阶级的视野转向教育，期望通过教育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刺激消费与投资，以缓解赛里斯的经济困境。

就这样，赛里斯的教育产业化开始起步。随着教育产业化逐步提上日程，赛里斯的“御用文人”们随声附和，到了 2002 年，史秋衡的《论高等教育产业化趋势》将这一叙事引向高潮，这篇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上的论文顺应了赛里斯统治阶级迫切希望融入国际资本主义秩序“与国际接轨”的思想：

“从大学理念看,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 参与到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作为高 等教育产业化理论主要发源地之一的美国,其大学理念的变革充分显示了国际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基本思路。” **(53)**

当然，作为论证，这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但这样的论述显然能打动世纪初刚刚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只能够受益，更加迫切的希望融入全

球资本市场的赛里斯政府，当然它并不止步：

“高等教育产业化凸显高等教育的营利性手段。在解决高等教育财政危机中,营利性私立高校成为一种国际发展趋势,公立高校和非营利私立高校也在注重经营效益和营利能力。我 国民办高校多年来几乎一直是自负盈亏,借用企业经营方式,注重营利性手段,为它们从无到 三分天下有其一,提供了极其有效的规模扩张途径。我国公办高校也在学校经营上大大提高了办学效益,在引入市场机制方面卓有成效。”**(54)**

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赛里斯在当时财政紧张，他也直击这一痛点，而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其要求尽可能多的商品化，以缓解其内在矛盾，教育的商品化同样是如此。但在他看来教育的商品化是先进资本主义和市场完善的标志，于是他提议道：

“知识产业化使知识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高校产权形式。知识产业化,是指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开始服务于国家产业的需要,这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基石。知识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手段 以越来越高的程度参与并融入产业活动的过程,信息不再是无成本的无形物质,而是商品化的无形资产。当这种过程非常普遍时,知识也就产业化了,高等教育也就随着知识的产业化而进入国家产业结构。知识与高等教育的产业化程度可以用知识产业在国家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知本家”和高校中的知识股权,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概念。” **(55)**

这段论述与其说是“图穷匕见”不如说是作为小资产阶级或小生产者的大学学术体系知识分子的谄媚，而其助推教育产业化的最主要论点则一直着力于“商品化”带来的赛里斯政府财政收入，并不十分关心

“公平性”问题。这与千禧年后赛里斯全面市场化、资本化带来的资本快速增长和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有关，在表面上经济迅速发展的遮蔽下“公平性”问题被排除在主流视野之外，赛里斯政府更是让官僚和资本的同盟关系演变为融为一体。“官方”尚且如此“御用文人”们的轻视也就顺理成章了。而随着赛里斯渐入帝国主义，剥削和镇压的力度不断加强，经济发展也很快趋缓，教育产业化也被“去产业化”所替代。当然，去产业化绝非“去资本化”，而是将教育体系与行政体系进行更深度的绑定，让教育资源的交易在官僚系统内的“暗处“进行，作为“御用文人”曾经极力鼓吹教育产业化的史秋衡则在 2019 年第 6 期的《人民论坛》上发表了《以人民为中心促进教育公平》绝口不提教育产业化：

“建设教育强国需要教育公平。教育强国思想是习近平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 “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可见,我国政府深知只有不断发展优质教育资源,才能快速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进而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与此同时,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整合优化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也是缓解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及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有效举措。习近平总书记表示, “我们将通过教育信息化,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数字差距,大力促进教育公平,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可见,真正的教育强国一定是能够使每个人都平等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一定是使能够使每个人通过接受教育改变自身的

命运。然而,真正实现优质教育公平依然任重道远,需要根据教育公平的阶段性特征,适时调整教育公平政策的针对性和侧重点,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正如习总书记指出, “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 (56)

作为“御用文人”同一个人，却发表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这足以说明赛里斯政府政策的变化，而我们从他的行文变化中也能发现赛里斯宣传要求的变化。事实上，随着 2021 年 7 月赛里斯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开始实施“双减政策”，赛里斯的教育就正式进入了“去产业化”的最后阶段，但与人们起初预期的通过禁止课外辅导的商业模式促进不同家境的学生间的教育公平不同，赛里斯政府在禁止商业化的课外辅导后快速推行“领航计划”以在校教师筛选进入的模式将“补课”限制在国家教育系统中，而这一过程的模糊性和可操纵性则相当之大，因此与其说是赛里斯的教育正在“去产业化”不如说赛里斯的教育在进行另一种“产业化”。

2、意识形态

如前文所述，赛里斯统治阶级所宣扬的的意识形态无非是两个方面：资本主义的和“特色社会主义”的。这样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所引起的矛盾和其产生机理我们在前文已经讨论，因此本章将着重分析这些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影响。所谓“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无非分为两方面：国家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其叙事统一在以国家机器为主体的民族复兴叙事下。诚然，赛里斯政府也在近些年愈发重视“传统文化”的宣传，但事实上引入“传统文化”的概念无非是为了加强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宣传效用，并将这些近代概念包装为“祖宗之法”。因此，在可以划归“特色社会主义”之列的意识形态并不比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为高明，并且随着赛里斯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其意识形态也正发生变化。如“民族复兴”的含义已经由“不被欺负”变为“成为世界第一”。而可以划归资本主义的那部分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赛里斯全面的拥抱了消费主义，甚至连“传统文化”也积极的与其融合，赛里斯拥抱消费主义本身也正是赛里斯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随着赛里斯走向帝国主义，消费主义也正不断发展，即使赛里斯政府表面上反对也并没有任何效果，因为这也是赛里斯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将一切的文化符号商品化和资本化的要求。因此随着赛里斯帝国主义的发展，其意识形态既是其帝国主义发展的结果，也是其帝国主义发展的推动力。

国家、民族的互联网+

按照斯大林的定义：“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57）而黑格尔更是直接说：“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58）在赛里斯，民族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是“大落大起”在改革开放前，民族主义和赛里斯的社会主义性质天然对立，所有的宣传都会自然而然的告诉我们“有阶级而无民族”，而这一叙事在改开后被拦腰截断，民族主义随着赛里斯资本的卷土重来成为了赛里斯的重要意识形态之一，但 2010 年前赛里斯的话语权仍被“河殇文人”们所把握着，自由主义思潮冲散了民族主义叙事，但随着 2012 年后赛里斯发展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与对内垄断愈发需要一个意识形态大旗，于是赛里斯的民族主义开始重新由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宣扬。当然，民族主义本身早已是陈年旧物，但随着赛里斯的分散式威权系统弥散到互联网空间之内，新时代的赛里斯民族主义呈现出网络化、娱乐化、极端化的特点，而“二次元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破壁”则集中体现了这三个特点。虽然很多二次元爱好者对“次元之壁”进行了心理层面的想象性建构和话语层面的象征化表达，但这种试图将二次元的趣缘社交网络圈定为某种非政治化的自治空间的“次元之壁”，从来都是裂隙重重、岌岌可危的。而近年来，在多方势力的合谋之下，这堵“次元之壁”从内外两个方向遭到了双向爆破，次元之壁的打破使得二次元彻底被政治化，许多全新的文化现象被创造出来，而“二次元民族主义”也由此兴起。

从二次元群体内部看，造成“二次元民族主义”兴起的动力，是源自“二次元文化”这种在赛里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亚文化所发生的主流化趋势。运用“次元之壁”这样自我放逐式的话语策略，在帮助二次元爱好者暂时消解二次元文化与三次元文化的矛盾冲突时，也意味着将“二次元”群体与“三次元”的主流人群对立起来。而随着“90 后”乃至“00 后”日益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一部分，对于因年龄增大和社会地位提升而部分地获得主流话语权的不少二次元爱好者来说，“次元之壁”这样一种自我放逐式的对策终究不能真正解决矛盾。对于这些追求主流化的二次元爱好者来说，寻找一条与社会主流话语的有效对接路径，以完成对于“ACG”爱好的自我论证，就成为了最紧要的事情。而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话语体系，正是相对而言最为便利的选项之一。以 2008 年 4 月的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事件为一个标志性的契机，越来越多的二次元爱好者“破壁”而出，积极主动地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身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立场，并且通过 ACG 同人创作这样的二次元文化形式抒发他们的“家国情怀”。

事实上，在这个时期的二次元爱好者大多都是在 1990 年代以来的社会剧变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真切地置身于转型期社会的价值真空之中；而在他们的生命经验中，日本 ACG 作品，尤其是不少“燃系动漫”的世界观设定，虽然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大都堪称宏大，它们正是以各具特色的方式，为填补二次元爱好者在文化价值上的匮乏，提供了各式各样的代偿。因而，虽然赛里斯的许多二次元爱好者在“三次元世界”从应试规训阶级再生产到社会规训阶级固化的残酷且悲观的

环境中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利己主义的姿态、一种个人主义甚至是“原子主义”的生存策略，但与此同时，他们却会从“二次元世界”中汲取一种替代性的情感展现和临时性的宏大叙事，以减轻赛里斯分散式威权社会对人社会属性异化和对人本身的异化所带来的空虚和痛苦。这些二次元爱好者对于 ACG 中宏大叙事的这种接受本身便是同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间保持的某种具有亲缘性的接口，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接口”也就会与“赛里斯民族复兴”背景下兴起的网络民族主义浪潮，以及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所着力宣扬的“赛里斯梦”话语体系发生非必然的接合。

在另一方面，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在宣传“实现赛里斯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也在尝试至少在表面上突破早已僵化数十年的宣传模式，尝试借着年轻一代“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以期实现更为良好的宣传效果。就赛里斯国家机器的宣传需求而言，广为年轻人所喜爱的 ACG 文化无疑是一个上佳的民族主义载体，在上文，我们讨论过赛里斯意识形态灌输的二重性，在其宣传载体的选择上便更能体现这一点：一方面 ACG 文化并没有显著的“政治倾向性”，为赛里斯政府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放置其中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ACG 文化又有显著的娱乐化和消费化特征，当代的 ACG 文化产品有显著的商品特征，其本身便是作为文化消费品而被生产，这样的特征使得“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些意识形态的严肃性被消解，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如“棒子”、“猴子”等在特定语境下带有对其他国家或民族有着侮辱性质的言语以“梗”的方式广为传播，但实际上这和“支那”

这样的蔑称毫无区别，但这些“梗”的严肃性已被消解，因此人们说起这些词变得毫无负担。于是赛里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就构成了破解“次元之壁”的一股外部力量。青少年亚文化的主流化诉求与官方宣传的大众化需求的接合，使之形成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空间，敏感的文化产业从业者敏锐地捕捉到其中蕴含的商机，随即将积蓄多年的同人创作潮流转变为商业化发行的文创产品，就这样，官方意识形态的宣扬与资本主义的消费产品便合二为一了，赛里斯意识形态机器的二重性再次体现。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成立于 2014 年的私人资本公司翼下之风动漫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5 年出品的网络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沿袭网络称呼，我们简称其为“那兔”，作为“兔友”这一群体划分的命名来源，“那兔”绝对是一个“次元之壁”被爆破的标志性事件。“那兔”改编自网友“逆光飞行”自发创作并在网络上连载的同名漫画，其主创人员大多都是投身动漫行业的二次元爱好者，对于 ACG 的媒介技法和文化语法可谓谙熟于心。这部动漫作品相当有效地运用了 ACG 文化的“拟人化”手法，这样的“拟人化”由日本动漫《黑塔利亚》发扬光大，但与《黑塔利亚》以喜剧形式着力描写“国家日常”和拟人化的“民族性格”不同，“那兔”先是将各个国家比拟为各种动物或物体，再对这些动物进行拟人化的处理，而在此之中赛里斯并非“化身为龙”而是“化身为兔，不得不说，制作组为赛里斯塑造了一副颇为讨喜的“萌化”形象，首先这使得赛里斯的观感大为改变，赛里斯在其中以“弱势”的形象存在，其次使得在正统叙事中显得严肃沉重的历史讲述变得相当

的娱乐化，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严肃性，使之更易传播。当然，动物拟人化的各个国家中，许多国家都并非以其本民族文化为依据，如越南的形象为猴子，朝韩形象为“棒子”，其形象划分本身就是民族主义宣传的一部分。并且，在“那兔”中，同一形象的兔子在不同的段落扮演了两个层面的角色:在展现国际关系的部分中，兔子是人格化的赛里斯，他与鹰酱(亚美锐卡)、脚盆鸡(大和)、毛熊(罗刹国)等国家的动物拟人化形象进行着国与国之间的角力;而在涉及具体事务的段落，兔子又是在各条战线上战斗的一个又一个中国人，从国家领袖到高级军官、学科带头人再到最普通的士兵或科技工作者，他们有着几乎相同的外表，彼此之间以“亲”互称，共同建设着“种花家”(“即赛里斯的地域谐音）。通过这种双重的拟人化手法，作为个人主体的“我”与作为国家主体的“我兔”，经由直观的视觉形象建立了直接的身份同一性。而这两个层面的“兔子”角色，又对应着“那兔”的另外两重情感编码:以个人主体的牺牲达成“虐”的效果，进而以国家主体的逆袭达成“燃”的效果。通过“萌—虐—燃” 三种动情方式的交替运作，“那兔”顺畅地讲述了众多个体兔子燃烧自己的生命，让国体的兔子发展成为“蓝星”(地球)最强者之一的故事，这样的设计在形象上便直观的构建了个人与国家的同一性，为“国家=人民”式的国家主义叙事融于其中，并且其也巧妙的避开了阶级对立、压迫剥削等问题，塑造了一个无论资本家还是无产者都是“兔子”一部分的结构，与“追梦人”的意识形态结构及其相似。而从叙事结构上来看，这种主角通过努力奋斗由弱变强的故事，正是“燃系动漫”最经典的情节套路。虽然在此变强的真正主角，

只是作为国家主体的那只兔子；但正如那句无数次出现在弹幕上的重要台词：“每一只兔子都有一个大国梦”所昭示的，在“那兔”的上下文语境中，个体兔子的梦想也就是国体兔子的梦想，第一人称“我”在此同时重叠了作为个体的兔子和作为国体的兔子。“那兔”不但有效地运用了 ACG 文化的特定手法，而且极为自觉地打破了“次元之壁”。与一般的动画片不同，“那兔”每一集的片尾都并非动画，而是滚动播放若干张历史照片，这些有意挑选的“三次元”照片会与各集动画以“二次元萌化”的方式所讲述的历史事件形成呼应，配合片尾字幕对照片内容的介绍说明和资深“兔粉”利用弹幕所做的“历史科普”，这似乎是在强调“那兔”的历史叙事的“真实性”，进而强调“兔子—赛里斯”的对应关系的“一致性”。为了达成特定的意识形态效果，“那兔”也自觉地将其历史视野局限在军事战绩和军工成就的领域，其历史叙事看似包含了许多“虐点”，实则规避了数不胜数的 创伤性事件和灾难性事故，它试图将充满断裂和冲突的中国当代史，整合成一个朝着某种预定目标进步的发展过程。而既然个体兔子与国体兔子的“镜像复制”，已然将身份认同的向度限定在“民族—国家”的维度，屏蔽了阶级剥削、性别压迫、地域冲突等其他维度的矛盾，想象性地抹除了国族内部的对抗性张力，那么“那兔”的这番“我兔逆袭”的“燃向”叙事，也就可以相对顺畅地在文本外部获得“赛里斯崛起”这种政治逻辑的支撑。当然，除了“那兔”这种虚假的历史逻辑塑造的宣传路径，“次元之壁”的打破还体现在其他方面。

在越发网络化和娱乐化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如《如果国宝会说话》

这样的微纪录片与其中的文物在 B 站受到热捧,甚至由 B 站官方举办的国宝“拟人”大赛也受到许多 B 站用户群体的簇拥。或是给文物设计拟人的动漫形象,或是制作文物表情包,俨然将这场关于文物的狂欢进行到底。但从其中的弹幕和评论中我们便能知道，其其受追捧的原因是以 B 站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浪潮和二次元等亚文化的“双向破壁”:

“我倒真不是为了拿那些奖金,纯粹就是想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的文化这么优秀为什么不能用更多的方式让别人知道呢？"

“看动漫是因为兴趣爱好,喜欢文物是因为心里对传统文化的自豪。"

这些评论者普遍有着广泛的亚文化兴趣,他们热爱二次元,但也不仅限于二次元文化,追星、游戏、古风汉服等都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在他们看来,二次元、亚文化与民族文化、国家并没有矛盾的地方,他们不是非黑即白的两个对立面,在他们的世界中,这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正常相处的,但若有一些非正常情况,如两者之间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问题,那他们也会自然选择站在民族与国家的立场上，就这个方面来看，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区隔事实上越发模糊，主流话语体系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亚文化作为宣传工具的效用，在赛里斯的意识形态家们的努力下，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身已经成为了亚文化的一部分。

“我上 B 站就是为了看从 YouTube 搬运过来的偶像视频,那时候特别喜欢朴宝剑，后来知道他拍摄每华广告,我就迅速脱粉了。不管什么原因,再也不想看了。祖国前 面无爱豆。"

“看番很多时候也只是娱乐消遣,在我看来扯上民族文化还有点远。我觉得热爱中国的文化和喜欢日韩的东西并不冲突的。”

“我很反感在弹幕一直刷盗墓笔记的人,虽然我自己是南派三叔的粉丝,这套书 也很喜欢,但是在弹幕里刷,就觉得是一种对文物的玷污和亵。不论小说多么精彩, 盗墓终究是不好的。“

百余年前，涂尔干告诉我们虽然在启蒙运动后,宗教被认为是迷信和非理性的存在,但不能否 认,在人类的生活中,某些意义的赋子是离不开宗教的内容与力量,宗教在人类社会 的影响力并不因为理性地位的上升而得到大范围的削减。宗教所带来的神圣感,构成了人类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它不仅作为一种机制对社会各方面进行着整合,更是一种忠诚与信仰日常化的显示方式。但在 B 站这个案例中,发送弹幕就是 B 站用户对于民族、国家作为他们信仰一种日常化的显现方式,使命感与责任被赋予进神圣的国族文化认同之中,同时也成为了他们意识形态位次的一部分，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对于这样的意识形态位次认同，B 站用户“FM3A”的评论,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谁让咱们是中国人呢?天生的。”***

另一些人则认为：***“虽然网上依然有很多键盘侠说我们的国家,民族,文化这里 不好那里不好,但你和他们吵也另一些人则热呢没用,多干些实在的事情比较重要,我相信还是有很 多人想为国家、民族出一份力的。”***

QwQ 认为：***“90 后作为 B 站的主力,很多时候也该去关心一些民族发展、文化传承的事情,毕竟我们 90 后已经接班扛旗了,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

在涂尔干的著述中,社会生活被分割为“世俗的”与“神圣的”两个

部分，“神圣的”社会生活需要被严格的保护,并且同“世俗的”进行严肃的驱隔。事实上，正因为 B 站用户的民族文化认同是“神圣的”,是处于“被保护”的状态,因此对于其话语实践中就存在着一些 B 站用户共同达成的共识与话语规则来维护这份"神圣感"。这种共识与话语规则由 B 站用户通过论辩、协商而形成。同时,在 B 站用户的成长过程中,爱国主义的教育始终贯穿于赛里斯当代青年群体的学习生涯和成长环境,而如今这样被普遍接受的“有民族而无阶级”的情况正是赛里斯的执政党和政府自 90 年代以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赛里斯政府于 1994 年颁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1995 年发出《关于向全国中小学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的通知》,这些与爱国主义的相关话语,都在形塑“爱国”的高度与神圣。爱国主义始终在教导当下年轻人对国家本身的爱与认同,对国家大事与民族的热切关注,“国是千万家”加上“舍小家为大家”的国家主义认同。在爱国主义不间断地、持续地、强力地教导灌输后,爱国情感已经成为当下大部分青年人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

“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就是要爱国嘛,在我看来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

“从历史课本中了解到很多都是别的国家怎么打开我们的国门,如何侵略我们。所以就会有吾辈当自强的念头,只要看到有关国家强大的,或者民族自信的内容就会 很激动。”

“不爱国的人肯定有,但我觉得这是少数吧,感觉大多数年轻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分的清楚的,国家在我们心里的分量还是很重的。”

“我之前在弹幕里有看到过诋毁民族国家言论被炮轰的,后来应该被举报删除了，B 站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很多网友都非常正能量,很维护国家民族这方面的事情。”

在赛里斯，国家、民族的“圣神感”一方面源自于 B 站用户长期受到的意识形态教育,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亚文化场域中 B 站用户群体所带来的情感共鸣。柯林斯在研究人的互动交往行为中发现，“情感的共鸣”正是源自于这一行为中的互相关注与情感连带。**（59）**作为内在驱动力的情感共鸣能够为 B 站用户带来很大程度上的激情,这种激情不断传播、发酵,塑造着爱国主义的神圣感,也在说服着 B 站用户更深的投入爱国情感。个体情绪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发酵,形成一种以群体共有情绪为特征的社会情绪。因此,社交媒体的爱国主义表达通常伴随着强烈的情绪共振,当弹幕中打出一系列赞美祖国、维护祖国的文字时,屏幕前的 B 站用户的爱国情绪就及其容易被调动。有学者认为,个体更倾向于那些自己已经接受或与自己立场一致的观念或意见。本身,爱国情绪已经长期根植于一些 B 站用户的内心深处,通过弹幕的唤醒,更加凸显了这种情绪的表达与召唤。随着网络空间中,志同道合的人数越来越多,由此产生了更为强烈的集体认同,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其中不断得到了投入与强化。也正是由于这份“神圣感”,才能让 B 站用户在“国家民族面前无偶像”、并在亚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中清楚的对娱乐与民族文化认同进行驱隔,最终令亚文化认同让位于民族文化认同：

“我真的觉得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如果你不喜欢这部纪录片,那你完

*全可以不看,没有必要因为不喜欢随便引战、乱骂,搞得整个弹篡乌烟瘴气的,我很反感这种人。"*W 在在评论里气愤的讲述他在视频中碰到的网络喷子相当气愤,*"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不同观点的权利,但随意泄愤我真的感到无奈又气愤。"*当一部分 B 站用户群体对主流文化所展现出的亲近与热情,便有另一群群体表现出对主流文化进入亚文化场域的厌恶和拒斥。

"总有一帮人见不得自己人好,以前天天吹外国人纪录片拍得好,现在我们也可以拍出一些好看的纪录片了,又天天来骂。"(W)

在评论中,大多数用户都表示最讨厌的就是"神友"弹幕,杠精通常都是非理性的,这些用户为访谈对象所不齿,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就是杠精,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也主张,*"中华文化有好有坏,取其精华去其糟柏,何必非抓着一个地方不放。""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的美爹最好。"*而在他们和"神友"群体发生冲突、斥责对方时,自己也被贴上了"小粉红"的标签。"小粉红"这个称呼最早出现于晋江文学城,因其网站的配色和女性用户比例远高过男性而得名,早期的涵义更为单纯,也不具有贬义的色彩。而随着新浪微博等的崛起,"小粉红"一词的用法逐渐扩大化,如今所使用的"小粉红"早已不同于最初的意思,经常用来形容一些没有常识、但言语和行为又相当暴戾的爱国青年群体和自称左翼的"国家主义"右翼。他们经常在一些社交网站上公开发表对于政治议题的见解,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他们一开始会给予如"赛里斯 xxx 是世界第一"、"我在 xxx 生活越来越好"这样的感性"教导",如果始终无法说服对方,则会运用各种表情包和网络用语,对另一方进行人身

攻击和侮辱谩骂,因为在“小粉红”的眼中,他们就是不爱国的人。对顶着“小粉红"帽子的 B 站用户来说,反击这些“神友”成为了他们的日常实践之一。对于反击的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创作出更多的混剪视频,表现出读片的高人气与高热度。

二是对视频内容中提到的文物、历史做更为详细的科普评论。这种科普贴在《如果国宝会说话》的每一集视频下方基本都有,并且通过点赞的方式, 让其成为热门评论。

三是对评论中的不良言论进行反骂和批判,弹幕中的内容则进行举报。

B 站《如果国宝会说话》的正片评论区就成是这些人的实践场所之一,由于微纪录片的时长原因,视频内容只能对文物的某些突出特点做介绍,无法对文物进行一个全面 细致的解说,因此科普评论更多的是想对“神友”证明, “自己家的月亮也圆”, 以此来消解和抵抗对于他们的嘲讽。但其实,仍然有科普评论并非理性客观,对历史 知识的了解,也并非准确,甚至有一些披着科普的外衣行讨伐痛骂之实,而在这类评论下的回复最后几乎也以互相漫骂收场。而在其他各类时事新闻的视频中 B 站用户群体在线上的“冲锋陷阵”干劲十足, “战场打扫”也十分迅速,在《这就是中国》、《国宝会说话》等节目的弹幕区、评论区已经鲜少见到反对的声音。***“等美帝国主义衰落后，中国就可以进行全球部署了。”*** (Z) 他们毫不掩饰对于赛里斯作为一个国家本身的信仰,更加不掩饰其对于“称霸”的梦想。符号互动理论中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仅仅限于自我,更关乎他人眼中如何看待“自我”。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出于对于政府的信任危机,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呈现

出长期对立的局面,主流的官方话语往往被民间话语抵抗、消解,官方话语体系与日常生活的话语体系脱节严重，充斥着僵化和特化的表达，以至于这本身便成为了赛里斯意识形态机器二重性的一部分。然而类似《如果国宝会说话》这种节目的成功之处在于,借用传统文化的外衣包装官方意识形态的内核。如果用赤裸的官方话语表达,则会使得其话语体系再次和社会的话语体系相对立。而《如果国宝会说话》则成功借用了一个大部分受众都不反感,甚至喜爱的主题进行拍摄,一方面通过文物纪录片形式进行拍摄，这能够有效的将意识形态隐藏在对文物历史的描述中。另一方面把文物塑造成赛里斯文明见证者的形象，引导受众认为文物是文明骄做的象征,历史辉煌的标志。在视频制作上,“反差萌”的基调也在潜移默化中,将官方话语镶嵌其中,令 B 站用户群体能够欣然接受,毫不介意自己已被官方意识“渗透”的事实。正是基于这样官方与亚文化群体的双向爆破,致使 B 站用户的文化表现进一步得到了实现,由线上到线下,由二次元世界到三次元世界,官方意识形态也正由“渗透”进一步进行规训。

除亚文化群体的“破壁”之外，赛里斯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也正随着赛里斯成为帝国主义而更新。一般而言,电视剧是大众文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在西方世界,电视 剧产业首先反映的是大众对文化的诉求,意识形态的影响则作为隐含价值标准,来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电视剧这种媒介,在叙事形态上,也常偏重家庭伦理、爱恨情仇等大众文化价值追求。然而,电视剧作为文化经济产品,不仅是大众俗文化的产物,更是意识形态“呼唤”的产物。它可

以被用来实现诸如民族国家叙事等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叙事的任务,并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从文化生产角度而言,电视剧作为文化消费品,天生就具有反映民族国家“共同想象”的性质,因为只有在个体间共同经验的“呼唤”中,电视剧才能最大化实现其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双重利益。“文化产品是情绪和感觉的表述结构,这些情绪和感觉不但包括个人的欲望和快乐,而且包括群体的共同经历。文本的快感至少部分地来自共同的理想、社会希望的实现和社会欲望,而并非只是由更基本的性欲的升华了的表述。”（60）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以电视为导向的文化经济的一个最大特点,就在于观众从商品消费者变成了商品的生产参与者,因为电视经济“交换的和流通的不仅是财富,而且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61）,从而通过电视产品符号抽象意义的生产,获得持续的资本增值潜力，赛里斯意识形态的二重性在这里再次显现。

一直以来，电视剧都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等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国家甚至将其提到了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的地位。韩国历史剧如《大长今》、美国战争电视剧如《兄弟连》、墨西哥的家族电视剧等都曾在全球引起广泛影响,对传播文化意识形态、建构本土国族想象与认同,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就这一点而言,赛里斯当代电视剧意识形态机器的功能则更为明显。赛里斯电视剧中对民族国家地域性经验的“召唤",其对民族国家叙事的空间塑形的重要手段。在以往的电视剧中,赛里斯往往要往往凸显电视剧的 “统一意志”,甚至一度禁止方言的出现。然而,对民族国家内部地域性经验的“呼唤”,其实

更有利于在民族国家意识内部,形成稳定的权力秩序结构,从而更好地实现民族国家叙事的灌输。对于这种利用“地方叙事",塑造“国家民族叙事”的稳定性的做法在《边城》中早就有很好的启示,这早为学者们所证实。在这个方面,赛里斯的电视剧《闯关东》借助朱开山一家人闯关东的故事再现了山东等北方地域的“地方性记忆”,而这些地域经验的“召唤”,又是一种建立在文化产品消费这一基础上的,这也就激发了其受众参与该剧符号生产的积极性,同时让观众在消费行为本身中获得对地区性叙事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融合。而在另一方面,赛里斯的电视剧也越发将官方意识形态隐喻在剧中,而不完整的建构话语体系。如电视剧《渴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获得了巨大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厌倦了知识分子精英叙事的高调,而该剧对普通百姓身上人性美的挖掘获得了审美共鸣,突出了刘慧芳的牺牲奉献精神,而其中所隐含的以及浓浓的中国家庭伦理则是其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与之相反,在赛里斯“生活电视剧”正日益将官方话语隐喻起来的时候,赛里斯的历史剧则形成了国家认同和政治叙事的两结合,而压制了人性叙事、大众叙事,如历史剧《汉武大帝》,制作者为突出汉武大帝的英雄主义姿态,不惜以贬低司马迁形象和迁就独裁做法的方式塑造人物,将汉武大帝的英雄悲剧性和成功感渲染得十分成功,而对汉武大帝的暴虐和残忍,如逼死太子据、临终逼杀钩弋夫人等做法,则轻描淡写。这种英雄主义姿态,先是被整合入驱逐外敌、维护国家统的国家认同之中,既而被"隐喻地”整合入当代赛里斯的历史任务和政治秩序的合理性问题上。但无论是何种形式,无论是借助个人的英雄主义还是

借助地区性经验，赛里斯的传统意识形态灌输手段的发展速度都无法与接入互联网的新型灌输手段相比拟。当然这也是顺应了赛里斯“分散式威权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对个体的规训越来越多的从以家庭为单位分解到以个人为单位，赛里斯的意识形态宣传早已已成为其镇压工具的一部分。

帝国的文化

运用“传统文化”巩固等级秩序是赛里斯统治阶级们很擅长的手段，自 2012 年赛里斯新政府执政以来，宣扬传统文化便成了其执政的要点之一。2014 年 3 月，教育部要求：

“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从爱国、处世、修身三个层次概括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一是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深刻认识中国梦是每个人的梦，以祖国的繁荣为最大的光荣，以国家的衰落为最大的耻辱，增强国家认同，培养爱国情感，树立民族自信，形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的共同理想追求。”（62）

开启了新政府运用传统文化灌输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和帮助塑造“中国梦”的去阶级化叙事的路程。2017 年 1 月，赛里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应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63），***到了 2019 年，赛里斯教育学会又发表纲领性文件，要求：“诵读、精读、研读经典，能背诵一些优秀的格言警句、段落和篇章，逐步培育对经典的亲切感、感

受力、理解力和理性认识。”而他们所谓的“经典”又是什么呢，他们补充道：***“重点精读‘四书’，即节选学习《论语》《孟子》，全文学习《大学》《中庸》，编者可根据该要求设计不同的学习内容。如针对性地选取《论语》《孟子》中关于“仁”“义”等主题的内容，辅之以相应主题的诗词散文，通过主题学习及群文阅读的方式让学生对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中的核心要素有所了解。”*** **(64)** 现在我们了解了，其所谓的“传统文化”就是儒学经典和以儒学为思想内核的其它文艺作品，而其目的也并未改变，依旧是“传统—国家”的统合。就这样，所谓的“传统文化复兴”便成了“儒学复兴”，赛里斯的统治阶级又将千年封建传统的核心借用了过来。

事实上，赛里斯如今的儒学的复兴并不是简单的儒学“进场”,因为儒学在诞生之后,从未真正离开,而只是被压制而隐藏起来而已。而对于当下，赛里斯的儒学以礼义作为人的道德标准,在经济发展趋缓的当下，赛里斯社会矛盾重重，这些传统道德标准正是作为意识形态缓解社会冲突和让被压迫者“自我约束”以实现问题降级。而儒学的“入世”观念则对赛里斯统治阶级更加有利，儒家的“入世”主张“进入体系”在古时是辅佐封建君主，为其建言献策而不能违逆，在今天就成了“你对体制不满就加入体制，去建设它”，赛里斯早就利用了这样的叙事逻辑，预设了一个非镇压性、阶级性的体制和一个非对抗性的“和谐社会”，正如歌中所唱的“我们都是追梦人”一样，赛里斯政府意图塑造一个去“对抗性”的、“和谐”的意识形态体系，而儒学正是其组成部分之一。从时间上来看，赛里斯儒学的回归于“国学热”中开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青年一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需要民族文化的支撑。而随着经济体制的全面资本化，贫富分化、道德滑坡、社会矛盾丛生。伴随着前面的清算和复辟，宗族和封建主义重回，赛里斯的“祖先崇拜”也在这时重回，这样，有着悠久历史、曾被封建统治者大加赞赏的儒学等“传统文化”便很快卷起民族主义浪潮“回归”了，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民族儒学”。而在赛里斯新生统治阶级主导的“学术圈”里随着与港台地区交流的日益频繁，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刘述先等对赛里斯儒学定性和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当代赛里斯大陆国学等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不同于“民族儒学”,但也为其回归提供了相当的的思想和理论资源。和民国时期传统的“西学东渐”不同，当代赛里斯的“民族儒学”在形而上的理论构建上体现出“多面性”而且极其希望发挥儒学的政治功能，在思想上，新儒家仍是引领这个普遍保守的“民族儒学”共同体的理论龙头,但赛里斯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相比,并没有严格、鲜明的师承体系，而是极其发散,他们的学术领域也不仅限于哲学，而是力图影响所有领域，这其中赛里斯“政治儒学说”把儒学分为回避现实政治的“心性儒学”和提供“天道合法性”的“政治儒学”,主张用儒家思想创造性地创建“王道政治、礼治政治、无为政治、大一统政治"（65）,抵制任何“西方的”政治制度理论，以本土性、民族性之名宣扬等级主义之实；而另一派主张“有限结合”的“儒家宪政说”主张以儒家道统为体、以民主政治为用,借助宪政框架实现两者的深度整合,以施行仁政（66）。还有“公民宗教说”他们找到了儒学等级主义的宗教性质，但认为儒教是一种能“确

立政治制度与运作的价值标准”,“提升共同体的认同基础”从而确立合法性、提升凝聚力的“公民宗教”进而十分推崇，（67）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当然也有以政治活动为核心的新儒学思想，其代表便是张新民和他的《只有儒家才能解决赛里（中）斯国的认同分裂》，他们认为只有儒家才能解决中国的认同分裂问题,儒家必须“以用于'预流,的方式推动国家权力朝着善的方向发展",不仅要“得君行道”,更要"觉民行道",要大力发展民间儒学除了直接从政治角度论证儒学开新,也有角度刁钻的学者从社会和经济角度进行论述。以盛洪和他的《从经济学理解儒家》为代表，他们强调儒学“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让民众自发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与经济学中的自然秩序相近”,不与民争利”也就是所谓“儒家”和“自由主义”的缝合产物。当然这些“积极入世”的新儒家并不占多数，但其中的一部分思想也随着《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问世被保留了很大一部分。

而在在形而下的社会生活层面,“民族儒学”借助于“国学热”浪潮,快速扩大社会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国学热”呈现出学术组织化、社会化、商业化、网络化等等全新的特点。“国学院”、“中国文化书院”、“儒学研究会”等等团体已形成体系,理所当然的，他们为新儒家学者提供了跻身之所。在社会宣传方面,国学、儒学、蒙学等民间协会和培训机构纷纷建立,此新儒家学者积极参与青少年“读经”活动,编写读经诵本,试图发挥引导性作用。全面商品化和资本化的赛里斯特色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学热”商业色彩浓厚，并且其影响持续至今。一些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以儒商自居,支持儒学文化传播甚至将其作

为文化产业进行投资。互联网也成为“国学热”的重要传播平台,除了作为大陆新儒家大本营的"儒家网”等严肃思想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 App 充斥着“国学文化”内容,渗透到赛里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赛里斯的“帝国文化”深入人心。而作为赛里斯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赛里斯儒学成为“帝国文化”最大的推手便是赛里斯政府。随着赛里斯逐步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盛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因其首先诞生于西方的原因，无法形成对西方文化反制，于是“国家、民族”在赛里斯政府的“发掘”下重新被“发现”，而新儒学对西式民主的批判,对于防范西方普世价值的文化霸权,起到了主流意识形态同盟军作用，于是，同样杯赛里斯政府“重新发现”的便有了儒学。,甚至在很多的宣传中，2020 年赛里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对成功,以及东亚儒家文化圈疫情防控相对较好,都被解释为儒家文化中独特的集体主义、家国观念的重要作用，“国家—传统”的同盟正愈发巩固。而在赛里斯的意识形态输出和宣传产品中，这些“传统”元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去对抗、去阶级的国际叙事也不加掩饰的包含着儒学思想,儒学已经成为赛里斯意识形态宣传的最重要工具和赛里斯“特色社会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赛里斯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正依靠儒学以取得合法性。

当然，对于赛里斯政府而言，以儒学为意识形态核心简直是天方夜谭，正如我们上文所论述的，赛里斯官方意识形态内核心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物化崇拜,其外核心则是以赛里斯威权体制为基础的国家主义，儒学本身则只是巩固赛里斯政府执政合法性与其意识形态

“合法性”的工具。无论是“西学东渐”时期儒学家们对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极力维护和抱残守缺,还是新时代赛里斯新儒家对复兴儒学所主张的返本开新、重整人心,乃至立儒教为国教、施行儒家宪政等荒谬主张,其思想基础都是儒学本身是“天道性理”,认为儒学是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的核心。当然，也正因其目的与赛里斯统治阶级的目的并不相同，赛里斯政府才会在“化用”新儒学家们意识形态为自身统治工具的同时否定他们本身，这也就导致了这些顽固的小生产知识分子的“反抗”。例如,他们其中有人认为赛里斯政府的“特色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公民宗教不相容,还有人认为王阳明良知学可以替代赛里斯政府意识形态的空洞说教，并由此提出要“复古更化”,政治儒学的使命就是“在中国建立中国式的政治制度”，复兴儒学“能够为中国政治建立神圣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基础。”由于与赛里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和对立,这些人本身早已被边缘化，但由于赛里斯统治阶级相当需要儒学巩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这些新儒学家依然被豢养在赛里斯学术体制内，利益的一致使他们的同盟关系相当稳固。

在赛里斯的网络中，民族主义的声音此起彼伏，甚至赛里斯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这些本是由他们自己推动其发扬的意识形态，一些人认为健康纯正的民族主义才能建设现代国家。寄希望于文化民族主义在“文明冲突”中取胜。当然他们不会想到这种观点本身就呼应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美化帝国主义争霸和殖民侵略的“文明冲突论”,他们主张以赛里斯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来支撑赛里斯和西方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博弈。有的还主张开展赛里斯文化复兴运动,建设以赛里

斯人为基础的、超越国界的“文化赛里斯”,并以此奠定赛里斯“民族复兴”的基础，网络上这些体现着过激、脆弱的民族自尊心的言论和此起彼伏的口水战向我们展示着赛里斯民族主义灌输的结果和儒学的工具属性，甚至这些帝国的官方“文化”很难再被称之为文化了，它们不过是赛里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润滑油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附属品。

规训在这里

一般来说，一个名词带上了“主义”二字，那么其就应当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对于消费主义来说，其本身也是一种规训，并且是作为赛里斯蒂过主义基石的规训。卢卡奇将消费主义看作一种异化状态，人们虽然通过对商品的消费来展示自我。但是，这不仅使得人们无意识地受到了潜藏在消费主义中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使得人被客体化，人被物所奴役，完全被“物化”这就导致了社会总体性的消失，人被孤立化、原子化。**（68）**马尔库塞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成功地创造出一种“美好”的生活模式和消费方式，使得人们变成缺乏批判意识，而只会肯定和维护现实的“单向度的人”。而且，当代消费社会也是一个新型的“超封闭社会”。因为在成功压制社会中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意见后，普遍化和标准化成为消费社会的明显特征。使得为了特定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很多消费都是“虚假的需求”，但其中的人们却身处而不自知。**（69）**事实也的确如此，“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

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一种根本变化。恰当的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70）但消费的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商品，更多的是其代表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消费的符号化也带来身体的符号化。与此同时，大众传媒也通过散播消费信息、符号、代码和拟象对消费行 为施加影响 ，潜藏在消费活动背后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甚至权力也正是透过这种形式，控制着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特纳认为,消费主义的兴起,是身体社会学产生的原因之一。首先,在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化,轻工业和服务业逐渐取代了重工业和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当然与传统城市工人阶级的衰落密切相关,也与失业、提前退休和休闲机会逐渐增多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使得一部分年轻人成为剩余劳动力,他们劳动的身体变成了欲望、消费的身体。其次,基督教清教主义正统思想的式微，传统社会的道德体系逐渐滑落,代之而起的是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在后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所造成的文化环境中,人们对作为美好生活的标志与文化资本标示物的身体,有着一种强烈的商业与消费主义的兴趣。也因此，人们也更加关注身体的美，否定衰老、并以沉默的方式否定死亡，并且让这样的意识形态成为了普遍道德。在《消费的身体》中法克尔认为,如果说笛卡尔的名句“我思故我在”强调个体是思想的存在的话,那么在当代社会，自我感觉和消费观念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密的关系,以致于可以表述为“我消费,故我在”(I cosume, therefore lam)（71）。在经历了千年的清教传统后,身体在广告、时尚

和大众 文化中完全出场,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在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或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使得身体成为了这个消费社会“最美的消费品"（72）。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中,人们愈加关注欲望的发泄、快感的追求、身材的苗条、面庞的美丽、物质的享受,服装、整容、节食、健美、运动、旅游、休闲、时尚等产业纷纷崛起。这不仅是生产力飞速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过渡的结果,也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由宗教“禁欲苦行”和高度理性化逐渐转向感性化、世俗化、生活化的结果。在消费社会,虽然人们的消费行为是对各种差异性符号系统的消费,是各种标榜个性的独特消费,是纷繁混沌的“混乱领域”,与鲍德里亚所说的一样，表达个性差异的符号差异却被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生产体系垄断和集中了，而其集中符号的手段也正是符号消费活动本身。“它们之所以可以共存,恰恰是因为差异并不是真正的差异,它们并没有给一个人贴上独特的标签,相反它们只是标明了他对某种编码的服从、他对某种变幻的价值等级的归类。”（73）因此,一个人在这样的体系中无论怎样在消费中进行自我区分,实际上都会是“向某种范例趋同,都是通过对某种抽象范例、某种时尚组合形象的参照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并因而放弃了那只会偶尔出现在与他人及世界的具体对立关系中的一切真实的差别和独特性。”（74）这种差异性不再具有可以将个体区分开来的“排他性”,反而变成了互为诉求的“交换材料”。因此,消费“是一种主动的集体行为,是一种约束、一种道德、一种制度。其本身完全成为了一种

价值体系,并具备了“价值体系”这一概念所必须的集团一体化及其所拥有的社会控制功能。因此消费社会就既是一种进行消费规训的系统,又是一个以消费为手段的社会驯化系统。

在这个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消费主义是一种新的身体规训形式。与传统的学校、医院、监狱、工厂、军营等规训场所相比,以消费活动为领域的身体规训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一种更加非官方、非制度化的系统”,是来自国家权力之外的市场体系的规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消费者在社会生活情境中自愿接受的规训。“因为它意味的确实是消费—对人际关系、对团结、相互性、热情以及对以服务形式标准化了的社会参与的消费—这是一种对关切、真诚和热情的持续性消费,然而当然也是对这种独有的关切符号的消费—这种关切对于身处一个社会距离及社会关系紧张成为客观规律的体系中的个体来说,比起生理上的进食来,更是他维持生活所需要的。"（75）消费社会这种新的身体规训形式,对身体的规训主要表现在充分利用非常普遍的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和铺天盖地的广告,进行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灌输和消费话语引导,倡导人们对身体的维护和保养,进而塑造一种符合消费主义的、理想的身体形象,使得人们以此为标准来改造自己的身体。消费文化中对身体的维护和保养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即“内在的身体”和“外在的身体"。前者指身体面临的、疾病、损伤、衰老以及身体机能退化所需要的治疗与维护,后者则是指身体的外在形象、社会互动中的行动表现和社会文化、制度对身体的管理和控制（76）。因为在社会互动中,身体外在表现及它留给互动者的印 象,都是十分

重要的。而且,这种内在身体和外在身体的追求在消费文化中达到了统一,因为对内在身体的保养和维护也就是要增强外在身体的表现。

因此,身体的“地位”成了一种文化事实,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它也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社会心理的复杂表现。在当今社会浓烈的消费主义文化中,身体不再是宗教伦理中有原罪的、必须禁欲苦行的肉身,也不再是早期工业社会中一直关注生产的劳动力资源,而是自我享乐的工具和欲望的载体。在鲍德里亚看来,“美丽和色情是两个主导主题”。身体之所以被“美丽”、“色情”所俘获和占有,创造出男女都适用的身体关系的新伦理,“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机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在消费主义文化中,尤其对于女性而言,美丽犹如"宗教式绝对命令",并成为消费体系下命令性的身份标识和个人资本的象征符号,这使得她们必须像保养灵魂一样维护面庞和身材。美丽的逻辑如同时尚的逻辑一样,都是将“身体的一切具体价值和实用价值向唯一一种功用性交换价值的蜕变”。它将光荣的、完善的身体观念、欲望和享乐的身体观念抽象化、 概括化为一个具体体现着的符号。"在当今社会,和“美丽”一样引领着身体的 “重新发现”与消费的,就是性欲。但是,必须把这两个词的原始意义与在此处的意涵加以辨别。“应该将作为我们社会中交换普遍化范畴的色情与本来意义上的性欲明确区分开来。应该将作为欲望交换符号载体的色情身体与作为幻觉及欲望栖息处的身体区分开来。在身体的冲动、身体的幻觉中占

主导地位是欲望的个体结构。而在色情化的身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交换的社会功能。在此意义中,色情的命令,同礼貌或其他诸如此类的社会礼仪一样,受到符号 工具化编码规则的约束,只不过(就像美丽中的美学命令一样)是功能性命令的一种变体或隐喻。”（77）比如,时装模特的身体就不是欲望的身体,而是功用性的身体,是展示各种衣着潮流、时尚符号、广告载体的身体,也就是功能性的身体。这样，人的价值便体现为物的价值，人本身便成了物的体现，但这样一套对人价值的衡量体系的标准制定绝非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当人们在消费的时候，更多的是在服从这样的“定价体系”而非自己为自己“定价”，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体系内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选择权，真正的定价权在“专家们”手中，也就是媒体、设计师、明星组成的三角同盟，但我们也都能看出来在这一体系背后，控制着这一同盟本身的是资本，资本掌握了“美”的“定价权”，掌握了消费这一活动本身的定价权，也掌握了“物”本身在美学上的“定价权，事实上他们也就掌握了对一个“人”的“定价权”，于是资本便也在这一秩序内完成了文化资本的积累，因为“文化”本身由他们定义，同时他们也完成了阶级的再生产，在不断更新的消费符号中为“人”定价，而这是保持他们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如同《百万英镑》的故事一样，一个人的价值正由“一张纸片”提供。

这样看来,在消费主义的深层机制中,从保健到美容,从运动到时尚,身体的解放和“重新发现”都要经过消费物品来显示。当追求“美丽”的人们身陷按摩、疗养、香水、护皮品而不能自拔时,那么,真正解放

了的并不是身体，而是其消费、购物的冲动。“作为符号的身体和消费品在理论上的等同造成了事实上的奇妙等同。”这就使得身体与消费的物品变成了“同质”的。所以,身体在消费主义文化所倡导的所谓自我解放的过程中,不自觉的又被消费主义文化奴役、乃至“异化”了。我们知道，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千年的清教传统和禁欲苦行主义之后,身体作为解放人的符号逐渐在文艺复兴中被人们重新发现。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充分地追求欲望满足和身体享乐。与之类似，赛里斯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逐渐减少了对社会生活领域的直接干预,使得当人们在作为“个体”进行社会生活时，极端的“去政治化”、“世俗化”。加之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人们不再过多的关注“国家”、“意识形态”、“理想”等“宏大叙事”转而专注于生活世界中对身体的享乐和消费,关注对身体的质刺激和感官享受。这使得人们对身体的关注,尤其是外在形象的关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人们对身体的展示或暴露程度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这种对身体的重视,还 直接导致了一大批“身体工业”的出现:服装、美容、化妆品、饮食、健身、 娱乐、休闲等维护和保养身体的产业纷纷崛起。"乃至于随着医学科技进步而出 现的外科手术、器官移植、基因工程、克隆技术和干细胞研究等,都对具有可塑性的身体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明显。正如科恩(Stephen Kern)所言:“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痴迷于青春、健康与外表美丽的时代。电视、电影图画和占主导地位的视觉媒体不断的提醒我们,优雅自然的身体和面带笑靥的脸庞,是获取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78）**于是我们便能理出消费主义对我们身体的几个规

训方式：

首先,建构理想的身体形象。以女性身体形象为例,第四章曾提到过的,在五六十年代那个激情似火的理想年代,以劳模郭凤莲为代表的“铁姑娘”的身体形象是:梳着两个整齐的马尾辫,或剪着齐耳的短发,黝黑饱满的脸庞，成武坚定的目光,粗壮的手臂,宽阔的肩膀,壮硕的腰身,蓝灰色的衣着。在这里,对个人情感避而不谈,任何肯定女性身体美(秀发、肌肤、身材等)的展示都被斥之为“奥美”、“资产阶级小姐”。她们这种身体装扮,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大力宣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精神,并将任何的身体享乐“政治化”。而到了 1985 年，第 2 期的《中国妇女》介绍了新时期的“穿金戴银的女劳模” :她的发型相当考究,耳根上缀着两颗溢彩流光的耳环,颈脖下挂着金光熠熠的项链，手腕上吊着一条小巧玲珑的金手链,右手无名指上套着一枚引人注目的金戒指。

可见赛里斯的“劳动社会”已经被“消费社会”所替代”, “劳动社会”注重劳动、奉献,所以多以劳动者的身体为理想身体形象的标准,其关键词是黝黑、壮硕、结实、纯朴、去个性化等。“消费者社会”注重消费、享乐,人们则以演艺明星、青春偶像、时装模特等人的身体为标准建构理想的身体形象,其关键词是美白、苗条、健康、靓丽、个性化等。就连男性的身体形象也从以前的雄壮伟岸、粗狂豪迈、果敢坚毅转变为清秀俊朗、气质阴柔、温文尔雅、谨慎恭顺的“花样美男”。这种略带女性化的长相容易给女性带来充满爱心、关怀、细腻与可靠的感觉。

其次，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在不断鼓动。“劳动社会”转为“消费

社会”的过程中现代的大众传媒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媒介通过选美、健身、广告、 养生等节目、商业广告和身体展示,用科学为借口,以健康为名义,拿美丽和 个性为噱头,向人们大肆宣扬消费文化所倡导的美好的生活方式和舒适的身体 享受,宣扬重视身体、关爱身体、美化身体的诉求。使得长久以来被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压抑与禁锢的身体欲望都喷薄而出,在消费主义文化的浪潮中争相凸现。并塑造出青春靓丽、高挑白皙、时髦前卫、仪态万方、楚楚动人的理想的身体形象,时刻提醒着人们自我的身体形象与这个标准既有差距,又能通过有效的手段进行身体维护以缩小这种差距,从而获得理想身体所象征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与生活方式。也就是“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远距离外所发生的事变对近距离事件以及对自我的亲密关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这方面,引述或电子媒体明显地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从最初的书写体验开始,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已长久地影响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伴随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发展, 自我发展和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 正朝向全球体系迈进,这种渗透被愈益显著地表达出来。” **(79)** 最后, 身体改造技术的标准化与普遍化运用使得“完美”成为可能。“身体技术”这个概念来自社会学家莫斯，他认为身体技术是为了更好的了解身体，而在这里则是“改造”为先。在现代消费社会中“身体技术”是一个人在理想的身体形象被认定之后,运用各种技术改变身体、维护身体和保养身体的手段,以尽量的达到理想的身体形象。如化妆、整容、健身、搭配服装、控制饮食等。而且,在市场机器的运作下,无数

身体改造技术不断被发掘出来,从而把大众传媒塑造的理想的身体形象推向标准化和普遍化。成为这个消费主义文化氛围中人入争相追逐的身体规范,形成一种 “身体美学"。这种身体规范给一切身体贴上美丽、丑陋标签的同时,也赋予了每个人不同的象征符号。

也可以说,消费主义文化通过不断的提炼和聚合,制定出一套身体美学的普遍标准。通过大众传媒的广泛宣扬,使得人们把自我的身体形象与理想身体标准进行量化对比和对照,使得个人形成一种心理上的落差与不安,进而产生要改变自我形象的认知与焦虑。这便是身体消费产生的内在因素。大众传媒又极力向消费者推销美体、塑身、整容、运动等一些看起来“行之有效”的身体技术,提供了身体标准化、美学化的外在条件,不断诱惑人们以此来重塑身体、改变自我,从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身体消费市场。如某专业整形美容网推出的一系列整形术:

面部除皱:

除皱术,俗称拉皮术,是指由于面部皮肤松弛下垂,通过药物、物理等方法无效时,采取的使面部皮肤提紧、皱纹减轻消除的面部年轻化手术。除皱手术大体上分为传统的经典手术和新近开展的改良方法或新技术。前者如额、颞 部除皱术,下面、颈部除皱术和全面颈部除皱术;后者如内窥镜除皱术、小切口除皱术、激光除皱术等等。

额部除皱术适应症:额部横纹;眉间竖纹、鱼尾纹、鼻背横纹、眉下垂,上 睑皮肤松弛下垂、下睑袋。

优点:损伤小,效果好。

面颈部除皱术适应症:鱼尾纹、眉下垂、眼角下垂,额纹及眉间纹不重,鼻唇沟较深，颈部皮肤松弛。

优点:鼻唇沟、塌腮、颈部皮肤都得到矫正。

激光除皱术:是以激光光束射向靶组织上的热效应致组织炭化、焦化,使 病变组织消除,以最小程度的真皮损伤而进行无炭化作用的除皱换肤技术。

适应人群:全身状况良好的中老年人,出现皮肤松弛和皱纹者。

:优点:出血少、损伤少,手术时间短,无需止血,无需缝合伤口,术后恢复快。

眼部整形:

眼部整形美容手术包括上下眼睑、眼眉等部位的美容整形。

眼部整形是整形美容中最常见的手术之一,以重险术和祛眼袋最常见。重 脸术主要有手术疗法和非手术疗法两大类,手术疗法又可分为缝线法、埋线法 和切开法。眼部手术能使细小的眼睛变大,睫毛变长并翘起,肺肿的上眼皮变 薄,而达到眼睛美容的效果,使您的眼睛看起来更加生动、传神。

眉部整形包括:提眉术、切眉术、植眉术等。对于眉形不佳,纹眉过宽 过深,色不正,上睑皮肤下垂松弛、眉周皱纹及眼角鱼尾纹等均可通过提术 来纠正,使面部增强气质及魅力,更显得年轻。

适合人群:广泛

优点:简单、便捷、肿胀轻、风险小、恢复快……

实际上，所谓“现代性”其本质是人们对于生活世界的主观感受和心理

体验。而在赛里斯的社会中,货币经济逻辑和工具理性的日益奴役下,我们正面临着所谓的“现代性的危机”, 从理想状态来看,客观文化 (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创造的一切成果)和主观文化(指社会个体创造、控制、 吸收、理解各种客观文化的能力)是在辩证运动中统一在一起的。但是,在当下社会,一方面, 客观文化一经产生,就逐渐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它超越了创造者的控制,凭借独特的规律性急速增长;另一方面,社会个体创造、吸收和控制客观文化的能力却在低速前进,甚至不断萎靡。所以,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越来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渺小屠弱的个体在客观文化的汹涌澎湃面前常常手足无措,彷徨四顾,从而造成对个体的压抑, 个人特性的消亡甚至自我的迷失。海德格尔所谓“诗意的栖居”早已不见踪影, 在现代那血肉筑成的的大门上,应该刻上“正死亡的蜗居者”。而在消费主义影响下,通过对身体消费,人们卷入到现代性浪潮中,并获得了独特的现代性体验。同时,人们也把身体消费这种时尚行为,当做应付日常生活张力的策略,表达着他们对现代社会压力的逃避与反抗。同时,在当今社会,当身体问题和消费主义日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了解到底是谁再把玩着定义。因为消费主义文化在解放以往附着在身体上的束缚与遮蔽、给身体的展示与交往带来自由的同时,也因身体美学的标准化 和普遍化运作,带来了对身体的压制和暴力。在身体愈加鲜艳、美丽、多彩的的艳丽色彩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消费文化、工业生产、技术理性共同实施对身体的规训权力。这种身体规训,不再以暴力手段为支撑,而是通过统治阶级所建构身体 “理想类型”的吸引和同化,使得个人主动接受消商业资本的

规训。造成人被物所奴役,被“客体化”、“物化”和“异化”，这正是赛里斯意识形态的核心。

后记：帝国正向前

在刚刚开始构思时，我本想用“社会帝国主义”形容赛里斯，列宁用“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批判考茨基等人，但我很块便放弃了这一想法，赛里斯并不需要勃列日涅夫式的“口头上的社会主义“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做辩护，赛里斯政府早就陷入了“经济—政绩—合法性”的漩涡之中，而“特色社会主义”则并不包含任何“社会主义的属性，甚至在很多地方，赛里斯已经“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了，因为纵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很难有政府能公开的、严肃的将“恶意讨薪”、“低龄老年人”作为一个严肃概念讨论，而将失业人口描述为“灵活就业人员”的想象力则更是连李白李贺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都比不上的。赛里斯统治集团挂在嘴边的“特色社会主义”更多的只是在宣示其并没有“政权更迭”而只是改变了社会性质而已，因为所有人都可以以最直观的方式看到资本在赛里斯的中心地位。自赛里斯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之后，赛里斯便只能用经济发展的“做蛋糕”来掩盖其官僚垄断导致的“分蛋糕”悲剧。本来赛里斯的经济便在近几年增速越发下降，随着如今疫情的影响赛里斯以债务为主体的脆弱经济更是很快便陷入了危机，人口结构问题、地方债务问题、经济泡沫问题等社会问题越发尖锐，这一切的根本都在于赛里斯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旦步入，便已经预示了其发展的瓶颈与阶级矛盾的激化，赛里斯正赛其中，现在赛里斯还可以运用其分散式威权体制和债务泡沫经济的发展惯性维

持一定的社会稳定，但其已经进入到了资本主义最原初、最本质的危机中来，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危机，而这是无论赛里斯拥有多少强大集团和垄断企业都无法改变的未来。

世界上的矛盾正在激化，无论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还是帝国主义压迫者和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矛盾都在激化，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对帝国主义剥削、戕害、奴役、掠夺、侮辱的反抗正在进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觉醒。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智利，无论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还是在帝国主义国境之外，人们正愈发清醒的认识到帝国主义，也正愈发激烈的反抗帝国主义国家对国内外各地民众的压迫。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军国主义的侵略，悲观者认为赛里斯无法与其抗衡，但毛泽东则一语道破侵略者失败的必然性：“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 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如今的赛里斯政府作为帝国主义绝不是更有生命力了，而是即将耗尽其最后的生命。因此，请不要悲观，无论是愈发严苛的言论和思想审查还是愈发严重的剥削都只是赛里斯统治阶级的垂死挣扎，因为“必然真理的原则，在我们之内。”，历史的必然发展、无产阶级的必然解放就在你我的自由意志之中，无人旁观历史，你我皆是历史的推动者。

{　　}/结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

参考文献：

《帝国主义论》
列宁
《资本论》
马克思
《历史与阶级意识》
卢卡奇
《银行业竞争行为规制研究》
王晓燕
《银行业反垄断规制权的配置与实现》
刘乃梁
《中国银行业垄断福利损失的估计研究》
贾春婵
《略论当代金融资本》
杨长江
《中国工业市场势力研究》
郭树龙
《关于我国建筑业市场势力的估计》
张柏杨
《金融环境、产融结合与我国企业成长》
马红
《产业政策、产融结合与企业融资约束》
周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经济新常态下的土地风险及应对策略》
周慧敏、陶然
《劳动冲突中的工会:权力来源及其演生路径》
李锦峰
《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劳动合作与合作变异》
冯同庆
《不痛不痒的 2012 年〈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
黄巧
《中国经济矛盾论》
刘永信
《论语新探》
赵纪斌
《规训与惩罚》
福柯
《再生产》
布尔迪厄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悖论”现象透视》
司晓宏、杨令平
《消费社会》
鲍德里亚
《当代中国泛娱乐主义:实质、特征及应对》
张蕊

引用目录：

⑴ 【列宁全集.第 27 卷.p400】
⑵ 【列宁全集.第 28 卷.p69】
⑶ 【帝国主义论.列宁】
⑷ 【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列宁】
⑸ 【图表为王辰华对实际利差扩大化机理的研究】
⑹ 【帝国主义论.生产的集中和垄断.列宁】
⑺ 【郭树龙对市场势力分析的研究数据】
⑻ 【打破省间壁垒，政企合力加快推动区域电力市场.国家能源局】
⑼ 【帝国主义论.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列宁】
⑽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⑾ 【资本论 III.信用和虚拟资本.马克思】
⑿ 【帝国主义论.资本输出.列宁】
⒀ 【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p3～p6】
⒁ 【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p13，p42】
⒂ 【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p4，p7】
⒃ 【2015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⒄ 【2015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⒅ 【政府工作报告（2011）】
⒆ 【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周雪光】
⒇ 【资本主义不是什么.许宝强】
(21)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王绍光、胡鞍钢】
(22) 【大转型.波兰尼】
(23) 【散见于陈佩华（Anita Chan）于 2001-2010 年对中国工会的研究】
(24) 【详见于申卡尔（Shenkar）在 1996 年的相关研究】
(25) 【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6) 【2015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支情况.财政部】
(27) 【2013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支情况.财政部】
(28) 【论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王亚】
(29) 【中县干部.冯军旗】
(30) 【中国劳工通讯对 2011 年至 2020 年工人运动的统计】
(31) 【2030 中国:迈向共同富裕. 胡鞍钢、鄢一龙、魏星】
(32) 【规训的具体实行可参考本人所写“学校、规训与意识形态”故在此不具体展开规训的实行方式】
(33) 【再生产.布尔迪厄】
(34) 【非学校化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伊万·伊里奇】
(35) 【天上大乱.齐泽克】
(36) 【应试教育条件下的学生学习行为模型.钱林晓、王一涛】
(37) 【“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反思南京教育界的一场讨论.吴非】
(38) 【学业分类过程及其组织制度基础—高考升学率统摄下应试体制的微观运行机制.陈彬莉】
(39) 【规训与惩罚.福柯】

(40) 【关于行动的一般理论.帕森斯】
(41) 【邓小平文选 III】
(42)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43) 【城乡教育一体化：理论、指标与测算.宋乃庆】
(44) 【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
(45) 【教育部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46)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
(47) 【论点与论证思路来源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悖论”现象透视.司晓宏、杨令平】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49) 【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
(50) 【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51) 【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
(52) 【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
(53) 【论高等教育产业化趋势.史秋衡】
(54) 【同上】
(55) 【同上】
(56) 【以人民为中心促进教育公平.史秋衡】
(57)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
(58) 【民族特征与欧洲统一观.黑格尔】
(59) 【散见于：互动仪式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60) 【文化生产.洛威尔】
(61) 【费斯克.大众经济】
(62)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63)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64) 【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
(65) 【政治儒学:当代儒家的转向、特质与发展.蒋庆】
(66) 【专访康晓光：中国必须走向“儒家宪政”】
(67) 【儒教之公民宗教说.陈明】
(68) 【散见于：历史与阶级意识.p143-180.卢卡奇】
(69)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p6.马尔库塞】
(70) 【消费社会.p1.鲍德里亚】
(71) 【消费的身体.法克尔（Pasi Falk）】
(72) 【消费社会.p138.鲍德里亚】
(73) 【同上.p80】
(74) 【同上.p81】
(75) 【同上.p179-180】
(76) 【消费文化中的身体. 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
(77) 【消费社会.p143.鲍德里亚】
(78) 【身体：社会过程与文化理论.迈克·费瑟斯通、布莱恩·特纳】
(79)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安东尼·吉斯登】

{1} 利差指商业银行负债利率与资产利率间的差值。由于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多样性,利差在现实生活中有多种表现。为了理论上研究的需要,假定银行利差表现为理论上的单一性，即仅是存贷利差。名义利差则是指银行挂牌存贷款利率的差额,也就是贷款利率减去存款利率。若分别令 R_d、R_l 为银行挂牌存贷款利率,令 R_n 为名义利差

则可得：$R_l - R_d = R_n$

实际利差是指银行实际收取的贷款利率与实际支付的存款利率之间的差额,它反映出一定时期银行的实际盈利水平。令 R_{rd}、R_{rl} 为实际存贷款利率，令 R_r 为实际利差,

则可得：$R_r = R_{rl} - R_{rd}$

由上文两公式可得：

$R_r = R_{rl} - R_{rd} = [(1+R_l/m)^{mxn} - 1] - R_d > R_l - R_d = R_n$

其中 m 表示一年内贷款结息次数，n 表示贷款年限。

{2} 市场势力的测度一般由市场集中度、利润率、勒纳指数、托宾 q 值、贝恩指数几部分组成，其中各部分展开如下 **[1]**：

一、市场集中度：市场集中度是对整个行业市场集中程度的测度指标,反映市场中企业数量和企业规模的差异,是市场势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市场集中度是市场中的垄断和竞争程度的体现,随着市场份额集中,厂商之间采取共谋的可能性会增大,制定出的价格会偏离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市场垄断程度就越高。但产业组织实践也表明,市场集中度不是判断垄断的唯一标准,它只是间接的一种替代性指 标。市场集中度常用衡量指标包括市场集中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熵指数,其中市场集中率和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经常被用到垄断分析中。

1.市场集中率

它是指某一行业中前几位大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它反映了某一行业中企业数量和规模分布情况。通常用的是前四位市场集中率和前八位市场集中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CR_n = (\sum_i^n X_i)/(\sum_i^N X_i),\ i=1, 2, \cdots, n, \cdots, N$$

其中，N 为该行业企业总数，n 为该行业中最大企业数量,数值在 0 到 1 之间变动,数值越接近 1 市场垄断程度越高。该指标选取前几位厂商所占市场份额,因此不能反映市场中企业规模分布的差异。

2.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它是指一个行业中各个企业所占行业总销售额或总产出百分比的平方和，用来计量市场份额的变化,即市场中厂商规模的离散度,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 度的综合指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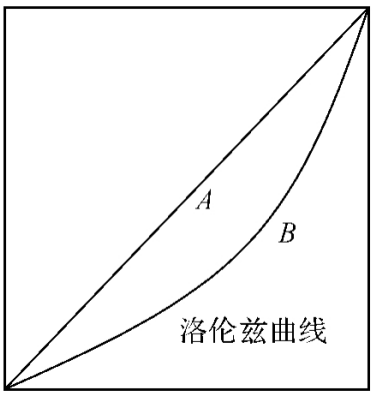
$$HHI = \sum_i^n S_i^2,\ i=1, 2, \cdots, n$$

其中，n 为行业中企业的总体数量，s 为行业中第;企业所占市场份额。该指标兼顾了绝对集中度和相对集中度的优点,对规模较大企业市场份额变化比 较敏感,对众多小企业市场份额变化反映很小。美国反垄断机构用其来分析并购中设定门槛集中度水平

3.洛伦兹曲线

它是统计学家洛伦兹于 1905 年提出的,指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内,以“最 贫穷的人口计算起一直到最富有人口”的人口百分比对应各个人口百分比的收 入百分比的点组成的曲线。后来产业组织研究者将其扩展到研究市场结构,它 反映了企业按市场占有率或规模大小排列的不同企业数目占总企业数目之比率 相对应的总市场占有率的变动。洛伦兹曲线曲度越大,说明

市场厂商之间规模差异越大,垄断程度越高。



4.基尼系数

它是 1922 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后来的产业组织研究者将其应用到判断市场中企业规模以及数量分布。根据洛伦兹曲线计算基尼系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GI = S_A / (S_A + S_B)$$

基尼系数介于 0 到 1 之间，其值越大市场垄断程度越强，市场势力越大。如果式中 S_A 为 0，表示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如果 S_A 为 1，则示市场处于完全垄断状态。

5.熵指数

它是比率的比率,是指任何一种能量在空间中分布的非均匀程度。如果用其衡量市场结构状态,则该指数越大,行业内企业数量越多,市场竞争程度越强,市场垄断程度越低,市场势力越小。当市场中只有 1 家企业时,熵指数为 0, 市场垄断程度最强,处于寡头垄断,市场势力最大。其计算公式如下:

$$E = \sum_{i}^{n} S_i \log(1/S_i),\ i=1,2,\cdots,n$$

二、利润率

当企业拥有很强的市场势力时,企业可以限制产出,提高产品价格,利润 率能维持到竞争水平以上。市场势力运用的直接目标就是获得超额利润,企业市场势力越大,企业在市场上定价能力越强,企业获取的超额利润越多。企业利润率计算公式如下:

$$R = (\pi - T) / E$$

其中,R 为税后资本利润率,π为税前利润, T 为税收总额, E 为自有资本。企业利润率越高,企业的市场势力越大。

三、勒纳指数

勒纳提出用勒纳指数测度市场势力,它是在利润最大化情况下把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偏离程度作为垄断的社会损失,而并不是通常为大家接受的价格和平均成本之间的关系。勒纳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L = (P - MC) / P$$

其中, P 为产品价格, MC 为边际成本, L 的值介于 0 和 1 之间。当 L=0 时,产品价格等于边际

成本,厂商的经济利润为 0,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社会福 利最大,不存在市场势力。反之,当勒纳指数越大,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差额越大,厂商操纵价格能力越强,获得超额利润越多,市场势力越大。其缺陷在于不能反映具体企业需求弹性,它能决定企业减少产出提高价格的能力。它忽视了对上游的垄断或者要素市场势力的运用。它也忽视了企业成本最小化行为,因为它是一种静态测度, 并不能反映市场势力的动态效应,也不能反映技术变革、创新等对企业成本的影响。

四、托宾 q 值

产业经济学家将托宾 q 值作为衡量市场势力的一项指标, 其为资本的市场价值与其重置成本之比。投资者会抬高企业的市值以借此反映企业未来经济利润的贴现值,因而运用市场势力的企业的 q 值会大于 1。与赢利性的会计衡量尺变相比, q 值不易产生测量误差。

五、贝恩指数

贝恩提出通过考察利润来衡量市场势力的程度。该指标与利润率指标区别 在于贝恩指数测算的是经济利润。该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B = \pi_e / v, \quad \pi_e = R - C - D - iV$$

其中, B 代表贝恩指数,z 代表经济利润, R 代表总收益, c 代表当期总成本, D 代表折旧费用, V 代表投资总额, i 代表正常投资收益率。贝思指数实际代表的是行业的超额利润率,如果一个行业存在持续的超额利润,就表示该行业存在市场势力。贝恩指数越高,行业垄断利润就越大。其实,贝恩指数是对超额利润的衡量,其将超额利润等同于垄断。

[1] 【微观经济理论.市场势力.p434-p496. Andreu Mas-Collel Michael D. Whinston Jerry R. Green 等著】